



英借款的声浪，也就闹遍了世界。上海的英商大地产业家沙逊爵士还提出他的镑券计划，怂恿中国对英国借款，发行上海镑券，造成中国的银币英镑的并行本位制，而实际上便把中国拉入英镑的集团。

日本在中国的货币权争夺上虽然显不出多大本领，可是他也用着中日经济提携的口号，甚至提议日本自己改用银本位，造成中日满的银集团，来控制中国的币制。同时，他最凶的手段倒还不在于这些“远路”，他是喜欢“直截了当”的“硬干”的。他有的是枪杆，那么他又何必“学步”呢？

## 二 究竟落在谁的怀里？

日本不必走软路和远路，所以他又来了。当国际借款闹得沸滚的时候，他就发动了“华北事件”，其势汹汹，有气吞黄河，直下长江之概。正在那个时候（1935年6月），英国政府就决定派他的财政经济首席顾问罗斯爵士，到中国来调查财政金融状况。罗斯爵士8月10日就从伦敦动身来华。他路过日本，要求日本当局的谅解，要求英日合作，实行对华政策。可是东京却始终反对英国对华借款，反对中国加入英镑集团；并且反对各国联合对华借款。英方几乎没有讲话余地。

罗斯爵士就这样忍气吞声地离开东京，光临他最后的目的地来了。在这里我们应当钦佩这位英国经济顾问的努力，他在短短一两月内，竟能完成一个凯末尔氏所不能成就的伟大功绩，完成一种“国民政府成立以来，对全国人民最有利之举措”（顾季高先生语）。

11月4日，财政部就公布实行新货币制度了。币制改革后的货币，就是所谓“管理货币”；这就是说，在国内流通的是纸



币，对国际的汇价是由国家银行用营业手段把它稳定起来。照目前的情形说，汇价是以每 1 元中国法币合 1 先令 2 便士半的比率，跟英镑联系起来。

在币制改革之前，传说中国当局曾向英方借到 1000 万镑，后来又经中英当局力加否认，说借款实无其事；同时币制改革的办法，也未事前商量，不过适与罗斯爵士（所见略同）罢了。这些我们可以不管。事实上，我们看到的是币制改革一经宣布，在华英商银行对于把现银移到中国国家银行一层竭力帮忙；而且伦敦方面对于新币制的观感，似乎也超过寻常友谊之上。这些我们也似乎可以不问。

最麻烦的，美国方面传来的电讯，竟一致认为中国已经加入英镑集团；而日本各界又在反对英国控制中国财政金融，攫夺中国币制，跟英国和中国打麻烦了。这还不算，日本报纸还在“友谊地”替中国民众分析，它说独立国日本之加入英镑集团，跟半殖民地中国之加入英镑集团，是完全不能相提并论，中国必然吃亏的了。

这样，中国的货币权，也就算落到英帝国主义的怀里去了吧！

### 三 产业能够复兴吗？

一国的货币跟别国发生一定的联系这本来不是什么丢丑的事情。无奈中国不能跟别的强国相比，中国的货币落在人家的手里，那自己就不能“多作主张”，结果吃亏的往往是我们大多数的中国人，占便宜的除了国内少数人们以外，主要还是外国资本家。

比方说吧，因为纸币价格比较以前的银洋跌低百分之四十，



各项物价，就很快地提高起来。这样，一般小百姓就吃了很大的亏。他们原来一块钱可以买到一斗米的，现在只能换到七升米了。自然，要他们的肚子一天少吃十分之三是大不惯的；到真没有办法的时候，也就只得饿肚子，否则，他就不得不多花些钱去买米。可是，另一方面他的收入是不是增加了呢？并没有；恰恰相反，他的收入还有减少的可能，甚至他还会失业呢？这怎么办？

可是有些经济学家却认为物价合理的提高，对于产业的发展是必要的。好吧，我们就丢开老百姓肚子饱不饱的问题，来谈产业发展不发展的问題。

谁都知道，无论工业和农业的发展，需要一个广大的国外市场，和一个结实的国内市场。是的，有些经济学家告诉人家，新货币政策一定会扩充出口贸易，因为按照目前的汇价，中国商品在国外的市场上的价格，一定要比以前更加便宜，因此销路也就会扩大了。我们认为这种说法未免太过乐观。谁都知道，目前世界贸易的不振，主要原因并不在商品价格的不贱，倒在一般购买力的薄弱，以及国外各式各样的关税壁垒。中国的商品再贱些，恐怕也难于跟列强的商品竞争吧。

自然，我们并不是说中国全部的输出品都没有增加的可能。实际上，在新币制实行以前，有些跟军事工业有关系的原料（像桐油、钨、锑等），他们销到别国去的已经很多。币制改革以后，他们的输出也许会很快的增加。可是，这些对于整个生产部门的影响，究竟还是很小的；假使中国也够得上称做“中国帝国主义”，中国的军事工业已有很好的发展，那么我们的资本家们才能真正乐观呢。

可是，中国毕竟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中国的民族工业还没有这样的福气，来享受一般资本主义国家实行通货膨胀以后的果



实。我们退一步说吧，即使中国一般商品的输出，在币制改革以后也有增加的希望，那么得到出口增加的实惠的，恐怕也还是外国在华的企业呢。假使你能想象到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多半由外商操纵；同时，中国的工业（煤、铁、棉纱、烟草等业）主要的是在外国资本之下，那么你一定可以想到，由币制改革所造成的对外贸易的有利条件，一定又会给帝国主义利用去吧。那么，这里我们能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货币改革更加促进外人在华企业的发展，更加促成民族企业的萎缩？

从国外市场看是这样，从国内市场看又如何呢？刚才我们说过，一般大众因为币价跌落，物价高涨，购买的力量一定要不断低落。国内市场是由全国民众的购买力支撑的；购买力不断低落，我们就无法想象国内市场会逐渐扩充。国内市场没有扩展的希望，那么，主要销在国内的民族产业难道有发展的希望吗？

工业不能扩展，工人的工资就没有希望增加（实际工资减低了），失业的工人也没有办法减少；可是物价却还在上涨。这样的结果，产业就只有越加衰落。这就是为什么通货膨胀解决不了经济危机的原因；同时，这也就是半殖民地中国实行通货膨胀的结果格外凄惨的原因。

#### 四 农村中的悲喜图

漆琪生先生在11月24日《时事新报》上发表了一篇“新货币政策与土地问题”。他以为新货币政策如能“在最确当的管理下推行”，那么“农村经济当然亦因农产品价格之上升，农产品之销路出现，农业生产利益增大，农民收入增多，农村经济富裕，农村资金充实，农民融通方便，则农民贫乏之痛苦减轻，农村中的对立关系亦缓和，因而土地问题亦可不似以前之紧急而险



厉，解决较易。

漆先生几乎已经用尽了积极的动词和形容词如“上升，利益增大，收入增多，富裕，充实，方便”，重重叠叠的把新币制写得像“化地狱为天堂”，起死回生的灵丹一样。这里我们除掉惊叹漆先生怀有如此丰富的词汇和如此伟大的“阿谀”天才之外，我们再有什么话可说呢？

漆先生是读过许多理论的“学者”，尤其是，他曾实地视察过江西跟别的省份的农村。而且，他又知道农村中有什么“生产关系”，“土地所有的关系”，甚至，他又知道“对立的关系”。然而所有这些，只能叫漆先生说“斯种管理通货的政策，更能健全的畅行于农村之中，而为农民所爱戴，救济(?)农村金融，农民受惠无穷，于是中国土地问题之解决，更可简易而便利”。这一套听来是够腻烦的！

实际上，只要稍稍注意农村生活的人们，都会知道，现在中国的农民中间，贫富的程度已经相差得很甚，同时，地主跟一般贫农和乡村工人的生活，又是相差得很远的。这里就存在着漆先生所说的“生产关系”。这里就显出所谓“对立的关系”。上层的地主和富农要收人家的地租，收人家的高额利息，还要做生意赚钱，兼做大小官吏，向人家搜括“揩油”。下面广大的贫苦农民呢，他们要向人家缴租，还重利，得到极低的工资，他们要受商家的剥削，他们还要给胥吏们“敲竹杠”。这种就是“对立的关系”。

假使我们把漆先生揭示我们的“对立的关系”“生产关系”牢记在心头，那么，我们在分析这次新货币政策对于农村所生影响的时候，就会得出跟漆先生很不相同的结论。

第一，是农村工人的收入因为纸币跌价的关系，实际上减少了。每年赚40块钱工资的“长工”，现在虽然名义上并不减少，



可是因为币价跌落，物价上涨，实际上的收入，恐怕只能抵到原来的二三十块钱了吧。

第二，是一般贫苦农民，他们平常是很少有余粮可以出卖的（就是出卖也总在新粮上市，急求脱售，以应急需）。所以，说到因为币制改革，农产价格上涨的好处，他们是无福享受的。可是，另一方面，一般日用品价格的高涨，他们却有份挨到；而且越是没有钱的农民，越不能预先多办些货，避免将来更高的价格。

第三，地主和富农却不同了，他们有余粮可以出卖，他们可能等待最好的机会，出卖他们的农产；他们可以用低价买进贫农的农产，积储起来，以求高价出卖。总之，只有他们才能享受到通货膨胀以后，刺激出来的物价上涨的好处。另一方面，他们对于一般日用品，可以预先多买一些，免得将来吃亏。同时他们自己往往兼做商人，所以在物价高涨之中，又可以大赚一笔。因此只有对于这些上层的地主和富农，才能“因农产品价格之上升，农产品之销路出现，农业生产利益增大，农民（富农）收入增多，农村经济（？）富裕，农村资金充实”。漆先生的话，大致也只是替他们说的吧！

第四，从上面看来，币制改革以后，农村贫富阶层的分化，一定更加厉害。富有的地主和富农，他们自然会用他们的钱，添置他们的田产。贫苦的农民呢，假使他们还有些田亩可卖的，那又不得不更快的卖掉了。漆先生安慰人们说，那时“农民贫乏之苦痛减轻，农村中的对立关系亦缓和，因而土地问题亦可不似从前之紧急而险厉，解决较易”。我们看漆先生是多么卖力在粉饰太平呀。

由此我们可见新货币政策，即使像漆先生所说，确能在“最确实的管理下推行”，他在中国农村里面也已经引起上述种种结



果。管理通货跟通货膨胀之间，本来没有多大距离；而通货的继续膨胀，又是必然的趋势。同时，也有人说，币制的改革，可以促成货币的统一。不过据金融专家章乃器先生的说法，“我们现在所看见的，还只有捐出中央白银国有的招牌，以推行封建割据的省法币”（见大众生活创刊号）。事实上我们所看到的，也是各地现银的准备分库（即无从集中的表现），和广东、广西等等省钞得到了最好的名义上的保障。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一面中央的法币将来因为财政的关系，会无限制的增发；在各省当局，也还是“我行我素”，同时仿效中央，拼命发行不兑现的钞票。到那时候，农民手里所有的只是些不大值钱的纸钞，那时全国贫苦农民的哭声，一定会比今天更响了。

所以，我们不敢像漆先生和别的经济学家们一样的乐观。



## 略论抗战中几个农村经济的问题

〔按〕在抗日战争时期，全国人民的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而一些资产阶级“学者”却无视现实，空谈脱离实际的“理论”，本文对之给予了有力的批判。

### 一 两条道路

摆在全国人民（中间百分之八十以上是农民）面前的只有两条路：把中国变做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而使中国老百姓做日本鬼子的奴才呢？还是使中国变成独立自由的新国家，因而使我们做这个新国家的堂堂主人翁？从抗战以来，中间不曾有过第三条路，也不能有第三条路。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就变成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外国的资本冲杀了进来，它对于我们封建大老爷一面拉住他们的袖子，一面又戳破他们的裤子；它对于我们“阿斗式”的民族资本呢，则把它的喉咙扼得紧紧的。就是这样，它向我们老百姓实行文明的攻势近一百年。民族资本几经挣扎，要想脱出娘的怀抱，独立成长，但终没有成功。差不多一世纪了，我们只受到资本主





义的害处，却丝毫没有受到过它的好处。我们比别的国家的老百姓特别吃苦头的地方，就在于这一点。中国既有了漂亮的资本主义，但又没有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当全世界的资本主义腐烂到臭气直喷（请闻一闻张伯伦式和达拉第、雷诺式的臭气吧！）的时候，我们中国便越加倒霉了。

就在这样的基础上，日本鬼子要把中国从半殖民地的地位推到全殖民地的泥塘里去。“九·一八”这就是鬼子直接动手的日子。他先把我们的东北抢了去，把东北一隅改成他的殖民地。一九三七年他又发动抢夺全中国的战争。我全国军民不甘投降和亡国，便奋起抗战。如今打了已三年，日本鬼子只占领了我们一小部分的领土，而主要的还是些点和线。敌人一占领这些地方，也并不想便宜我们，他便“扫荡”我们的部队，开发我们的资源。“华北开发公司”、“华中振兴公司”、“台湾拓殖公司”，就到处干起来。王克敏，梁鸿志和汪精卫的傀儡戏也就唱起来。日本帝国主义用他的枪刺在占领区搭起殖民地的架子，进行其殖民地的经营。以此为根据，他们正进一步要征服全中国，把整个中国照现有占领区的模样，殖民地化起来。这就是奴隶的中国的前途。目前敌寇正运用国际间对他某些有利的情势，运用我们内部某些严重的弱点，不顾三七二十一地在向这条路猛进。而汪精卫和一切汉奸，投降分子，和怠工分子们就是他们最好的帮手。

毫无疑问，中国的老百姓真正所要争取的，决不是这亡国灭种的前途。他们要独立，要自由，要生存。为了这，他们已拼了三年的命，吃了三年的苦。他们和奴颜婢膝而煊赫一时的汪精卫、李精卫等完全相反，他们在沉默中更加坚挺了。他们和一切倒退顽固的“英雄”们相反，这些无名小卒们是更加团结，更加进步了。他们更加和那些对抗战怠工而大发其国难财的幸运儿相反，他们在最崇高的自我牺牲中完成了新中国人民模范的典型。



他们凭着中华民族近四五十年来战斗的经验与教训，正用着双手在创造一个独立的、民主的、快乐的新中国。虽然他们的工作岗位有所不同；他们有的在战场，有的在后方，有的在工场，有的在农田，但他们奋斗的目标只有一个：抗战胜利，建国成功。从华北到东南，从西南到西北，从后方到前线，从前线到敌后，凡是中华民族的真正儿女，心头只有一个主意，手头只有一个行动，把敌人打出去，建立三民主义的新中国。这就是独立自由的中国的前途，也就是全中国人民现在所争取的前途。

敌人和一切汉奸投降倒退分子要联合全世界的反动势力，打退我们，迫着我们走亡国的路，而我们则要联合全世界上真以平等待我之民族，来打退他们，建立独立自由的新中国。眼前的斗争只是这两条路的斗争。我们不能希望有中间的路，也不可能第三条路。

极少例外，中国三万万以上的农民大众都在抗战国策的领导之下，为打退敌人，建立民主的新中国而奋斗。他们是进行这个战斗的基本队伍，他们最虔诚地接受正确的领导，而与这种领导的力量相结合。这种结合本身便是中国正确发展之最结实的保证。

## 二 目前中国农村经济的性质问题

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和我们的抗战，把中国社会推上一个彻底转型的历史阶段。其变动速率之快，范围之大，程度之深，在中国历史上都是空前的。在这熊熊的历史熔炉里，中国将被打成一把刀，或是打成一把叉，这只有动手打的铁匠自己才知道。中国将变成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呢？还是独立自由的新国家？这不能求之于推背图，也不能问之于刘伯温。这里的决定权



操之于我们自己的奋斗。所以，日本鬼子（及其帮手）与我们的剧烈斗争，使现在中国社会经济的结构处于迅速变动的过程中，因此也是使现在中国社会经济的性质也在迅速转变的过程中。这是研究目前中国社会性质时应该注意的第一点。

其次，抗战时期军事和政治的种种情况，使得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越发加强了。因为敌人军事的攻占以及政治经济的侵略，因为我们军事的防御和进攻，以及政治经济之在某种限度内的改进，中国现在大致可以分成三种地域。在这三种区域里，社会经济的结构，特别是农村经济的结构，有着相当显著的差异：

（一）敌占区。这是指完全被敌占领，并无或较少我方游击队活动的区域而言。东北是典型的例子。这里是十十足的殖民地经营。日本帝国主义“开发”东北的大本营满铁会社控制了整个东北的经济命脉。它通过伪满政府，实行血腥的五年计划，将东北四省的一切物品和资源全部掠夺，以供其军事冒险之用。农村里的土地财产多被强占，例如富锦、依兰、土龙山等地的土地，敌人多直接加以没收，但美其名曰商租。其他各处，有“日满拓殖公司”、“满蒙勤业公司”等强迫用低价收买，敌人在东区道和其他各地，厉行“并村”，保其“安全”，结果农民多流离失所。至于日鲜浪人的霸占农田，横行乡里，更是司空见惯。农民大批大批地离村，一部分到敌人开设的工厂里去做工，大部分则冻饿而死。同时敌人还强迫征兵，组织伪军；强迫征工，建筑公路铁路。另一方面利用少数土劣，维持傀儡政权，作为压制人民的工具。敌人在华北华中和华南的占领区也早就开始这样的经营。

由此可知，敌占区社会经济的特点，第一，是敌人已控制全部的经济命脉。这些区域已经（或正在）变成日本帝国主义经济之直接的附庸。它已从半殖民地的经营形态变成十足的殖民地经



营形态。第二，原有半封建的经济结构在基本上，不但未经摧毁，而且由于敌人的控制和利用越发加强了。当地的土豪劣绅和奸商之流，除极少数外，多以奴才的姿态，参加敌人所设的统治机构（伪组织）和经济掠夺机关。这些奴才们今天在敌人的豢养之下，居然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他们就是溥仪，王克敏和汪精卫等傀儡政权的社会基础。农村大众与这批狗腿子的对立，已经和他们与日本帝国主义的对立结合在一起，越来越尖锐，越来越深刻。老百姓们要打倒敌人，同时也就得打倒他们。

（二）大后方。这是指尚未沦为战区的西南西北大后方而言。这里的条件是这样的：国际交通和贸易条件的困难，以及海岸各港口的沦陷，迫得我们必须建立独立的自给的民族经济；同时抗战的实际需要，也迫着我们要改善人民生产和生活的条件。我们在主观上确乎也曾做过很大的努力，来适应客观的环境和需要。不过因为某些基本条件的不健全，我们在这方面还做得不到家。当然，我们新的工业已经建立起一些了，交通运输也改善了不少，农业也曾设法增加，抗战军人家属和一般农民的生活也制定条例去改善。但因为我们在实在做得不够，大后方的社会经济并没有起什么质量的改变。这里统治的关系依旧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关系。英法美等列强对我的投资和贸易这些年头是大大减少了，但它们通过政治和军事各方面，凭着它们是我们的“友邦”的关系，对我们依旧保持着有力的发言地位。整个社会，特别是农村社会本身的关系没有起很大的变化。三年以前的农村有大地主大乡绅在作威作福，今天的农村还是有大地主大乡绅在作威作福。所不同的，他们的“威”和“福”今天已经戴上“抗战”“国难”的帽子。三年以前的农村有穷苦无告的农民，在过着冻饿和死亡的苦日子；今天的农村也还是有穷苦无告的农民在过着冻饿和死亡的苦日子。所不同的，他们的冻饿和死亡，今天已有战时生活



和“为国牺牲”等等光荣的褒奖而已。贪官们在搜括，土劣们在敲榨；农民们呢，在前线则和鬼子拼命，在后方则实行生产运动。经济外的剥削采取非常新颖和漂亮的方式，钻在大后方社会经济机构的每个毛孔里，不露声色。结果，我们的后方终于还停留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的台阶上，呆等着历史的鞭笞。

（三）游击区。这是指那些已被敌人占领或尚未被占领，而我们民众的游击队非常活跃，甚至占着优势，我们已建立起游击根据地的地域而言。这些区域主要是在敌人的后方，尤其是在华北一带。这里的军民经常处于战斗的状态中，敌我战线犬牙交错。在经济方面其变动性极大，斗争性最为丰富，各项经济的设施和政治保持最密切的联系。紧急的战争任务催迫着广大人民的动员，和经济生活的改造。以民主政治的推进为轴心，游击区老百姓和战士的生活虽十分艰苦，但已在改造之途猛进。帝国主义的势力在这里已插不进脚。旧的破烂不堪的封建关系在逐渐消失。少数甘心投降的土劣们已经逃到敌人怀里去，他们的土地已给没收给一般农民（尤其是出征军人家属）耕种。合理负担的办法各处都在推行。二五减租，一分减息，给农民生活以很大的改善。地方，商人和高利贷的剥夺已大为减轻；官府的压迫也快消除。农民和农村工人已在抗战救国的目标之下，普遍组织起来。雇主和雇工的关系，地主和农民的关系，已经大大地改善。农村社会内部的矛盾在团结抗战的旗帜之下，已经采取近代民主式的表现。总而言之，这里的经济状况虽然变动很大，很快，但基本上因为动员的急切需要，是向新的民主的道路走。这里的社会经济结构，在基本上，没有也不可能为殖民地性或半殖民地性的成分所支配。这些游击区域，正在和敌人战斗的环境中，在锻炼出独立自主的新民族经济的萌芽来，锻炼出新的民主的农村关系来。



这就是抗战时期中国三种经济区域的划分的大概情形。这也就是中国经济关系连续发展的三个环。巩固并发展进步的一环，牵引着全国，破坏落后和反动的环节，这就是战时中国经济改造的基本任务。抗战本身的逻辑就指向这条路。

最后，我们要说到这一点：敌人的进攻和我们的抗战，尽管使中国经济（基本上是农村经济）发展之不平衡性越发加强，但同时它们又巩固它的有机的一致性。敌占区的经济生活不能和大后方脱离关系；大后方的经济生活也不能和游击区脱离关系。同样，敌占区和游击区更加是息息相关的。它们之间是紧密地联系着。敌占区的生活成分可以渗透到大后方，大后方的生活成分又可以渗透到敌占区和游击区。这道理第一是因为中国的社会经济本来是有机统一的体系，它是个不能分割的整体。第二，更重要的，是敌人的目的，不在征服中国的局部，而是要征服全中国；同时，我们的抗战，也不在恢复局部的自由，而要解放全中国。这样一来，敌人所加于我们的一切反动的步骤和因素，便不得不流向全中国了。你看，倾销的仇货为什么不但见之于敌占区，而且可以见之于大后方和游击区？同样的，我们在大后方和游击区所进行的各项进步的步骤，也不能不反映敌占区，或影响到敌占区。你看我们对敌人的货币战，我们在战区的抢购物资，以及我们各种改善人民生活的办法，哪一样不深刻地影响到敌占区的经济生活，使敌伪的统治发生动摇？由此可知，中国经济并没有因为发展的更加不平衡，而用万里长城把全国隔成好多各不相关的单位。中国还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

但这个统一的有机体在开特别快车一样地发展，在孙行者一样地变花样。如上所说，日本帝国主义牵着我们的鼻子，走到殖民地的十八层地狱里去。而我们自己，则要把中国改造成一个自由独立幸福的天堂。日本鬼子把我们打了三年，有些成就没有？



有，它已把中国的一部分殖民地化了。我们把鬼子打了三年，有了些成就没有？有，我们已在大后方，尤其是在游击区，奠定了建设三民主义新民主国家的基础了（这里经济的结构是基本的）。只因为我们努力得还不够，所以新的民主的经济秩序还没有长得像模像样，更说不上在全中国占很大的势力。所以就今天来说，中国的社会经济还是由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关系占优势，因此中国在今天还是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国家。中国的农村也就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农村。但千万不能忘掉这里已滋长着新兴的民主的生产方式，而这个新的生产方式恰巧是不可征服的和必然起来统治未来的生产方式。

目前中国经济的特点，因此也是中国农村经济的基本特点，大概说来就是如此。

### 三 所谓“以农立国”问题

上面说过，今天中国老百姓的生死问题是：做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的奴隶呢？还是做独立民主幸福的新国家的主人翁？就农村的范围内说，就是使中国农村变成日本帝国主义原料和炮灰的供给场所呢？还是建立新的民主的农村生产关系，过着真正人的生活？这样一个严重的问题现在正用最严重的方式——打仗来解决。

正在我们用真刀真枪和敌人死拼的期间，有人却在研究室里悠悠闲闲地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来！中国应该以农立国呢？还是以工立国呢？这个问题之为闲适可餐，直不减于“今天天气好呀！”之类的通常应酬话。谁都知道这问题是个极老板老的老问题。今天老问题而重新提出，尤其在这样紧张的抗战环境中来重新提出，想来终不免别有一番意思在心头。且让我们来瞧瞧吧。



周宪文先生先在《时代精神》第五期，张起他剿灭以农立国的大纛，说：“中国不能以农立国。”其后，中国的重农学派大将杨开道先生就阵头起处，窜出来还将周先生一手，说：“过去的中国是以农立国，现在的中国仍然以农立国，将来的中国还是以农立国。”（见杨著《中国以何立国》，重庆《新蜀报》，一九四〇，一月七日）真是斩钉而截铁，佩服佩服。接着周先生又发表了一篇：“再论中国不能以农立国。”而杜沧白先生、朱伯康先生等也群起而围攻杨先生。杨先生并不示弱，再在时事新报突起了一支异军，发表他的“现代农业国家诠释”，说明他不反对中国的工业化，“不过工业化的结果，机械化的结果，依我个人私见，仍然会只是一个现代农业国家”。所谓现代农业国家是科学的农业，机械化的农业。这个国家主要是输出农产品和人家相竞争，而在抗战时期，也是输出农产，去致敌人于死命。这里杨先生是用的空城计的手法，把工业化的战士们压根儿请进寨里来，哄他们一番，打他们一番。

为了本文范围的限制，我们当然不能在这里讨论以工立国的问题。我们在这里只想指明，今天的“以农立国”主义者和“以工立国”主义者，都是站在纯粹技术的观点讨论中国的经济建设之路，其社会的意义是一样的：他们都是代表抗战期内某些新兴的工业界和农业界的利益。一个要求工业之机械化，建设一个现代工业国家，另一个则想谋农业之机械化建设一个现代农业国家。同时如果他们两者的理想都实现了，我们相信今天的“以工立国”主义者可以把杨先生的“现代农业国家”称为“现代工业国家”；而今天的“以农立国”主义者也同样地可以把周先生等的“工业国家”称为“现代农业国家。”（可参看《中国经济建设之路》，《理论与现实》一卷五期）。但问题就在于：他们理想之所在，都只是一个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而已。





现在我们只能单来简单地说一说“以农立国”的问题。一般说来，中国过去一切“以农立国论者”，都是封建关系的代表，而就对外的关系来说，则是帝国主义在华统治的代言人。为什么？因为第一，中国之所以到今天还是所谓“以农立国”，还是一个农业国家者，主要就因为封建势力之被维持，帝国主义之压制民族资本不让它发展工业，和进一步发展现代化的农业之故。第二，帝国主义要使中国永永远远做殖民地半殖民地，供给他们以原料，让他们来畅销工业品。日本鬼子之所以早就提出“工业日本，农业中国”的口号者，以此。所以居今日而提倡“以农立国”，不论其主观要求如何，客观上总是帮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讲话。

杨开道先生的摩登农本主义似乎也不能例外，杨先生把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农业国家，描写得像天堂一样，称之为：“最伟大的农业民族”和“最优秀的农业民族”，并不是偶然的。你看他指点我们“经济建设的唯一途径，是组织原始生产的农业，控制原始生产的农业，去和工商资本主义抗争”。杨先生是受过高度的科学洗礼的，难道他忍心叫我们永永远远停留在这样一个原始的，落后的，皮肉做成的“天堂”里边，空口说向全副科学和满身武装的帝国主义“抗争”吗？这是“立”国之道呢？还是亡国之道？

在这里杨先生就摇身一变，捐起科学的盾牌，变为现代的农本主义者了。他赞成中国要工业化。他要应用“农业科学技术”，“农业科学设备”，和“农业科学人才”。他要使农业成为科学的农业，使中国成为现代农业国家。他理想中的中国是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一类的国家，在这个国家里面，工业至多只能自足，而农产物可畅销全球，而这个现代农业的中国就可以雄飞世界了，在这里杨先生是睡在农村中极少数新兴企业（即德国式的地主经济



和一部分美国 farmer 式的富农经营，但可怜在中国实在是凤毛麟角呀）的枕头上，做了一阵非常之甜蜜而又非常之“科学”的梦。

但好梦毕竟是好梦而已。事实上中国的农业要科学化和机械化，是非经过下面两个阶段是不可成的：

第一步完全摆脱帝国主义的束缚，铲除封建的残余。没有这，整个中国国民经济之现代化和机械化是不可能的，而农业就只能保持其中古的零碎的反科学的经营形态。中国自己的历史和印度、朝鲜的例子就能证明这一点。

第二步集中力量，谋国家之工业化。没有高度发展的工业，决没有科学化和机械化的农业。等到工业有了高度的发展，农业用的机械，化学肥料和科学用具才有出处。而到那时，工业生产量已经逐渐提高，超过农业的产量，而使国家以新兴的工业国家的面貌出现了。苏联建设的过程，最好的证明了这一层。

杨先生到这里一定要说：我当然不愿中国做旧中国，做朝鲜，做印度；同时我的理想也不是苏联，而是澳大利亚、加拿大型的国家啦。假如杨先生一定要那么说，那么中国的老百姓都要来向你提抗议了；我们不爱你那个建议！为什么？

第一，澳大利亚和加拿大虽然多少保持其经济发展的独立性，但它们都是附属于大英帝国的自治领；尤其是加拿大，它在本质上可说是由英美资本统治的半殖民地。我们所希望的新中国决不是那样的附属国和半殖民地，而是呱呱叫的现代化的独立国家。我们决不愿再做帝国主义国家的原料供给所和商品销售场。我们要有独立自由的身份和经济体系。

第二，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在农业上讲是一个地主和富农的国家，多数的农村工人还过着穷苦的生活。它们虽合乎杨先生的理想，但中国人民却不喜爱他。因为中国老百姓所理想的中国，也



就是真正的三民主义新中国。就农村的范围来讲，它是用“耕者有其田”的办法来“解放农民”，并用种种科学方法，增加农业生产的新国家（见《三民主义演讲集》民生主义第三讲）。

现代的农本主义者虽然披起摩登的外衣了，但在中国具体的历史条件之下还不能越过维持中国之殖民地半殖民地地位之雷池一步。至于那些抛开了政治军事的基本条件，而侈谈其以工立国的学者们，比起现代农本论者来，也只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差而已。

在我们看来，今天就不应该有什么以工立国或以农立国的问题的。今天的问题只有一个，即抗战救国的问题。抗战胜利，国家得救，然后才谈得上以何立国。而那时的“何”，也决不是今天那些学者所喋喋不休的“工业”和“农业”的问题，而是以“资本主义立国”呢？还是“以非资本主义立国”的问题。因为那时中国无论违反中山先生的遗教走资本主义的路也好，或者遵照中山先生的遗教，由民生主义走上非资本主义的路也好，那时第一步总要实行工业化，这是对于经济发展过程稍具常识的人都能了解的，再用得到辩论吗？

至于今天在经济的范围内的问题，则是如何发展生产，改善民生，来充实抗战的力量，奠定建国的基础的问题。就农村经济范围来说，那么今天顶重要的还是尽可能地提高农业生产（这里不容许我们唱什么高调，建立机械化科学化的农业，以“立国”），尽可能地安定并改善农民的生活，向“耕者有其田”的新的民主的农村关系方面走。这个，也只有这个，才是今天顶顶迫切的问题。“以何立国”在今天是不应成为问题的；在将来是不会成为问题的。何必多为之费词呢。



## 四 战后土地政策问题

战后 (!) 的土地政策! 又是战“后”而不是战时!

如果有人要批评我们中国人眼光不远, 患近视病, 那才是他自己瞎了眼睛。当“国破山河在”, 人用血肉拼的时候, 我们可贵的学者们就提出了“以何立国”的问题, 来表示谋国之深远。现在大家知道是战时, 但我们偏要提出“战后”土地政策的问题来讨论, 表示我们眼光之远大! 要知道跳过今天, 而敢于正视明天, 这才是我们所以在精神上能够战胜一切的道理呀。

中国的土地问题, 昨天是严重的, 今天也并没有失去其严重性。因为: 占不到农村人口百分之四的地主们占有了差不多中国一半的耕地(天啦, 假如他们自己经营了, 那中国今天也成了德国了), 而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中农贫农和雇农们却占不到耕地的百分之四十。从抗战爆发以来, 这个严重万分的问题是被搁着不谈了, 理由是今天中国土地问题的公式已经变了个样子: 中华民国的土地将归之于日本帝国主义呢? 还是属于中国人民? 日本鬼子拼命地打我们, 就是要打出一个: “中国土地归于日本的军阀和财阀”的结果来。我们拼命地打日本鬼子, 就是要打出一个: “中国的土地属于中国的人民”的结果来。这就是今天我们解决土地问题的主要方式。

不过我们单单这样看今日中国的土地问题, 还是不能了解问题的全貌的。根据三年来抗战的实践, 我们可以知道:

一、敌人可以和那些最反动的最无骨头的封建旧势力妥协, 可以把他们使做吃我们肉吮我们血的工具, 可以把他们的反动地位巩固和扶持起来, 作为进攻我们的爪牙。在这里封建的土地关系做了敌人侵略我们的帮手, 这还不明显吗?



二、农村上层人物对于农村大众十分苛重和超经济的剥夺，乃以目前的土地关系为基础。而这种剥夺事实上已经表现出，它在怎样阻难着农民的动员，妨碍着农业生产之提高，减低着农民参加抗战的忠诚和热情。在这里封建的土地关系做了抗战胜利的障碍。这还不明显吗？

所以，中国的土地问题在抗战时期非但不能搁着不谈，我们一定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之下，提出问题之新的内容和新的解决办法来的。今天中国土地问题之主要内容，还是，中国的土地将属于日本鬼子呢？还是属于中国人民？这里我们必须特别注意“属于中国人民”的“人民”两个字。在今天不论你是地主也好，是富农也好，或是贫农也好，你都有权占有土地；但必须注意这些土地是属于人民全体的，我们一面当然不能没收地主的土地，但同时土地也不能为地主富农所独占。如果战时的中国土地依然由少数人所独占，中国原有的封建的土地关系依然照旧地维持着，那么第一，敌人在对我的进攻中就找到了很好的工具，傀儡政权就找到了很好的社会基础。第二，农民的动员就会受到很大的阻碍，农民的抗战情绪就会打上很大的折扣。一年多来我们国内所表现出来的某些极端严重的弱点，如果不从这些地方来研究其根源，那我们就有隔靴搔痒之嫌。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特别着重于战时的（不是战后的）土地问题的道理。战时没有适当的土地政策来处理土地的问题，而单说战后如何如何，那轻而言之，就是缓其可当急，急其可当缓；重一点说，那就是逃避现实，为落后的旧秩序预留地步。我们决不当这么办。我们在这时，只有真正根据三民主义，实行民生主义的土地政策。前年国民党临全大会宣言说过：“吾人谓民生主义之实现，当于抗战期中求之，且当于此求得抗战之胜利（注意！民生主义之实行是保障抗战胜利之必要条件）决非于抗战胜



利之后，始从事于民生主义之开始。”可见抗战期内实行民生主义的土地政策之重要。

什么是民生主义的土地政策呢？是平均地权，是使耕者有其田。中山先生告诉我们：“我们解决农民的痛苦，归结是要耕者有其田。这个意思就是要农民得到自己劳苦的结果；要这种劳苦的结果不令人夺去。”中山先生所手订的办法是照值收买，涨价归公，在抗战期内，根据战时的具体情形，我们特别需要做到：

第一，没收汉奸和贪官污吏的土地，分给农民耕种（抗战建国纲领规定对汉奸和贪官污吏，均须加以严惩并“没收其财产”。此项没收来的土地应先分给出征军人家属和无地贫农耕种）。敌人占领区内逃亡地主的土地也应当分给农民耕种，原承租人当然保留优先权。

第二，切实实行二五减租，取消一切田赋附加。国民党二全大会决议“规定最高租额”，决定减低租额百分之二十五，确定最高租额为正产物产量百分之三七点五，抗战以后山西，浙江，广西等省，曾下令减租，收效极大。民国二十六年中政会通过土地法修正原则，规定：“以减轻地租之负担，应明定地租最高额的登记后之地价之百分之八；但承租人得依习惯以农产物代缴。”这在原则上仍和二五减租相吻合，租额亦和百分之三七点五不相上下，故全国各地应普遍推行，对于田赋制度亟应实行政府所颁布的土地税法，取消一切杂税，税率必须为累进。战区农民，所负担的田赋税应一律豁免。

第三，奖励农民开垦荒地。这一面可以增加农产，一面可以让农民领有土地。其办法可遵照民国二十六年中政会所通过的土地法修正原则规定，即“承垦人于荒地垦熟后，应无偿取得土地所有权，并予以相当长期之免税”。政府应用低利放款等办法帮



助农民垦荒。

以上就是战时土地政策的要点。至于战后的政策，就应当根据战后土地关系的具体情况和战时政策之利弊，详加厘定，现在单凭猜想，于事并无所补，反倒移转我们的注意力于捉不住摸不着的未来，把今天的紧急问题搁起不谈。

最后，我们要说到关于战时和战后建设中的地权性质问题。有人说，中山先生民生主义最后的理想，是土地国有（见关于社会主义的演讲），所以我们在现在就要实行土地国有。这个主张在现在说来是不是正确呢？是不正确的。为什么？因为在原则上说来，土地国有的要求当然是进步的，民主的土地政策之最高表现。但在目前具体情形下：

第一，土地国有在抗战过程中以及在中国现有条件下建设一个新的民主国家之过程中，它所表现于动员农民的力量远不如“耕者有其田”的政策来得大。

第二，中国现在要建设的是一个新的民主国家，还不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而土地国有的要求如果在这时候提出，倒使农民大众发生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幻想（正像在目前提倡集体农场会唤起同样的幻想一样）。

第三，耕者有其田的政策，在新的民主政治条件之下，将表现为一扇有力的大门，使社会顺畅地向更高的阶段发展上去。所以，我们现在不赞成土地国有。在目前以及在新的民主的中国里面，土地是私有的，地权应该是属于“耕者”的，富农的经营，是可以自由地发展的。

孙夫人宋庆龄先生曾经正确地说过：“三民主义是一个民族独立民主革命的纲领。在这个纲领范围之内，私有财产的原则是不会被攻击或废止的。”如果这点实现了，如果这个纲领真正实现了，到那时，周宪文先生等所理想的工业化国家，或者杨开道



先生所理想的“现代农业国家”才能在正确的意义上实现出来呢。

(1940年6月24日，白果屋基新址，敌机在头上隆隆中)

(《中国农村》第六卷 第十期 1940年9月1日)





# 汪精卫卖国的理论与实践

## 一 汪逆叛国的社会意义和政治意义

在100多年前，即1832年1月5日，法兰西的卖国贼梯也尔（Thiers）在法国人民代表会议前公开招认：他和他的狐群狗党（即所谓的合法党者 Iesitimistparty）是“以外敌的侵入，进行内乱和扰乱秩序三者为其行动的泉源”。

100多年后的今天，中华民国的卖国贼汪精卫在全中国人民面前公开招认：他和他的狐群狗党也是以外敌的侵入，挑拨内乱和破坏后方秩序三者作行动的纲领和口号。这正是古今中外，无独有偶了。对于这样一个卖国贼难道还值得我们大费唇舌来斥责么？

当汪逆出走，被开除党籍之时，英国的每日工人报（Daily worker）就说：“中国赶走一只破坏统一基础的老鼠。”上海英文大美晚报也说：“汪精卫已经死了，但还没有躺下去。”按理讲，对于这样一只讨厌的老鼠，（它比起重庆的大老鼠来，只是脸孔漂亮一些，若论胆量与识时务，则差得远了）也只消轻而易举地



学重庆市政府的样，用铜元一大枚，收买了埋葬算了。对于这样一个鬼怪的“行尸”也只消赶快把它推到墓穴里去就算了。又何必由我们杀鸡用牛刀呢？

但这只瘟鼠却偏偏在到处钻营，这个行尸偏偏在到处作祟。特别麻烦的，敌人对它还非常之固执地在把死马当活马骑。于是我们就倒了霉。历史鞭策我们不得不把正经的事情暂时搁一搁，来做一件人间最无聊的事情：就是要把汪逆的汉奸理论和行动仔细检讨一下。这是多乏味的工作呀！但又有什么办法呢！

汪精卫是什么东西，郭沫若先生早已替他盖棺定论了。郭先生说：“汪精卫是什么精呢？是卖国精，是卖国的妖怪精！”汪精卫的一生，照吴稚老的说法，是由革命青年，党魁，雄辩家，诗人而至于汉奸。如果用学术的说法，汪逆的一生是一个最卑污的小市民，用放浪的革命热情开端，用最丢脸的幻灭结局，他一开始就侧重于个人的恐怖和个人的英雄主义（中山先生在他去刺载沣的时候，已就这样批评他），随后因为他不能真正靠近于人民，所以必然地忽左忽右，终于变成最无耻的叛徒。这种的结局是中国一个非阶级化（Declassed）了的小市民之最卑污的结局之典型。他从社会和政治舞台上的退场，除了用他惊人的无耻来引起人们一些好奇的注意而外，就再也不会叫人们理睬了。而汪逆就在那么做。

很久很久以前，汪精卫早已变成中国社会的泡沫了。他用他纯粹官僚的活动，把自己从小市民的社会层里拨出来，开化而为漂浮不定滑稽不堪的泡沫。他左右摇摆，东西飘动，像苍蝇逐臭一样，利之所在，身亦随之。所以严格讲来，他早已不属于哪一社会层，也早已不能代表任何社会层。他远在国民党开除他党籍以前，已给中国社会“开除”掉了。当然，我们也不否认这个真理：社会上与汪兆铭同样糊涂、同样无耻的也不在少数。（扫



荡报 1 月 9 日短评)但我们只能承认到这样的地步:即社会上类似汪逆或受汪逆影响的是“不在少数”,我们却不能承认汪逆是中国任何社会层的代表。如果一定要说汪精卫代表些什么,那么他就代表中国社会的糟粕。

一个社会的泡沫它本身当然并不代表某一个社会层,但它之生存却必须寄生在某一个社会层身上。从“九·一八”以来,汪精卫就逐渐明显地透过日本浪人和特务,透过他的爪牙的活动,在国内一步步和日本系的买办资本(即专做或偏重做日本生意的中国买办资本)相结合。这个极端无处的买办金融资本(当时主要在华北)和买办商业资本,百般夤缘,与汪逆的政治势力结合起来,在中日经济提携的口号之下,一方面自己发财,一方面开始卖国。于是汪精卫就凭着他“声望”之重,地位之高,公开变成了日本帝国主义(日本的金融资本和军阀)侵华的触须,变成了日本帝国主义在华的工具。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了解汪逆自就任行政院长和兼外交部长以后一贯的亲敌政策。这个政策可让吴稚老举个例来证明。他说:“你在民国廿三四年做行政院兼外交部长时代,不是日本军阀要求撤换察哈尔宋主席哲元吗?你接到日本军阀的要求条件,就不问哪一个,……赶快连夜地下令,即将宋主席撤换,你就对日本军阀俯首帖耳,奉命唯谨地递办了。不到 24 小时,把我们察哈尔整个的主权奉交日本军阀了。”<sup>①</sup>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了解汪精卫为什么老早就是汉奸和敌探的头子。抗战开始时,政府枪毙的敌探王溶就是汪逆的秘书。而现在跟着他去当傀儡的陈公博陶希圣之类就是汪逆的心腹和左右手。

<sup>①</sup> 吴稚晖先生:《为汪精卫举一个例的进一步解》。



同时，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了解为什么抗战第一期汪逆还在抗战阵营里厮混，而一到抗战第二期就不能不公开附敌去了。从抗战爆发以来，中国社会已经起了很多的变化。各社会阶层的关系已有局部的调整。各种社会力量已有局部的消长。<sup>①</sup>在这里我们特别要说到买办资本，尤其是日本系统下买办资本的情形。

抗战以来，“中国经济对帝国主义的依赖，换句话说，中国经济的附庸性，已经大大的减弱了。这不单是因为中国经济对日本的依赖已经完全断绝（指总后方的经济），也不单是因为中国与其他列强的联系（指贸易投资的联系）已经松懈了许多，而是因为我们在军事和政治上争取独立和解放，对外的关系已经能够逐渐地建立在相当平等互惠的基础上。”

买办资本的生命线是对外贸易和外人的投资。战争剥夺了安全和交通运输的便利，再加上敌人在占领区实行种种限制，我们的对外贸易大大降落，外资投到中国来的，几乎已经停滞。于是买办资本的活力就大大减弱。所以从总的方面说，买办资本的力量从它的绝对量来讲已经相当减弱了。当然，日本的侵略战不仅破坏了买办资本（我们毋宁这样说，买办资本因为具有靠外国牌子的优越条件，所以损失还特别轻），而且破坏了整个国民经济，所以买办资本在整个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还是很大的。但是如果同时我们估计到中国今天的经济生活与建设主要是集中于离海岸较远的内地，而买办资本的重要根据地至今还不能脱离沿海的大城市（恐怕将永远不能），那么我们可以断定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已经多少解脱了一些买办资本的羁绊。同时如果我们估量到，目前我们的抗战主要是靠内地人力和物力的培养，那么买办资本对目前政治的控制和束缚力量，在某种程度以内已经减弱了。

<sup>①</sup> 拙著《论政治发展之路》，《国民公论》第一卷二期。



“从开战以来，日本资本在华的买办大概作如下的发展：

第一，因为中日邦交的断绝，日本资本在华的活动已经失去它一切的便利，同时中日贸易事实上是停止了，所以日资体系下的买办资本一部分就倒了霉，亏损很大，甚至停止了买办的活动。

第二，买办资本是非常敏感的，它看见日本的买办做不来，改行来做英美的掮客也无妨，何况有些买办本来不分英美日本，什么生意都做得，现在就看风使舵，专做了欧美资本的掮客。于是在买办资本中，跟英美法等国资本发生关系的买办就占了绝对的上风。

第三，日本占领区域逐渐扩大，日本资本在那些区域里的活动逐渐扩充，尤其是日货和日钞，它们在一部分沦陷区域已成泛滥之势。这种情形就便利日本资本的买办，这些买办实际上已经完全是奸商，他们是沦陷区域内傀儡政权的支持者。

归结起来说，寄生在日本资本体系下的买办对于中国的经济和政治上的影响在基本上可以说是绝对地减弱了，可是他们对于沦陷区域却已大大地扩充他们的力量，而成为日本在华经营殖民地经济的忠臣。”<sup>①</sup>

这里最可注意的，第一是日本系统的买办资本在我内地或总后方已完全失去了活动的地盘。第二，因为沦陷区域的扩大，特别是沿海商埠和内地大城市的被敌占领，敌人目前已经在那里积极开发，这样使得日系买办资本在那些区域大大活动起来。这一类汉奸买办，只顾自己发财，不顾民族利益。他们在沦陷区域，帮同敌人进行经济“建设”和“开发”，他们或用现物出资，或用现金出资，实现敌人的经济计划。除此以外，抗战两年多来，

<sup>①</sup> 拙著《论政治发展之路》，《国民公论》第一卷二期。



还有极少数人忍受不住抗战的艰难，离开民族国家，把资金拼命送到国外，或在上海香港做外汇投机。还有些人便利用抗战，投机取巧，去发国难财，例如私贩敌货，私运国产原料资敌，帮同敌寇搜刮我法币等等。此外，还有沦陷区域的最反动的封建势力，他们和敌人相勾结，乘机压榨我百姓，作威作福。所有这些都是民族之赘疣，社会的糟粕。而汪精卫者就是这些东西在政治上的代表。他所热望的是做官，是发财，所以敌人占领区域就心向往之。再加上中国社会各个基本的社会阶层，在日本帝国主义的致命威胁之下，在新中国创造的新生机运之前，已经严正的结成统一的民族战线，使汪精卫这类民族败类无容身之地。你看在我们“抗战支那”，有多少的新兴企业家在埋头建设，增加民族生产。有广大的劳工大众忍受着饥寒和失业的苦痛，在为民族流血汗。有广大的农民大众，一面忍饥耐寒，继续生产和参加抗战。这些真正的中国人是更坚决，更强大，更团结了。他们要驱逐一切社会国家的蠹贼。这样，汪精卫就不得不溜之大吉了。

由此看来汪精卫之出走和公开叛国实在是中国社会在民族革命战争中，向独立自主的大道迈进的必然结果。这就是汪逆公开叛国之社会的经济意义。

再就政治方面讲。汪精卫在社会的成分上既是个漂浮的泡沫，那么表现到政治上来，一定如吴稚老所云是“妓女政客”。而这个泡沫一和日系买办资本结合，在政治上就必然很快地变成依偎于日本帝国主义怀中的“妓女政客”了（日本人的称呼）。

抗战的激流当要把这个日本帝国主义手膀里面的“妓女政客”漂洗掉。这位政治的妓女最怕我们动手打她的顾客，然而我们是发动并坚持抗战，予打击者以打击了。这位政治妓女最怕我们团结一致，使她的顾主和她自身不能施展挑拨离间的伎俩，然而我们是各方面密切合作，全国精诚团结了。这位政治妓女最喜



欢琵琶半遮面，不见人面，好让她暗中捣鬼，然而我全国人民是挺身起来，无情地打击敌人了。

所以汪逆之出走和公开叛国完全是中国政治进步的结果。这些进步主要表现于下面几点：

第一，中华民族不仅已经违背着敌人和汪精卫等的意旨，在“七·七”发动抗战，而且能够坚持持久战。没有一次大城市的沦陷和重要据点的失守，不使汪精卫痛哭流涕，<sup>①</sup>叩头求拜，向敌人求降。但中华民族这巨人的铁拳没有一次不把他的阴谋粉碎。最出汪逆意料之外的，武汉、广州失守之后，他终以为和平谈判的时机已经到了。“国内困难已经达于极点”了。但中国却以更大的力量和进步的战略、战术继续抗战下去。于是汪精卫绝望了，同时又“看透了，并且断定了：中日两国明明白白，战争则两伤，和平则共存”<sup>②</sup>。于是溜之大吉，“往共同生存共同发达之大路而前进”<sup>③</sup>。是的，现在该是政客妓女和他相好“共同生存，共同发达”的时候了。

第二，汪逆之公开叛国又是我全国精诚团结的结果。双“十二”事变后，汪精卫从法西斯的祖国逃返国内，原想猎取国内战争的果实。但不幸他失败了。“七·七”事变的爆发更促进全国精诚团结，共赴国难的机运。1926年9月22日中共发表宣言，声明取消推翻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政策，要求全国团结一致，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次日，蒋委员长代表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发表谈话，说明“在存亡危急之秋，更不应计较过去之一切，而当与全国国民彻底更始，力谋团结，以保国家之生命与生存”。全

① 吴稚晖先生“见汪氏于广州陷落后，若丧考妣，顿足号啕。我以为汪氏对敌国有此仇不报，难见祖宗之慨。哪里知他却悔恨屈膝磁迟。”（见进一解）

② 汪：《举一个例》。

③ 同上。



国团结合作的基础予以确立。接着各省军政系统完全趋于统一，国内各民族也一致拥护中央从事抗战建国的伟业。民国 27 年 4 月 12 日政府公布国民参政会的组织条例，7 月 6 日开国民参政会第一次大会，在这大会中充分表现出各派各民族和社会各界融融洽洽的团结精神。这种精神随着抗战的持久和更趋艰苦，就越加焕发。于是汪逆发抖了。他感觉国内的团结越巩固，他的“相好”之胜利的机会便越减少，同时他自身被挤出的可能便越增加。到最后，他深知抗战的前途和他个人的前途完全背道而驰，不得不另奔和敌人“共同生存，共同发达”的前程了。而我全国军民“年余以来，国民则精神团结，将士则踊跃用命，万众一心，咸集中于本党总裁——蒋委员长领导之下，坚毅不屈，有必达胜利之信心”。而汪逆则“处处为敌人要求曲意文饰，不惜颠倒是非为敌张目。就其行为而言，实为通敌求降”。“其为违反纪律危害党国，实已昭然若揭，大义所在，断难姑息，即予永远开除其党籍，并撤除一切职务，藉肃党纪，以正视听”（1 月 1 日国民党中常会开除汪逆党籍决议）。中华民国就这样把那只“破坏统一基础的老鼠赶跑了”。而敌人千方百计造谣，说什么“汪精卫之出走是表示抗日统一战线巨大的裂痕”<sup>①</sup>。那只是阿 Q 的胜利，我们用不着多管。

第三，汪逆之公开逃跑又是我全国人民力量增长的结果。汪逆自己是个浮泡，他最怕群众的力量。然而民族革命战争在本质上，就要求全民的动员。国民党临时大会的宣言说：“抗战之胜负，不仅取决于兵力，尤取决于民力。”抗战建国纲领具体规定，“发动全国民众，组织农工商学各职业团体，改善而充实之，使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沦陷区的农民纷纷参加游击战了，

<sup>①</sup> 如《时局情报》三卷二辑，页 89。东京日报，大阪每日版。





大批的工人也纷纷参加和领导武装队伍了，商人也动员了起来出钱出力，文化界青年学生都热烈地组织起来参加抗战。于是汪逆发抖了。他认为中国人民的动员完全是共产党在作祟，因为照他的意见，“共产党是以捣乱为天性的”<sup>①</sup>。于是他再不能留在“容共抗战派领导下的重庆政府”<sup>②</sup>里面了。而国内外的民众团体也一致对他下讨伐令，要求政府通缉严办了。

最后第四，汪逆之出走又是国民党本身进步和团结的结果。国民党是主持和领导抗战的党。抗战继续不断地向前发展，自然使国民党的领导、组织和成分发生很大的变化。27年（1938年）3月临时大会通过的抗战建国纲领正确地反映着全民族的要求。4月30日，蒋总裁申令全体党员不得在党内树立派别小组织，“举凡以前种种小组织一律取消，以期统一意志，集中力量”。其后又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并广收党员，这样使国民党的成分向广的方面发展。于是汪精卫不安于位了。抗战建国纲领（包括对内和对外的政策），他是根本反对的，党内的小组织他是躬自领导的。而大批革命青年之被吸收入党更加使他害怕。于是汪逆不能不“自毁其革命历史，背弃全国国民党同志”而组织他的伪国民党，攬用他的伪青天白日旗去了。虽然“此固革命过程中不可避免之历程。如总理民元革命，一部分之脱离附袁者，以及此后陈炯明之叛变，皆属革命列车前进中所扬弃之尘屑也。”（见中宣部及政治部为汪逆叛国共同对外声明书）洵然！

由此看来，汪精卫之出走和公开叛国实在是中国国内政治在抗战过程中向前进步的结果。

其次，我们要看敌人的情况。敌人对我的基本政策是一战而

① 汪文《举一个例》

② 《时局情报》三卷二辑，页89。



胜中国。先则要想速战速决，他失败了。现在他鉴于国内军事、财政、经济、政治各方面的困难，一面提出所谓“长期战”（他说持久战不是“支那的专卖品”）和“国家总力战”来应付长局面（见敌陆军省纪念“七·七”两周年小册），另一面却想用以战养战，逐渐结束战争，或者拖入不战而和，不议而和的局面，这是表示敌人之弱，同时又表示敌人毒辣。

当敌人要速战速决的时候，敌人用得到汪精卫来分裂我内部，削弱我抗战力量。武汉广州失守，敌人就想用速和速了的手段征服中国，当然那时汪逆是讲和的最好工具。等到速和也和不了时，敌人着慌了，汪逆也着慌了，但不得不干下去，于是跟着敌人新政策的建立，汪逆也不得不行新的政策——公开投降，身为傀儡了（详见本文第六节）。

由此看来，汪精卫之出走与公开叛国又是敌人困难加深和阴谋加强的必然结果。

这就是从国内政治和敌国状况说明的汪逆公开叛国的政治意义。

中国社会状况和政治情势在抗战时期的进步迫得这位社会的泡沫和政治的妓女——汪精卫不能不出走，不能不做公开的卖国贼。

## 二 汉奸理论之最高和破产的形式

一个社会泡沫本身决不可能有它独立的立场，独立的理论，因为各种理论必然反映出各个社会层在实际生产关系中的观点和做法。社会泡沫只是随处漂浮，没有独立的生存，没有独立的人格。因此他决不能有独立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如果他也有所谓理论，那一定是东拉西扯，扩述拼凑的“杂拌儿”，而且往往是集



各个社会层之最坏的传统和观点之“杂拌儿”。

汪精卫从国民革命以后，在中国社会上便是个无根的泡沫，在政治上便是个无耻的官僚。他绝没有独立的固定的观点。他也提出他之所谓“民主政治”，他之所谓“以建设求统一”，但只不过是进行政治阴谋的借口和投降敌人的进身之阶而已。

当一个民族的“社会泡沫”完全陶醉到民族敌人的怀里，而怡然自得的时候，那么他的一切就连代表本国各阶层的惠劣传统都说不上，他就干脆变成敌人的代言人了。这是因为他的生命线，主要地已经不再存在于国内的统治，而是存在于民族敌人的“枪头利润”和同胞的血泊中了。

“九·一八”后的汪精卫就公开地变成日本强盗的娼妓，因此他的理论也就或明或暗地采取日本帝国主义代言人的姿态，变成田中奏折（最近发展的形式是近卫建立东亚新秩序）在中国的翻版。

但我们对于汪精卫卖国的理论单是这样去了解是完全不够的。大家知道，汪精卫确乎有他的一套理论，一套戏法。而这套理论和戏法之卑鄙齷齪，荒谬绝伦，的确可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汪精卫的卖国理论的确是集一切汉奸之大成，而成为汉奸理论之最高形式，同时又是最无耻的破产形式。在这里我们要追究汪逆卖国理论的根源。当然，他的主义就是大日本主义的中国版，但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他要出版他的汪版田中奏折，他必须顺乎天而应乎人，吸收各家学说之“精华”而自成一家言，才算够味。

汪逆卖国理论的主要泉源究竟有哪些呢？

第一，他扬弃了中华民族一切优秀的伟大传统，扬弃了这泱泱大邦的高尚道德（如真正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而把中国古今所有最无耻最反动的理论、阴谋和品性，像旧货铺一样，一股



脑儿收为己有。教单于进兵的管敢，劝不勒灭晋的张托，称契丹为爸爸的石敬瑭，教金兀术灭宋的秦桧，率犬羊残同类的赵延寿，为元灭宋的张弘范，扶清灭明的吴三桂，所有这些奸细卖国贼都变成汪精卫在策略上和人格上的老祖宗。他要使梁鸣志、王克敏等的汉奸理论（这些东西今天正忙着提倡读经复古，拾我国古圣贤的牙慧和渣滓，教老百姓读百家姓三字经，为日本强盗替天行道）“科学化”，“近代化”，甚至“革命化”以提高骗人的效率，增加麻醉的作用。不但这样，为了要使他的汉奸理论近“群众”起见，他使用他泡沫的本色，把中国现社会机构中极少数动摇分子和最落后的分子的苟安偷身，贪生怕死的心理，完全剽窃过来，完成他铺张扬厉的“革命”词藻。

第二，40年代的中国，不幸而生于世界金融寡头资本采用最毒辣和最残酷的法西斯主义横行世界的时代。法西斯主义是世界一切黑暗野蛮，阴谋和屠杀的渊源。是人类罪恶的象征。而我们“伟大的”具有世界性的卖国贼汪精卫讨好法西斯主义，而至于五体投地。当其带了手枪，出国疗养之际，汪精卫便做了希特勒的好学生，兼带做了忠实的仆人。所以当他乘西安事变尚未结束，匆匆忙忙奔回中国的时候，他满想做一下现成的佛朗哥。不幸他失败了。于是为了报恩起见，只能在外交上凑凑数，坚决主张张德义路线。至于内政，“那真正抱歉得很，让日本征服了中国再说吧！Heil Hitley! Wiy Danke Hsi!”

第三，40年代的中国不幸而还处在法西斯主义的工具——托派阴谋家非常嚣张的时代。托派阴谋家在全世界范围内以其“左”得颇为好听的辞令和毒辣的恐怖手段，来摧毁各国的革命运动和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在全世界建立法西斯主义的野蛮黑暗的统治。而我们“伟大的”革命卖国家汪精卫先生就从“人类茅厕”里抓出这些“革命”的垃圾来，加以粉饰装潢一番，便



赫然成为破坏团结，促成分裂，最能煽动的工具。好在托派国际已经公开把中国和苏联沿海省让给日本，作为其整个纲领中远东政策之重要部分，这样当然更能和汪精卫的卖国纲领呼应了。

汪精卫就凭着这些世界反动势力最新的理论成果和国内最反动的传统，完成其帮助日本帝国主义征服中国的整套理论和策略。再加上日本强盗本身的侵略理论和浪人特务的诡谲伎俩，汪逆理论于是洋洋大观了。所以我们说，汪精卫的卖国理论比之秦桧、张邦昌等当然高超万倍，比之梁鸣志、王克敏等也是棋高一着。因为汪逆其人善变，他一生经验丰富，从中学到西学，从极“左”到极右，他都有眼福看到，都有本领去摄取，于是汪逆理论就集汉奸理论之大成，而以最高级的最成熟的形式表现出来。

但汪逆最高级的汉奸理论，其本身却埋伏着一切崩坏的种子。每个面对真理的朋友，你能以为中国历史上那些腐朽的传统和霉蚀了的人性，还能经得起历史巨轮的碾轧吗？你能以为那些法西斯和半法西斯的反动理论真能经得起历史烈火的考验吗？你能以为那种恶性的骗人理论——托派反动理论还值得人们来回忆吗？所有构成汪逆卖国理论之泉源的都是那些人类历史的糟粕和人类文明的垃圾，那么你能以为汪逆理论还有生存的余地吗？

汪逆理论之必然破产是无疑的。而且在事实上它已经完全破产了。什么作证明？全中华民族已经视汪逆言行如寇仇，此其一。汪逆行动已经从相当具有政纲的方式，完全变成敌人指挥刀下恐怖行动了。从理论与政策的方式一降而纯粹的个别恐怖行动，这就是宣布汪逆如果有所谓理论，也早彻底宣告破产了（参看本文第六节）。



### 三 反民族主义的民族投降主义

我们民族革命战争的最高准绳是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我们要以自身的奋斗来建立独立自由快乐的三民主义新国家。

汪精卫要反对我们抗战，反对我们建国，所以他的全部理论是反三民主义的理论，全部纲领（假定有所谓纲领）是反三民主义的纲领。不错，汪精卫曾参加过革命，曾做过中山先生的信徒。但这丝毫不妨碍他变成绝对反三民主义的反革命叛徒。而且正因为如此，才使他变成最最毒辣最最乖巧的反三民主义的反革命叛徒。因为他曾经一知半解过三民主义，所以他对三民主义的曲解和污蔑就特别巧妙，特别严重。因为曾经参加过革命，所以对于反革命的方法和手段，就特别领会，特别娴熟。

首先他以他的民族失败主义，民族投降主义来对抗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目的在求得中华民族“国际地位的平等”，使中国脱离“次殖民地”的地位。独立自由存在于世界。而汪精卫却要我们忍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屈辱投降，不但使中国的国际地位永远得不到平等，使中国永远不能脱离“次殖民地”的地位，而且要完成敌人“整个吞并我国家与根本消灭我民族”<sup>①</sup>的大阴谋。

且让我们来看看汪精卫的民族投降主义是表现得怎样无耻和巧妙吧。

汪逆民族投降主义的具体表现可以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在抗战发动之前，这时期的特点是积极方面提倡睦邻主义，消极方面提倡民族失败主义。第二阶段是从抗战发动到脱离重庆，

<sup>①</sup> 蒋委员长驳斥近卫声明训词。



这时期的特点是口头拥护抗战，实际阴谋阻挠。第三个阶段是从他发表电直到现在。这时期的特点是公开主和，暴露真相。

汪逆在第一阶段是一生顶阔的回光返照时代。他曾主政，并且主外交。在那时汪逆就完全是日本军阀财阀的忠仆，日阀耳提面命，他无有不应。他曾听任敌军在我祖国领土内横行。他曾颁布敦睦邦交令，取缔抗敌救亡言论。他曾接受广田三原则支持中日经济提携，便利敌人的吞食政策。他曾受敌阀之命，撤换宋哲元，使“于学忠不能安于河北政府，将他调任甘肃；南震不能安于河北政府，将他调任河南”，而汪逆还假惺惺作态，“固然心里十分难过，虽不使其人之失职，及其所部之失所，这种苦心，也曾得到天下人的谅解！”<sup>①</sup> 这些就是汪逆当时睦邻主义在行动上的表现，也就是他的民族投降主义正面的表现。

从“九·一八”以后，国内民众的救国运动逐渐高涨，尤其是24年（1935年）华北问题以后，民气越发激昂，沛然形成广大的运动。他们要求国内团结统一，对日发动抗战。汪逆在旺盛民气的压迫之前，就发挥他的民族失败主义理论。有名的唯武器论便是这种理论的典型的代表。他特别夸张敌人的武器如何如何齐备，如何如何优良，为的得出他3日灭华的结论。这些已为大家所熟知，在这里不必多说。

等到全面抗战已经成为不可阻遏的趋势，同时一部分军民已经动手打鬼子的时候，汪精卫的失败主义便采取绝望的民族毁灭主义的形式表现出来。他聪明地发明了他个人的“焦土抗战”政策（注意他的焦土抗战和李白二将军一向坚持的焦土抗战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他故意曲解蒋委员长的“最后关头”和“牺牲”的意义。他说，“我们是弱国，我们是弱国之民，我们所谓抵抗，

<sup>①</sup> 汪在1937年7月28日庐山第二次谈知会致词。



无他内容，其内容只是牺牲。我们要使每个人，每一块地，都成为灰尘，不使敌人有一些得到手里”。又说，“无论是通都大邑，无论是穷乡僻壤，必使人与地俱成灰尘。我们虽挡不住敌人之杀进来，然而我们必能使敌人杀进来之后，一无所得”。又说“天下既无弱者，天下即无强者，那么我们牺牲完了，我们的抵抗也达到了”<sup>①</sup>。他甚至广播要中国国民贯行新式的“自尽”。

这就是汪精卫焦土抗战的全部说明。谁都知道，我们之对敌抗战，目的正对着中华民族的生存。我们正为了生存才不得不抗战不牺牲。所以抗战的目的是积极的，抗战的意义是神圣的。而汪精卫所说的种种，决不是牺牲，而是自杀；决不是焦土抗战，而是民族毁灭。汪精卫这种“焦土抗战”的主张完全建筑在世纪末的哲学之上。这表示在他的一篇观点中已经失去了一切积极的奋发的因素。他在精神上在熔铸一种死灭的意识形态。但实际上，他是在做日本帝国主义最精确的代言人。因为日本军阀法西斯征华的目的，就要不费一弹，不伤一兵，灭我国家，亡我民族。而汪精卫就在这里提供民族自尽，国民自杀的政策，日本帝国主义当然欢迎之不暇了。汪精卫不懂得这个吗？懂得懂得！他之所以要这样危言耸听，曲解蒋委员长的英明抗战政策，无非要使全国老百姓对抗战抱极端的畏惧心理，认为抗战真正要使“每一个人，每一块地，都成灰尘”，由此而怕起来，不愿支持政府对敌作战，打断政府已经确定了的抗战国策罢了。<sup>②</sup>

在这里我们必须指明，汪精卫在那时这样发挥他的“焦土抗战”政策，一面是慑于政府政策和民气之不可抗御，而另一面却为他以后的政治阴谋伏下了根基。谁都记得长沙的大火曾被汪逆

① 汪在1937年7月29日南京广播：《最后关头》。

② 蒋委员长在1937年7月17日经宣布最后关头已到，即宣布了抗战的国策。





作为藉口，来反对抗战之继续。但实际上长沙惨案客观说来可以说汪逆焦土政策之具体实现，所以其负责人就给政府枪毙了。汪精卫反抓住这把柄，说，抗战是这样的坏事情，“使每一个人，每一块地，都成灰尘了”。“民众们，赶快起来反对抗战吧”。这些都是和汪逆目前在香港上海一带的宣传一贯的。

抗战全面地发动了。于是汪逆在第二阶段的民族投降主义不得不有新的表现。那时国内外政治情势的骨干是这样：第一是全国军民坚决主张抗战到底；第二是国内精诚团结日益巩固；第三是中苏关系急激好转；同时德意实际上帮助敌人，并企图调停战事，劝诱我对日投降。汪精卫的民族投降主义就适应着这个新环境，巧妙地发挥其作用。

第一，历史告诉我们，只有拙劣的反革命分子才公开站到反革命的阵营去；一切顶阴险顶毒辣的反革命分子，一定要伪装革命，混在革命的阵营里，从内部来破坏革命。汪精卫积中外几十年反动之经验，当然深知此中诀窍，所以他在表面上积极赞助抗战了。

让我们听他甜蜜地歌唱吧。

1. “一打就打到底曲”：“在最后关头未到以前，我们就决定一句话：一打，就打到底。绝对不中途妥协。”这种态度完全变成与从前两样的人。最后关头以前，好像布放军事上的烟幕弹一样，把我们完全遮掩住在烟幕中做工作，绝对不敢说半句决裂的话。到了最后关头以后，全副精神统统用在抗战上，绝对不中途妥协。“中途妥协，只有灭亡”这八个字，不是恐吓的话，更不是鼓励的话，有深刻意义在。“中途妥协，除了屈服以外，还能得到什么？绝对得不到和平”。<sup>①</sup>坚忍而不拔。这是汪精卫在唱

<sup>①</sup> 《抗战建国同时进行》，汪在1938年长沙各界欢迎会上演词。



吗？谁说不是！

2. “不做傀儡曲”：“中国历史上为外族所侵略，半之者数次，全之者两次。这些之不是侵略者能将我们4亿人杀尽，能将我400余万公里毁尽，而是我们死了几个有血性的人之后，大多数没有血性的人将自家的身体，连同所有的土地，都进贡给侵略者，以为富贵之地。侵略者因此极写意的便将我们大多数的人，以及全数的土地，得到手里。我们今日是不是仍然要做傀儡呢？不做傀儡，只有牺牲。”<sup>①</sup>光明恳挚。这是汪精卫在唱吗？谁说不是！

3. “义民曲”：“天下只有顺民才会当亡国奴，才会以一己的生存而致国家民族于死；否则义民。”<sup>②</sup>短小而精彩。这是汪精卫在唱吗？谁说不是！

4. “最后胜利曲”：“有了牺牲精神以为根本，军队方面虽然因作战而受到损失，但牺牲精神的提起，适足使强者愈强，弱者亦化弱为强。（注意！）民众方面虽然因战事增加种种负担，负受种种痛苦，但牺牲精神的提起，足使团结愈加坚固，能力愈加增进。（注意！）这次的胜利（指台儿庄的胜利），于国民的自信力是有深刻的影响。我们唯有遵照蒋委员长附电所示，本着这牺牲精神，闻胜不骄，闻败不馁，坚毅沉着，忍劳耐苦，以期竭尽责任，这样必然的可以初步的胜利，日益迈进，而得到最后胜利。”<sup>③</sup>坚定而切实。这是汪精卫在唱吗？谁说不是！

5. 最后的压台曲：“毒到尽头处”：“敌人深知道对于中国的地方不难于攻陷，而难于攻陷之后，能安然占领，无所顾虑。所

① 汪在1937年7月29日南京广播：《最后关头》。

② 汪在1937年9月18日在中央党部演讲词。

③ 汪在1938年4月9日汉口广播：《牺牲精神之提起》。



以于攻陷之后，必使种种政策，以期达到要占领之目的，其一是麻醉政策，如近日所传制造傀儡政府即其一端。因为以中国的钱，养中国的兵，来杀中国的人还不够毒；以中国的钱养中国的士大夫，来治中国的人，才算得毒到尽头处。”<sup>①</sup>深刻而确切。这是汪精卫在唱吗？谁又说不是呢？

总之，一切好的、对的、美丽的、动听的话语，都给汪精卫说光了。如果伟大的音乐家贝多芬在世，他一定要继其颂扬拿破仑之曲而后，编一曲“十全十美”交响乐献给我们这位伟大的革命家了。

但白昼往往见行尸。光明的外套之下罩着丑恶和犯罪之极致。汪精卫之所以不能不这样冠冕堂皇，这一面是表现全国军民的意向究竟违抗不了。而另一面却表现出汪逆行径的“毒到尽头处”，从抗战爆发以来，汪精卫就无时无刻不在活动“中途妥协”活动“做傀儡”，活动“做顺民”，活动做到敌人的“毒到尽头处”。有证据没有呢？“证据何止千百，今且举一个例吧”<sup>②</sup>。

汪精卫的那篇大文《举一个例》就是最好的证据。他说：“主和是我对于国事的主张了。这是我一人的主张么？不是，是最高机关，经过讨论，而共同决定的主张。”接着他举出26年（1937年）12月6日国防最高会议常务委员会议为例。汪精卫一口咬定主和是那次“经过讨论而共同决定的主张”，其为撒谎造谣，已由吴稚老痛加驳斥，不必再费笔墨。我们在这里所注意的倒是汪逆个人至少从26年（1937年）12月6日已经牢牢把握住：“主和是我对国事的主张了。”但这决不是共同的主张，单是汪精卫一贯的主张罢了。

① 汪在1938年1月1日发表的《我们同志应有的决心和努力》。

② 汪在1939年4月1日香港南华日报《举一个例》。



还要举个例么？好，让我们提敌人上堂来作人证。

关于汪兆铭吴佩孚“和平运动展开”的座谈会：

时 间 1939年2月15日

地 点 东京于芝，嵯峨野

出席者 井上谦吉（东洋协会），太田宇之助（东京朝日新闻），冈野增次节（前吴佩孚顾问），小室诚（报知新闻），佐藤安之助（陆军少将），藤田荣介（全权公使），鹭泽与四二（前众议院议员）

记者：“现在请佐藤先生赐教。”

佐藤安之助：“汪兆铭脱离重庆，突然发表声明……事出有因，并非突然。……汪氏从一年前起就频频策划和平。但表现在报纸上还开始于去年10月。那时广州汉口相继陷落，汪兆铭就对新闻记者大谈和平。……但我们在去年三四月间就已经知道了。……”

记者：“汪兆铭的和平论究竟何时开始呢？”

佐藤：“我在去年春天就知道汪兆铭是非常热衷的和平论者，而且知道他在拼命进行和平运动。我今附带谈其经过。去年二三月间我住在上海。我熟识一个朋友，他是汪系的人，我们时常谈论各种时局问题。此公如能参加维新政府，那确是非常有力的人呢。关于他，松井石根君也有许多话（这是对我讲的），但他并未参加。如果我们稍微活动一下，那许是会成功的；只因我们没有活动此举就像告了失败。相反的，那位先生说起要到汉口一行，他就去了。他到了汉口，就详谈谁是主战论者，谁是什么。他和汪兆铭在汉口同住了四个晚上，有两晚每晚恳谈了二三小时。汪氏担心着当时的时局，至于流起泪来。他说：“中日两国这样火并下去，实是蠢事，双方都无好处，反之，都好像非常的损害。只让第三国来收渔翁之利。所以战争必须及早结束。他还



说，像你那样有很多日本青年朋友的人，真要为着两大国的利益，求取和平而努力呀。……我那位朋友年纪五十五六。……所以汪兆铭的和平问题决不是突然而起的。”<sup>①</sup>

实际上我们的证据何必举得这样远呢。听他最后的自供已经完全足够了。他在本年4月8日发表的那封复华侨某君书内，就老老实实说出：“我自抗战开始以来，想到中国不得已而抗战，时时刻刻想到抗战怎样可以持久？怎样可以胜利？同时也想着怎样可以觅得和平？我对于觅得和平的意见，在会议里不知说过多少次了。到了广州丢了，长沙烧了，我的意见更加坚决，更加期其实现。”

汪精卫自己的供状和敌寇佐藤的人证，证明汪逆的主和运动早在开始。这还不明显么？老实说吧，汪精卫的主和策动已经明显到这样的程度使他在公开的言论里也露出了马脚。

当抗战一开始，汪精卫当然满肚子不高兴。他公开发牢骚了。27年（1938年）8月3日那天，他忽然广播他那篇有名的演说：“大家要说老实话，大家要负责任。”他先曲解了历史来发他的乌气。他说：“中国宋末明末曾两次亡国。其亡国之原因最大最实的在于（当然在于吴三桂之流的卖国贼略一端）不说老实话，心里所想与口里所说，并不一样。”他骂人了，但不幸他却骂出了马脚来。他接着广播：“在大战中，俄国败于德国，几乎亡了；德国土国败于协约国，几乎亡了。然足能保存，且能复兴，这都是垂亡之际，人人下了救亡图存的决心，人人肯说老实话。和呢，是会吃亏的，就老实的承认吃亏，并且求于吃亏之后，有所抵偿。”“这种做法，无他巧妙，只是说老实话而已。”汪精卫从那时起已经公开提出和的问题，同时要大家“说老实

<sup>①</sup> 《文艺春秋》，本年3月号页37—38。



话，负责任”。当时大家说莫测其高深。直到今年当我们拜读了他的复华侨某君书才恍然大悟他所谓“老实话负责任”的道理。他说“政府则必须握着现实，不得不战则战，可以和则和，时时刻刻，小心在意为国家找一条生路，才是合理。……一般何苦自讨没趣？何况话一说出口，就被人指为汉奸，一般人心中想想，亡国是大家有份，汉奸的恶名却要我一个人承当，这更是何苦？这么一来，自然而然的，心虽知其危而口不敢言了。”这是不说老实话的原因，也就是不负责任的原因，也就是亡国的原因。但汪先生请听着：和战只在你个人成问题。你对此已经说了“老实话”而且又负了责任，他人是未便奉陪的。那么汪精卫之悻悻然对全国同胞生气，又岂偶然哉！这就叫做社会蛆虫的悲哀！

汪精卫看到单是生气是不够的。他必得对抗战本身加以抨击，始能收他“负责任”之效。他深深知道抗战是他最大的冤家。同时“焦土抗战”，是最能表现我民族的决心，游击战是最能消耗敌人的实力。于是他不用一切曲解和造谣，来打击长期抗战，打击焦土战和游击战。

长期抗战的具体口号是抗战到底。于是汪精卫及其一派就在“底”字上面用功夫了。谁都知道，抗战到底就是抗战要达成胜利之目的才肯罢休（见蒋委员长抗战二周年纪念告全国军民书）。更具体地说，是要打到恢复“九·一八”前原状为止（见陈诚对重庆文化界谈话）。但汪精卫却尽量宣传抗战是“无底洞”，是没有底止的。一打，就要一直打下去。谁都知道，这是骗人的话，同时又是吓人的话。因为历史告诉我们，战争终是有结束的日期的，西洋历史上所谓百年战争也有一定的时期，并非一直打下去，没有底止。照上次世界大战的情形推算，帝国主义列强决不能支持4年以上的战争。因为再拖下去，他们国内的经济政治必然发生危机，国内人民用国内战争来结束对外战争。俄国便是最



好的例子。日本是个小的强国，他所能支持的时期尽管有军人法西斯的极端统治和对我物力财力之运用，但只要我们和它拼下去，就决不能超过4年。但是汪精卫等偏要说我们的抗战将无底止，这只是要恐吓一般老百姓，使他们对抗战胜利失去信心；对抗战前途发生畏惧。其作用正和他强调民族自杀主义一样。

关于焦土抗战，在中国也只有汪逆这类无耻叛徒才把它理解成民族的自杀和自灭。可是他偏要作种种谣言，污蔑我将士“不战而焦土”。他在这里又以蔼然仁者的面貌出现了。“民力必须爱惜”呀！接着又来无的放矢了：“我们必须认识清楚，所谓焦土战者，是因战而至于焦土，绝不是不战，更绝不是即使不战也是焦土。……既然打算不战，则其决心先松懈了，其纪律也就随以废弛了，其秩序也就随之紊乱了。于此而犹言焦土，其结果只有老百姓晦气，而敌人则正如隔岸观火，真所谓亲厚者所痛，仇者而快，万万要不得的。”<sup>①</sup>但汪先生请听着：在五个月前教我们“所谓抵抗，无他内容，其内容只是牺牲的“决不是别人，而正是汪先生自己，那么汪先生到这时才“说老实话负责任”，要使我们“老百姓晦气”，使“敌人隔岸观火”。是不是？正确的严肃的焦土抗战是决不会因为你的污蔑而停止的。那么汪先生又枉费心思了。

关于游击战也是一样。汪精卫偏要诬蔑我们的游击战士为“游来游去，游而不击”：“消耗民力，断绝了长期抗战的生命。”<sup>②</sup>不但如此，他还故意夸大这个问题，使一般民众对游击战发生军事和政治上的恶劣印象。他说“焦土战，游击战这两个名词，本

① 汪在1938年1月13日发表的《如何用民力》。

② 同上。



来是战术的名词，然而流行起来，渐渐成为政治上的名词了。”<sup>①</sup>又说，“有了共产党的所谓游击战，便不愁在地方上还会有一点子遗了。你读过历史，你知道共产党所谓游击战，不过是流寇的别名，人民如禾，流寇则是蝗虫，所过之处没有不食尽烧光的，从前的人听见流寇二字，就会惊心，如今给共产党加上些文章词藻，却被认为抗战到底的秘诀了。”（复华侨书）这就是汪精卫的拿手好戏。他又把他对于抗战本身的打击，扩大而为对国内团结的打击了。但事实很显然，游击战到现在尤其在敌后，已被正确地采用为主要的战术，变成我国策的一部分了。汪逆的打击又扑了个空。

所有这些我们还不够证明汪精卫在抗战以后虽然口头上支持抗战，而实际上却在主张妥协，破坏抗战吗？

第二，上面指明从抗战发动以来，政治情形的基本特点之二，就是国内团结，敌人和他就越没有挑拨离间，各个击破的可能。但汪精卫比苍蝇还聪明，他的作为必须审慎而隐藏。

精诚团结合于抗战本能的要求，它为抗战所必需。它已成为沛然莫之能御的趋势了。那么，汪精卫该怎么办呢？一句话：顺水推舟，暗中摸鱼。他为什么不在表面上也积极赞助精诚团结呢？

我们厌倦的读者们又有机会欣赏那小鸟儿的美妙绝伦的歌喉了。

关于“日本一贯的分化政策”和我们的统一团结，汪精卫用他得意的高音部歌唱着：“日本从前曾作种种宣传，说中国没有国家组织，绝不能统一，但事实上中国已经统一起来了。又说，中国因不能统一之故，决不能作全面抗战，北自北，西北自西

<sup>①</sup> 汪在1938年1月13日发表的《如何用力》。





北，南自南，西南自西南，各不相顾。但事实上中国已经发动了全面的抗战了。又说中国国民党与各党各派必不能相容，且与国民党的意志亦不能一致。但事实上中国民众已经认定国家高于一切，团结起来，为国家之生存及民族民权民生主义实现而奋斗了。凡此皆足证明日本的分化作用越加急激，我们的精诚团结越加坚固。”<sup>①</sup>

多美满呀，真所谓至矣尽矣，无以复加矣。

关于“防共”问题，他劈头就唱：“防共是一个借口”，接着说，“日本宣传：中国容共，所以不能不有此次战争。到了最近，中国共产党军队已经决心御侮，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了，日本趁火打劫的机会从此不再有了。从前中国在江西等处用兵吃紧的时候，日本所加于中国是侵略，如今中国全面抗战的时候，日本所加于中国的也是一样的侵略。日本只老实的承认侵略罢了，还有什么可以借口的。”<sup>②</sup>

说得斩钉而截铁。真所谓至尽矣，无以复加矣。

但事实上怎样呢？汪精卫从抗战发动以来就未停止片刻，进行其损害领袖威信，拆散各党派团结一致之阴谋，有什么证据？”“证据何止千百”且举汪逆自己举出的例子来作证明。

据汪精卫的自供：他在1938年12月26日曾致函国防最高会议。内开：“犹忆去岁12月初，南京尚未陷落之际，德大使前赴南京，谒蒋先生，所述日方条件，不如此明划，且较此为苛。蒋先生体念大局，曾毅然许诺，以之为和平谈判之基础(??)。”<sup>③</sup>真是白昼见鬼！汪精卫只想凭空造谣，污蔑蒋委员长愿

① 《今日救国之遭》，汪在1937年9月在南京平津同学会讲词。

② 同上。

③ 汪文《举一个例》。



意和平谈判，在全国军民之前灭损蒋委员长的威望，分裂抗战阵营，其居心之险毒，真狗皆不公。至于他在第二次国民参政会开会，以参政会议长之尊，竟公开表示反对蒋委员长，挑拨党派之争，更是路人皆见了。

关于共产党问题，他虽然郑重声明“中国共产党已经决心御侮，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使“日本趁火打劫的机会从此不再有”。但在骨子里，却尽量挑拨摩擦，完成他所说的“日本的分化作用”。瞧他那种咬牙切齿的态度吧。“我以为共产党是以捣乱为天性的。主战也捣乱，主和也捣乱。共产党的捣乱，如果于主和时表面化，比现时操纵把持，挑拨离间的局面，只有较好，没有较坏”<sup>①</sup>。好一个敌人的中文宣传品啊。但请分化专家汪精卫听着：“在我们全国一致实行三民主义的中国，若再谈共同防共，完全是无的放矢！”（蒋委员长驳斥近卫声明）“自前年中国共产党声明拥护三民主义以来，事实上中国人民的思想行动，已完全统一于三民主义之下。我们国家法律的最高原则是三民主义。凡不违反三民主义的行动都为合法；凡合法行动的人民都一律受到法律的保障，而中国今天无论何党派，都受着中国国民党的领导，服从法纪，效忠抗战。”（蒋委员长抗战第二周年纪念告日本民族书）“你提到共产不共产，无非想涂说中国赞成共产，应为以防共为幌子的侵略所应征罢了：你可以借求外援的名义借日本兵平内乱了。你这种用心，不是明代的吴三桂，朝鲜的李完用吗？”（吴稚晖先生：进一解）

所有这些我们还不够证明汪逆在抗战以后，虽然口头上支持团结统一，而实际上却在破坏团结和统一么，进而想造成内乱吗？

<sup>①</sup> 汪文《举一个例》。



第三，抗战以后国内外形势的第三个特点，是中苏关系的急激好转和德意在实际上帮助敌人，并设法调停战事，劝我们投降。在这里汪精卫又碰到了难题目。苏联是他深恶痛绝的，但他现在却实际上在帮我们的忙。德意是他的干爷和干娘，但他们都不帮助我们，反而在帮敌人。汪精卫怎么办呢？我们可以老实告诉读者，汪精卫在这里是真是既诡谲，又勇敢。

要说汪精卫不懂得外交上的联合战线，那是冤枉了他。要说汪精卫不知在抗战中应当联合苏联，对抗日本，那更是冤枉了他。汪精卫不要等今天，在15年前对于这些早已了解无遗了。民国14年（1925年）10月2日，他在陆军军官学校就任党代表时就演说道：“我们对于我们打破帝国主义的运动与工作，应该不应该联合战线呢？俄国在大革命以前，也是白种人所建立国家里头一个极厉害的帝国主义者。大革命以后，自己抛弃了从来固有的帝国主义，却被各个帝国主义者，联合起来，将对他封锁，要他生生的冻死饿死。他好容易得了自由，所以对于世界上被压迫民族解放的政策，对于欧洲被压迫阶级便定下了阶级觉悟的政策，这真真是帝国主义的死对头，是打倒帝国主义的急先锋。他的志愿，由他的领袖列宁明明白白的说了出来，世界上12.5亿的被压迫人民，联合起来，向2.5亿的压迫人民，要求解放。我们对于怎样以世界革命打倒帝国主义的先进，应该不应该联合战线呢？”

唉！可怜的同胞啊，没有勇气，却偏要多疑，他喃喃地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俄国何故帮助我们呢，只怕不怀好意罢。”他虽然不相信理论，他不能不相信事实。比如民国六七年间，日本说帮助段祺瑞参战借款与供给军械，却一手将中国无数权利，搜了过去。我们根据这些事实，便可以说日本的帮助，是不怀好意。如今俄国的帮助我们是怎样呢？他起先和中国成立了



中俄协定，将从前帝国时代，对于中国所缔结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和种种特权，一概取消，重订双方平等互遵主权之条约。他随后认定了中国里头哪些人是要做国民革命的，便用他的心力，去帮助那些人，他没有一些别的要求，他没有一些别的企图，也没有占过一些便宜。他没拿过一些利益，他只为帝国主义是中国的敌人，也就是他的敌人，他只求以中国人民革命的成功，促进世界革命的成功。我们虽然不相信理论，难道事实是凭空可以捏造的，是凭空可以抹煞的么？唉！可怜的同胞啊，没有强固的精神，却偏会有虚骄之气！他又呐呐地道，“我们革命，要凭自力，不要求人帮助”。“须知道在这世界大战中，帝国主义在一起，反帝国主义自然也在一起，联合战线的时候，不但互相帮助，算不了什么稀奇。”

又说：“我们这联合战线，是无人可以摇动的，是无人可以离间的，是无人可以冲破的，我们一致努力，一致要求世界革命成功。”<sup>①</sup>

他把当时中山先生的联俄政策解释得这样明白，这样透彻。在大体上，这种解释可以完全适用于当前的情势。但今天的汪精卫却必须打当时汪精卫的嘴巴了。为什么？因为如果当时的汪精卫还是革命的英雄，那么在今天他早成革命的叛徒了。所以，他对于苏联问题，除在参政会上公开指使其死党李圣王陶希圣之流公开反对苏联，主张德意路线以外，在理论和主张上就采取这样的方式。

第一，他故意曲解积极联俄的政策为抛弃对英美法的联合，这样来把联俄问题和国内政治问题和思想问题故意纠缠起来，造成一部分人的疑惧。比方他说：“近来颇有一部分人士持着一种

<sup>①</sup> 《汪精卫文选》，上海更新出版社，页190—193。



见解，以为中国必须抛弃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信赖，方才可以得到苏联真实的援助。……兄弟以为这种见解是看不清楚现在国际和平之路线，看不清楚现在中国须循着国际和平之路线以前进。不用说别的，只怕连苏联也吓一跳，也会把肩头耸起，也会把舌头伸出来。”<sup>①</sup> 是的，汪精卫之虚构事实，捕风捉影的伎俩，是够使人“吓了一跳”“把舌头伸出来”的。但谁都知道，政府的联俄政策绝对没有抛弃对英美法的友谊；民间主张联俄的人也绝对主张中国对英美法苏须作平行的联合。主张不联合英美法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倒不是别人，恰恰是汪精卫汉奸最好的帮手托派阴谋家，他们才主张“我们抗战要打倒一切帝国主义”呢。

第二，汪精卫等拼命造作谣言，说我们的抗战，不是为中国，而是为了苏联。他说，“中日战争就是日苏战争的前哨战。”甚至说，中国抗战可说是“为人作嫁”。这种无耻理论显然在曲解抗战，侮辱抗战。谁不知道，抗战是为求得中华民族自身的独立与生存？抗战是自己的事，决不是人家的事。所谓自力更生就是这个道理。但汪精卫偏要污蔑抗战神圣任务，其目的不外第一，他要打消全国军民抗战的决心和积极自发的精神，让抗战寿终正寝。其次，就是要培养国民对苏联的猜疑，挑拨对苏联的恶感，使中苏邦交发生裂痕。

第三，汪精卫深懂得物极必反的道理，而且他善于运用这个道理。他看到联俄已成固定政策，于是他将欲毁之，必先成之，故意扩大苏联应该援助和必须援助我们的程度。他和他的助手陶希圣等就开始发动一个运动，在舆论上鼓吹苏联必须立即出兵应该立即出兵。请看他的高论：“苏俄明白得很：日本侵略中国，即是侵略苏俄。深切些说，日本之所以侵略中国，就为的是侵略

<sup>①</sup> 汪文《寻求与国与团结民众》，1926年11月12日发表。



苏俄。……所以中日战争无异是日俄战争之前哨战。苏联为共同利害计，与中国共同向日本作战，其为当然尤无可疑。”又说：“日本之侵略中国，所危害者不止中国。世界各国一致前来共同作战，尤其是关系最深之国，剑及履及，前来共同作战，在理论上是当然的。”<sup>①</sup>

你要联苏么？好，你就要希望苏联出兵；因为中日战争就是日苏战争。你必须把肥皂泡吹得这样用力，使它大到破灭了，然后你们的阴谋才能完成。苏联出兵的希望幻灭了，由于联俄的心理基础完全毁掉了，这样来破坏中苏关系，才是最好的计策。但在我们是非常清楚的。抗战是我们自己的事情。“今日我民族虽贫，而其责望于友邦者，唯在善尽其责任与义务，而决不存越理之奢望，与分外之要求。”（蒋委员长抗战二周年纪念告各友邦书）但我们要说汪精卫不知道苏联在当时情势下，决不可能出兵么？那是看得汪精卫太低能了。你看他又会向我们解释（当然这种解释一部分是故意歪曲）得清清白白：

事实摆在面前，苏俄之准备战争与避免战争与其他各国并无二致。而且还有以下几个原因：其一，苏俄为什么由世界革命主义而变为一国国家社会主义呢？是否欲埋头建设，暂时与人无竞与物无争，而养精蓄锐以待天下之变。如其是也，苏俄是否轻于参加战争？其二，苏俄东则有日本之忧，西则有德国之忧，此外还有波兰，还有意国，苏俄所以汲汲于加入国联，与法国订立互助协定，结合英国，乃至美国，其意至昭。在此互助牵制的局面下，苏俄是否以一国轻于参加战争？其三，即专以对日本而论，苏俄地势，在军事上，显然是利于夺取守势，西伯利亚苦寒的气

<sup>①</sup> 《就寻求与国与团结民众再引申几句话》，1926年11月27日在武汉市党部欢迎会上之演讲。



候，广漠的平原，即使与日本支持两三年，莫斯科是不会发生什么影响的，苏俄是否肯轻于改取攻势？以上三个疑问，只要常识常理来说，其他外交秘密，军事秘密，且置不谈，然即就此常识常理来说，已可窥见一斑了。<sup>①</sup>

然则汪精卫是明知苏联在目前状况下是不会出兵而只能以其他方式帮助中国了。知其不能而故意夸大其应该和必须，此无他，不过要毁灭中国人民对苏联的好感而已。

这就是汪精卫之流对苏联问题的看法和实际的做法。

其次我们来看汪精卫对德意的态度。对于这点，他是态度鲜明，真相暴露了。到今天已经谁都知道，汪精卫在内政上是国社法西斯主义的崇拜者，而在外交上便是德意路线的创作者，这里我们只说他在外交上的做法。

第一，他在理论上绝对否认日德意侵略集团和英美法苏侵略集团之存在。德意是可以帮助我们的，所以我们不能把他们撇开。他说：“有人责备道：日德意与英美法苏是两大对垒，正和欧战前德奥意的同盟与英法俄的协商，形成两大对垒一样。中国究竟应该站在哪边？中国为什么还要与德意引成友好关系呢？无怪英美法尤其苏俄有些不放心中国的态度与决心了。”“这话也是奇怪，英国不是明明白白与德国谋友谊之维持与增进么？法国不是明明白白与意国谋友谊之维持与增进么？不宁唯是，英之与意，法之与德，也正在谋冲突之减轻，关系之增重，苏俄之于德意，虽似隔阂，其外交作用，也何尝稍为休息，因为外交作用，莫大于寻求与国，减少敌国。例如欧战以前，德奥意是同盟的，英法苦心孤诣将意国拉出同盟，变为中立，其后还将意国接入协

---

<sup>①</sup> 《就寻求与国与民众再引申几句话》，1926年11月27日在武汉市党部欢迎会上之演讲。



商，谋国之忠，固宜如此。除了会存着一种坏心事，所谓伐人之国，必先伐其交，才会劝人斩断了其他各国一切关系，而一心一意投入一国的怀抱里去。日本前此所谓中国好以夷制夷，即是此一种坏心事之表现，唉！说这些话的，如别有用心，我还有什么希望，如果还有一点爱国心，我劝他快些将这些话收回去吧。”<sup>①</sup>又说，“有部分人士持着一种见解，以为中国至少须把法西斯蒂的国家撇开，这也是不对的。……尤其德国，他因战败之后，备尝痛苦，想解不平等之束缚，恢复平等的地位，其努力更是使我们起敬。”

在这里我们十分钦佩，汪精卫真说“老实话”，而且“负责任”了。当然现在事实证明汪精卫是最具“谋国之忠”和“爱国心”的。所可惜的，他的“爱国”主张未能实现，真不胜遗憾而已。

第二，他在事实上便强迫政府采取德意路线，甚至不惜在参政会上强奸民意，完成这着棋子。同时尽量支持德意“调停”中日战事，威迫我对敌投降。但他不幸得很，他一切卑鄙无耻的企图都给我们贤明的蒋委员长粉碎了。德大使陶德曼之调解失败于先，后来意大利也想染指，竟被蒋委员长毫不客气地拒绝了。他说中日战事如需调停，也轮不到意大利！

这就是汪精卫在抗战发动后，对于外交问题的“理论与实践”。

现在要说到汪精卫民族投降主义在第三阶段的具体表现。

这个阶段的整个形势有什么基本特点呢？第一，武汉广州失守后，抗战无论从国内情势和国际环境讲，进入更艰苦更拖长的

---

<sup>①</sup> 《就寻求与国与团结民众再引申几句话》，1926年11月27日在武汉市党部欢迎会上之演讲。





局面了；但同时第二，全国军民在蒋委员长领导之下坚持持久战的决心更坚固了，对抗战胜利的信心已在更健全的认识基础之上把握得更紧了。第三，敌人鉴于速战速决之不可得，于是加紧政治阴谋，积极分化我力量；同时开始着重于占领地的经营和开发。

一贯主和的汪精卫在这些新的条件之下，那只有三十六着，走为上着。持久抗战的国策和民意，眼看是反对不了了，再加上敌人的诱饵，他便愤然出走，揭破一切假面具，暴露他的真面目：看呀！这位绝顶漂亮的深具“谋国之忠”的“大政治家”原来只是卖国贼一个！直到这时，他才真正“说老实话”真正“负责任”了。

于是他公开说：“主和是我对国事的主张了。”这公开的主张见之于去年12月29日的艳电，见之于今年4月1日南华日报发表的《举一个例》，见之于4月8日发表的《复华侨某君书》。此外还见之于最近几个月来他的广播。这些言论主张之荒谬，卑污与无耻，那简直开人类语言文字的新纪录。他已经从里应外合的内奸，一降而为最卑鄙、最廉价的公开傀儡和应声虫了。所以：

一、日本敌人主张“建立东亚新秩序”（近卫声明），主张“善邻友好”（日本政府12月22日声明），他就立即响应，主张“中日两国，壤地相接，善邻友好，有其自然与必要”，主张“今后中国应以善邻友好为教育方针”了（艳电）。而东亚新秩序者正如蒋委员长所说，是“推翻东亚的国际秩序，造成奴隶的中国，以遂其独霸太平洋，宰割世界的企图的总名称”。<sup>①</sup>

二、敌人主张“共同防共”，（近卫声明）汪精卫就立即响应，主张赞成“以日德意防共协定之精神，缔结中日防共协定”。

<sup>①</sup> 蒋委员长驳斥近卫声明训词。



主张“中国共产党人……应即彻底抛弃其组织及宣传，并取消其边区政府及军队之特殊组织。……吾人必自动地积极地加以制裁”，以完成共同防共之目的。并进一步主张“在防共协定期间内，在特定地点允许驻兵，至多（！）以内蒙古附近之地点为限”，且说“此为中国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所关，必须如此，中国始能努力于战后之休养，努力于现代国家之建设（！）”（艳电）。而所谓共同防共诚如蒋委员长所说：“在我们全国实行三民主义的中国，若再说共同防共，完全是无的放矢。我们可以说，他不过是要以共同防共的名义，首先控制我国的军事，进而控制我国政治文化以至于外交。”“实在是借此名义以亡华”！<sup>①</sup> 敌人“这两年的侵略大战，总之一句话是反中国，不是反共”（蒋委员长抗战二周年告日本民众书）。

三、敌人主张强化“经济单元”（近卫声明），主张“经济提携”（敌政府声明）。汪精卫就立即响应，主张“对此主张，应在原则上予以赞同，并应本此原则，以商定各种具体方案”（艳电）。而所谓“经济单元”，“经济提携”，蒋委员长所说，“不仅是要操纵我中国的关税金融，垄断我国生产和贸易，独揽东亚的霸权，他逐渐推演下去，势必至于限制我们中国个人的衣食住行，都得不到一些自由，生杀予夺，唯其所欲”<sup>②</sup>。

就是这样，汪精卫主张“和平谈判”了。为什么这样“坚决”而“负责任”主和呢？因为他“看透了，并且断定了中日两国，明明白白，战争则两伤，和平则共存；两国对于和平只要相与努力，必能奠定东亚百年长治久安之局；不然，只有两败俱伤，同归于尽”。所以他“希望大家本着独立不屈不挠的精神千

<sup>①</sup> 蒋委员长驳斥近卫声明训词。

<sup>②</sup> 同上。



去……往共同生存，共同发达之大路而前进”。<sup>①</sup>好一条中日共存共荣的大道！但实际上日本帝国主义对此已经吹了几年，而且也已经走了几年。当汪精卫荣任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的時候，日使川樾，日总领须磨之类，不是天天夜夜以“中日两国共存共荣”对汪耳提面命么？当敌人已经发动大规模的侵略战了，他不是在天天唱着他“膺征支那，谋东亚之永久平和”（即汪之谓“东亚百年长治久安之局”）的老调么？现在敌人又在用枪尖来号召所谓“东亚新秩序”和以“日满支三方面合作为基础”的“东亚共同体”了。于是才使汪精卫不但“看透”和“断定”，而且勇敢地奔上那条“共同生存，共同发达之大路”去了。

但汪精卫请听着：我们“今日之问题，只有研究如何继续，并如何抗战到底，而获取最后胜利。除战而外，绝无和平可言。故现在主和者，实即中途妥协，投降敌人，皆当以汉奸论之”。（陈诚部长6月10日招待渝市文化界演词）这是我政府的国策。

于是汪精卫答复了。“我们的老朋友(?)陈嘉庚说，言和平就是汉奸！”为什么和平就是汉奸？如此说来，宪法上规定国家有讲和的大权，是规定国家有做汉奸的大权了。“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匾字，其解释是“忠孝仁爱信义汉奸了！”<sup>②</sup>呜呼！“自从字典上有和平两字以来，从没有这样受到垢辱的”了（蒋委员长7月8日对战地民众广播）。

现请汪精卫又听着：“我们现在无论南北各战场上前方的士气和战斗精神的旺盛，实为自由开战以来未曾有的好气象。……只要前方后方一致认识国家的危机，万众一心，向着最后胜利的目标，刻苦努力，牺牲奋斗，不懈怠，不屈服，深信必能达到抗

① 汪文《举一个例》。

② 汪复化侨某君书。



战的目的。”（蒋委员长驳斥近卫声明训词）这是我政府的国策。

于是汪精卫又答复了，你又说：“现在我们抗战一天比一天好”，你何所见而亡然？……老实告诉你吧，如今抗战实实在在一天比一天艰难了。如何可以说一天比一天好？你难道不知道自抗战以来所失去的地方，其幅员之多，时间之短，历史上宋亡明亡的时候都无其例么？又说“自从抗战开始以来，人民出钱出力，受尽流离颠沛，没半句怨言，将士奋勇牺牲，前仆后继，绝无反顾。这是中华民族的元气。日本之所以提出和平条件，未尝不是看重这一点。……此次和平运动如果成功，实实在在是拜一般抗战民众及将士之赐（?!）”<sup>①</sup>

算了！算了！所有这些也已经足够证明汪精卫之曲解、侮辱和撒谎的本领是空前而绝后了。“呜呼，彼真人妖，愿我民族共被除之，‘毋为戾气所染！’”<sup>②</sup>

汪精卫的民族投降主义之最后的和真正的表现就是这样。

#### 四 反民权主义的假“民主主义”

谁都知道，汪精卫一向以民主政治的倡导者自命。而且他的确曾经是个民主主义者，曾经是个小市民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这是在什么时候呢？这是在他高呼：

“呜呼！我愿我民族实行民族主义，以颠覆 260 年来之贵族政治！”

“呜呼，吾愿我民族实行国民主义，以颠覆 6000 年来之君权

<sup>①</sup> 汪复华侨某君书。

<sup>②</sup> 汪在清末革命时所著《民族的国家》（一），他在这里是骂康有为的。



专制政治！”<sup>①</sup>

是他在革命失望之余，用恐怖手段，暗杀醇亲王的时候。在那时，他有革命的热情和对于民主政治强烈的爱好。西欧民主革命的主流在当时已经消逝了或差不多已经消逝了。在古老的东方却崛起了民主运动的高潮。中山先生就是这东方民族新生运动的领导者，而汪精卫也是这个运动的热烈支持者。这个运动经过辛亥革命，经过五四运动，一直发展到国民革命。这运动的范围是扩大了，它的内容也加深了。汪精卫在这整个过程中是以寒热病的姿态参加的，他在革命艰苦时消极，在环境较好时积极，但大体上还是赞助民主革命的。

中山先生的逝世使汪精卫的个人领袖主义发展到最高峰。客观上革命的发展已经逐渐超过他所能容许的限度，主观上要做全国和全党领袖的野心又那样旺盛。于是小市民的动摇性和向上爬的本能，使他成为彻彻底底的官僚。正像上面所说，中国社会就慢慢地把他从各社会层的圈子里开除出去了。而中国的民主革命在16年后，也早把他扬弃了。

然而这之后，汪精卫并没有放弃他民主政治的标榜。在他个人的派别小组里，在初期也还是团结一些中小市民区的民主主义分子。不过汪精卫的实际活动却完全证明了：他之所谓民主政治，不过是结合过地方封建力量反对中央，反对蒋委员长的招牌而已。因之他的民主主义已经完全失去革命的本质。西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它固然够不上，在历史发展的阶段来讲，甚至连俾斯麦的大统一主义和落后的联邦主义也比他进步呢。这种理论在实践上的表现便是他之结托封建落后力量，反对进步势力，害怕民众，并剥夺人民的自由。

<sup>①</sup> 汪文《民族的国家》(二)。



中国民主运动的两大任务，在国内是反对封建残余，对外是反对帝国主义。汪精卫力求与封建势力相结合，这已经破了汪牌民主主义的半边；至于汪精卫和帝国主义，尤其是和日帝国主义的关系那更是人人知道的事情。从“九·一八”以后，汪精卫就干脆以日本帝国主义代言人自居了。于是汪精卫的“民主主义”就彻底宣告破产。

西安事变后，全国精诚团结成为国内政局固定的趋势。当时汪精卫和日德帝国主义相勾结，想乘机回国，实现其东方佛朗哥式的统治。结果他在全国拥护蒋委员长，领导国内团结统一，对敌执行抗战的压力之下，失败了。国内的团结和民众的奋发，奠定了最近中国民主政治的基础。这个基础从抗战开始以来是更加巩固了。民众运动日渐展开，出版言论日益蓬勃。特别是国民参政会和省议会会议的成立，表示中国民主政治已经逐渐走上轨道。蒋委员长在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议开幕时，就说明参政会的基本任务，一在加强团结，巩固统一，完成抗战建国大业；一在建立民主政治的基础。

汪精卫是摘取果实的能手。他看到真正的民主运动已在开展，于是就以老牌的“民主政治家”的资格，荣任国民参政会的议长，积极推行他的“民主政治”了。

第一，民主政治的基础当然是民力和民意的发扬。抗战本身要求着全国人力物力的总动员。汪精卫不明白这点吗？当然明白的。他说：“抗战不只是前方将士的事，而是全国各地民众的事。民众之努力与否，为抗战能否持久而得到最后胜利之最大关键。所以团结民众，在平时固属重要，在抗战期间，尤为紧急。”<sup>①</sup>又说：“近来敌人每到一处，便急急忙忙组织傀儡政府，即是以

<sup>①</sup> 《寻求与国与团结民众》。



此秘诀（按即‘以中国的钱，养中国的兵，来杀中国的人’。而汪逆现在正运用这个秘诀一端）为其蓝本。我们如果不以十二分的努力，唤起民众，则此种浩劫，决无可逃。”<sup>①</sup>

汪精卫对于唤起民众的实际做法，人们在“团结民众”已属“重要”的“平时”，已经领教过了。至于战时，他本身既不要战，根本上又怕人民伟大的力量，所以更不消说得。因此他一面虽把团结民众的口号高唱入云，另一面却用各种理由来限制民众力量的发展。当然，汪精卫在这些地方的说法一定又是非常巧妙的。他说：“如何才能团结民众呢？有人说道，欧洲大战期间，如英如法，皆是不分派别，一致团结……只要认定国家高于一切，便能团结起来，一致努力。这种说法在国本已定，民主政治已经告成之英法等国，自然可以行得了。如果在本国正在树立的过程中，民主政治正在开始训练，尚未成熟的中国，今日就不能不再加以考虑了。”<sup>②</sup>再加以考虑之结果，自然不得不加以约束和取消了。

再看他对于热烈的民众运动加以怎样的歪曲和打击。他说，“颇闻有人说道，为什么这次抗战反不如北伐时之处处看见民众大会呢？（我们只听见说，北伐时处处有热烈的民众动员，而不单是民众大会一端）欲解答这个疑问，与其说是战况不同，毋宁说是意义不同。北伐的意义重任在政治，（对不起得很，我们最高领袖指示我们，现在也是政治重于军事，那你将又何说！反正你总是反其道而行之就是了）故热烈宣传最为重要。此次抗战是为国家民族生存而奋斗，（在你是只要自求牺牲，所以只要挺死不动，让敌人来杀头好了！）其意义是人人知道的，故沉着工作

① 汪在1937年11月18日广播：《怎样才能持久》。

② 《寻求与国与团结民众》。



较之热烈宣传，更为重要”。（汪逆把热烈宣传与沉着工作故意对立起来，谁知热烈宣传之后更能有意识地沉着工作）接着他骂人了：“可惜那些只唱高调不负责任的人，只晓得民众大会（？）不看见民众的埋头工作，所以会发此疑问。这不值得一辩。”<sup>①</sup>

汪精卫既然实际上不要团结民众，唤起民众，所以他在国民参政会上对于一部分参政员所提出的“调整民众团体以发挥民力案”，“请中央通令全国军政机关切实保障人民权利案”以及“具体规定检查书报标准并统一执行案”等等条件，就不得不竭力从中阻挠，加以抨击了。

第二，抗战中的民主是以全国的精诚团结为前提。在抗战的大目标下没有各种社会力量，各个民族力量和各种政治力量之合法存在和合法工作，当然就谈不到民主。中山先生在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关于民权做了如下的解释：“民国之民权唯民国之国民乃得享之。……详言之，则凡真正反对帝国主义之个人及团体，均得享有一切自由及权利。凡卖国国民，以效忠于帝国主义及军阀者，无论其为团体或个人，皆不得享有此项权利。”

很显然的，汪精卫虽然口头提倡民主政治，却决不愿给“真正反对帝国主义之个人及团体”“一切自由及权利”。为什么？因为他自身“卖国罔民，以效忠于帝国主义及军阀”，他根本已失掉“民国之国民”之资格，如给人民真正的民权，他就得被人民撵走。所以他必须挑拨离间，剥夺一切真正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团体与个人之合法权益。在这里他表现得最明显的，就是他遵从其日本主子的命令来“共同防共”，而实际上就是要分化国内的抗战力量，便利日寇的各个击破。

第三，中山先生的民权主义是要叫“人民管理政事”，叫人

<sup>①</sup> 汪文《怎样才能持久》。





民有“政权”。<sup>①</sup>要“(甲)实行普选制度，废除以资产为标准之阶级选举；(乙)以人民集会或总投票之方式，直接行使创制复决，罢免各权；(丙)确立人民有集会结社之言论出版居住信仰之绝对自由权”。<sup>②</sup>但汪精卫却要我们效法德意，用假的民主主义，来实行真的法西斯主义。

汪精卫之在外交上主张德意路线决不是偶然的。他渴慕着德意现行的统治状况。他想做希特勒的好徒弟。他说：“德国，它因战败之后，备尝痛苦，想解除不平等之束缚，恢复平等的地位，其努力更足使我们起敬。”<sup>③</sup>但我们都了解，法西斯主义是金融寡头最残酷最野蛮的统治，国社党的德国只是蒂森（Tnjsen，德最大金融资本寡头）的王朝。它并没有使人民真正解除不平等之束缚，正相反，他们所受的束缚和压迫更多更严重。所以希特勒的统治使全世界人民（连德国人民在内）慄慄危惧，并没有肃然“起敬”。真正对他“起敬”的只有佛朗哥、汉伦和汪精卫之流而已。但最后请汪精卫注意者，在40年代的中国，无论你怎样努力，是行不通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的。姑不论中国根本没有强大的金融资本，中国伟大的民权运动的传统，尤其是目前的民族革命战争也把一切移植法西斯主义的根源彻底铲除了。汪精卫如果真要在中国或者在上海虹口饭店试行其法西斯主义，那至多只是日本军人法西斯主义在殖民地的延长。而且就是这个延长也只能是昙花一现而已。

这就是汪精卫的反民权的假民主主义之真相及其可能的前途。

① 《三民主义演讲集》，民权主义第一讲，页2。

② 《民十二年初国民党定宣言》。

③ 《寻求与国与团结民众》。



## 五 反民生主义的“猫哭老鼠”主义

汪精卫相信不相信民生主义呢？在他主观上当然是不折不扣“相信”的。而且从抗战爆发以后，他似乎显得特别“相信”民生主义。他也跟一般人在讨论民生主义是不是资本主义的问题。他也极端主张在抗战时期应该“根据民生主义来实行计划经济，使重工业归之国营”，<sup>①</sup>等等。而且汪先生是有情人，他一提人民的生活，就要“下泪”。比如他在湖南地方干部学校演讲时，就说：“一提到民生主义，我们就悲从中来。我们现在看不见民生，而只看见民死。……大多数人民都是无以为生而死。我们看到城市的情况，已经满心难过，看到乡村中的情况，更难过百倍。”

眼泪汪汪的好心人儿呀！但请不要着急，“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汪诗，见《民族的国民》其一）你提出你的办法来好了，何必春愁如此呢。

于是我们来看汪精卫的“民生主义”政策。

开头当然先得把那些错误的主张劈掉呀，所以他说：“我们要根据民生主义的计划经济而努力。说到这点，我们要说明一句：就是这话决不是有一类人所唱的改良人民生活，改良士兵的生活的口号。我们固然很想改良士兵生活，人民生活，但这不是白想可以有效，我们不能以空空洞洞的口号来自欺欺人。我们要有切切实实的办法才可以说得到，做得到。”<sup>②</sup>

<sup>①</sup> 汪文《地方行政与抗战建国》，在湖南地方干部学校之演辞。

<sup>②</sup> 同上。



那么什么是切切实实的办法呢？凡事总要从那些人们已经真说“老实话”，真已“负责任”的时候起，才能找到他们说到做到的切切实实的办法，根据这个定理，我们就不得不从汪精卫出走以后的言行中去找他的“民生主义计划经济”纲领。下面就是：

“纲领一”中日经济提携——（说明）“经济提携，此亦数年来日本政府屡曾提议者，吾人以政治纠纷尚未解决，则经济提携无从说起。今者日本政府既已郑重阐明尊重中国之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并阐明非欲在中国实行经济上之独立（？）亦非欲要求中国限制第三国之利益（？）唯欲按照中日平等（？）之原则，以求经济提携之实现。则对此主张，应在原则上予以赞同，并应本此原则，以商讨各种具体方案。”（艳电）我想具体方案应该先是汪先生的“重工业归之国营”，让日本政府可以先握中国经济的命脉。

一向主张民主政治的汪先生，能让我们有几分批评的自由么？如蒙允准，那么我们全国人民都将这样讲，而且也只有这样讲：“敌人所说的经济提携或所谓经济集团，不仅是要操纵我中国关税金融，垄断我国生产和贸易，独擅东亚的霸权，他逐渐推演下去，势必至于限制我们中国个个人民的衣食住行，都得不到一些自由。生杀予夺，唯其所欲，整个的使中国民族做奴隶，做牛马，在鞭笞吮吸之下，整个消灭我们民族的生存。”（蒋委员长驳斥近卫声明）所以你的“民生主义”政策是民死主义政策，是敌存我亡的政策。

“纲领二”立即求和，挽救生灵，保全民生。——说明“自从抗战开始以来，人民出钱出力，受尽流离颠沛”。“你身在海外，所见的只是文章词藻，以为有了这样抗战到底的秘诀，自然抗战一天比一天好。可是在内地所身受的的人民，其痛苦是怎



样？”<sup>①</sup>“20个月的苦战，日本的消耗，不为不大，中国的牺牲，不为不重，两败俱伤，同归于尽的一条路，与共同生存共同发达的又一条路，明明白白，摆在面前，两国有志之士，难道羞于一时的祸福毁誉，而徘徊瞻顾，不敢显然有所取舍吗？”（《举一个例》）为要执行这个策略，所以汪逆在港沪的机关报和机关刊物都在宣传抗战时民生的疾苦，描写得使人一看就“悲从中来”。

一向主张民主政治的汪先生能让我们有几分批评的自由吗？如蒙允准，那么我全国人民都将这样讲，而且只有这样讲：“在敌国已经宣布东亚新秩序狂论以后，很明显的他对我们中国除了要整个灭亡，成为他的奴隶以外再没有和平的余地了。我们对于敌人今天也只有胜利，只有完全达成我们抗战的目的。除此以外，亦绝没有其他第二条可走的道路，否则中途投降，就是汉奸的和平，换句话说，就是奴隶的和平。”（蒋委员长抗战二周年纪念告全国军民书）“人家可就不能不看透你们的假面具，知道你们猫儿哭老鼠，其实可笑！”（吴稚老《进一解》文）

这就是汪精卫的反民生主义的猫哭老鼠主义的两大纲领。汪逆一面为虎作伥，主张中日经济提携，让敌人整个断绝中华民族的生存，另一方面却假仁假义，同情民众疾苦，实际上也要借此来煽动我国民众，对抗战不满，对政府不满，在敌人的分化政策之下，结束对敌人的英勇抗战。这就是汪逆猫哭老鼠主义的本质。

古今中外一切最毒辣的反革命分子，口头上总是涂着革命的粉墨的。这本是汪精卫的新发明。在100多年前法国的卖国贼提亥尔口口声声以“工人的解放者”自命，结果出卖了巴黎。20多年前苏联的卖国贼煽动克隆斯泰特（Kronstadt）的叛乱，以

<sup>①</sup> 汪复化侨某君书。



图推翻政府，投降帝国主义干涉军队。现在的汪精卫由于那些“左”的阴谋家之帮助，自然可以更技巧了。你听他们漂亮的“革命的”词藻吧：“国民党今日应和，尤昔俄国布尔什维克和列宁对布列斯特和约之解释是：如果和德国火拼下去，俄国不一定亡，但共产党政权则必亡。我们现在如果再和日本火拼下去，中国也不一定亡，但国民党的政权则必亡。”<sup>①</sup>多么有力的煽动口吻呀！好一个伟大的中国的列宁——汪精卫先生，他比起那自称为“工人解放者”的法国提亥尔先生来自然又“伟大”和“革命”得多了。

## 六 卖国三部曲

我们对于汪精卫反三民主义的反革命的卖国理论已经粗粗作了一番检讨。现在这结论部分我们要扼要地分析汪逆卖国行动的过程及其必然的前途。

汪精卫的全部卖国过程是个喜剧性质的三部曲。这三部曲中，第一部的角色是奸细，第二部的角色是傀儡，第三部的角色则是一具死尸。现在的汪精卫正在由第二部曲得意地过渡到第三部。

从“九·一八”事变起，日本帝国主义对华的政策就从以华制华的分裂政策，发展而为企图不战而胜的蚕食政策。在这时期，敌人的侵略从经济的侧重到政治的，而我们的汪精卫先生就从那时起变为日本对华实施政治侵略的适当工具。敌人利用他在党国的声望，利用他的唯利是图和不坚定性，利用他的领袖欲和排他性，再则利用他轻巧的政治手腕和雄辩的口才，满想在中国

<sup>①</sup> 《绥和战问题之讨论》，南化日报社版，页17。



造成一个汪系的亲日政治组织，正像希特勒在捷克苏台区造成的汉伦党一样。同时在全国范围内，敌人则想透过汪氏这样一个负责人的地位来间接控制中国的一切。

这时期整个局势的特点如下：（一）敌人在那时尚在积极准备战争的阶段，所以对于中国主要为实行政治侵略，扩充特务机关活动，对其他列强在华利益虽尽量排斥，还不敢公然挑衅。（二）在我国内，内战尚未停止，民众虽有反日救亡运动，但这尚未形成国策之决定部分。在这种情势下，汪精卫的亲敌政策，通过较隐藏的方式，发挥了极大的作用。这个政策一方面助成了该阶段敌人以政治为主的侵略政策，另一方面严重地阻碍了抗敌工作的准备和发动。

谁都应当肯定，汪精卫在那个时期已经开始了他的卖国活动。

“七·七”事变一起，局势根本变动了。第一，敌人的侵略已经以军事进攻为主。第二，我国已发动了抗战。日本帝国主义慢性蚕食的局面和中华民族的忍气吞声的局面，一变而为中日公开斗争的局面了。敌人一开始就采取了以强吞弱的传统方针——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他想很快地占领我主要城市，歼灭我战斗主力，用挑拨离间，制造傀儡的办法，来瓦解我们的抗战阵营，消灭我们的战斗意志。一句话，要想一战而灭中国。

在这时候汪精卫面前有两条路。一条是站在全国军民一边，坚决对敌抗战。另一条是站在敌人一边，阴谋阻挠我抗战。而汪精卫者，毕竟是一个毫无社会根基的泡沫，当全中国人民无论哪个阶级都参加民族抗战的立场的时候，他和另外一些中华民族的渣滓和蠢贼，便潜伏在抗战阵营内，阴谋破坏，从中捣乱。一句话，他从那时起，就想做中国的汉伦和卡萨陀。或者等而下之，他完完全全以一个最卑鄙最无耻的奸细的姿态活动了。



汪精卫的阴谋卖国已经跟着日本帝国主义对华侵略方式的改变，采取了不同的方式。他已经再不是做某种政治派别（如他以前所领导的那种派别小组）而活动，而是以完全执行日本军阀和特务机关指令的敌探内奸的领袖资格而活动了。对于这种变化，我们是要严格指出的。什么叫做某种政治派别的政治工作呢？这个政治派别有其一定的政治立场和纲领，同时敢于在全国人民面前宣布这种立场和纲领，取得人民的信仰，或叫人民去执行。这种立场和纲领尽管错误百出，或极不健全，但是他们并不怕向人民宣布。在“九·一八”前后汪精卫的活动虽然已经失去了全国国民的信仰，但还不失为一种政治的活动。

但“七·七”以后的情形就完全不同了。一面日本帝国主义的公开军事行动已经不允许汪精卫再堂堂正正做亲日的政治运动，另一面中国全国军民在蒋委员长领导之下，进行坚决的对敌抗战，再不让汪精卫有做公开亲日运动的余地。于是汪精卫就在全国人民面前隐藏起来，遮盖着自己的真正政治面目，暂时不“说老实话”，处处顺风转舵，跟在人家后面讲话，人家说长期抗战，则颂扬之，人家要精诚团结，则讴歌之。他生怕自己的政治面目给人们发现，就立刻要给人民大众当做好细来撵走。

这就是汪精卫在其卖国的第一部曲中所演主角的真相和本质。

但不幸得很，汪精卫的第一部曲却跟着日本帝国主义第一期对我作战的失败而失败了。敌人速和速决的方针，没有成功，同时又因为不能和不愿真正长期作战，所以就用速和速结的办法，劝诱我国向他中途投降，求得“汉奸的和平，奴隶的和平”。此后的情势就有下述的特点：

第一，敌人占领地区扩大，战线极度延长，所以就采取经营敌后为主，相机进攻为辅的新方针。具体说来，就是（1）积极



经营我沦陷区域，开发经济，建立傀儡组织，收买我民心，利用我国人力物力，还击我们的持久抗战（敌人口号所谓“以战养战”）。利用我国人力物力，还击我们的持久抗战（敌人口号所谓“以战养战”，“利用现地物资支持战争”，发动“长期战及国家总力战”，<sup>①</sup>及“持久战非中国专卖品”等，均指此而言）。（2）利用汉奸卖国贼，挑拨我内部的团结，使我抗战力量瓦解，造成不议而和的局面。（3）军事上看国际情势的缓急，自身兵力的分配，以及我方之弱点，相机作跳跃的进攻。

第二，英美法苏等友邦仍支持我们抗战。资本主义列强虽并未采取积极的反日政策，但在现有情况下，还不愿并不能完成调停中日战争之企图。英美法对中国决不愿像英法在西班牙一样，制造米亚哈及卡萨陀一类的投降政府，拱手让给日本。

第三，我全国抗战到底的意志越加坚决，抗战的力量越加强大，团结统一的局面日趋巩固。这使得敌人几乎无懈可击，汉奸几乎无地自容。

这就是汪精卫在去年脱离重庆前后的实际处境。中国人民一向是宽大为怀的，所以在这样的中华民族之前，汪精卫实在还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痛改前愆，彻底悔悟，追随蒋委员长和全国军民，立功赎罪。第二条路，就是溜之大吉，公开去做傀儡。而汪精卫者毕竟不仅是毫无社会根基的泡沫，而且是毫无民族根基的赘疣。他舍大路而不走，就去奏他的卖国第二部曲——居然粉墨登场，做傀儡去了。

汪精卫目前的傀儡活动，当然是前一阶段奸细活动同样是无固定政治面貌和无原则的行动，但傀儡的活动比之于奸细当然更无耻了。这里主要的区别如下：

---

<sup>①</sup> 陆军省纪念“七七”两周年小册子。





一、傀儡活动表示奸细活动已经不能再进行的一个阶段，因此他虽然更鄙劣，但从本质上是更脆弱，更无力了。

二、傀儡活动不同于奸细活动，他已经是公开的卖国，所以无论国外和国内取得同情的可能更小了。

三、但同时必须注意，汪精卫之公开卖国并没有减弱他的奸细活动，他在国内外正布置这种阴谋机关，扩大其原有内奸和敌探工作。

四、汪精卫公开卖国以后，因为敌人采取新的政策，其危害民族国家的活动范围已大大扩充。首先他必须完成统一的中央傀儡政权，必须建立名义上统一的伪军。不但这样，他还要积极开展其分化我内部力量的阴谋，破坏我精诚团结，削弱我战斗力量，以完成敌人的新策略。他要组织他的汉奸党（名义一定很漂亮），包含一切奸细托派分子（这组织已在日方特务机关指示下开展）。

五、最后汪精卫的奸细集团扩大而为汪逆的傀儡集团，必然地会使汪精卫实际上成为实施恐怖手段的暗杀集团的首领。现在褚逆民谊在上海所主持的所谓“反共(?)救国(?)特工指挥团”，就是这一组织的雏形。这个组织将直接受日帝国主义特务机关的指挥，执行其暗杀我抗战有力人物的任务。

总而言之，汪精卫在目前已经公开地自己宣传为卖国匪徒的头子了。这就是汪精卫在其卖国的第二部曲中所演主角的真相和本质。如果他当奸细的时候，我们对付的办法应该是群起而攻之，驱逐他出境的话，那么当他做公开卖国贼的时候，我们对付的办法当然只有通缉他消灭他了。

但汪精卫要公开做傀儡，做中国的佛朗哥究竟能不能成功呢？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因为：

第一，汪逆本人及其党羽的力量，如和佛朗哥相比，那简直



太差了。他既没有军队，又没有社会基础，干脆地讲，他没有像佛朗哥那样有反动的实力。

第二，敌人不容易有个安全的占领地带，让汪精卫来当现成的傀儡。因为我们沦陷区的民众和游击队不容他这样做。此外，敌人也未必一切专相信他，汪精卫要想做王克敏、梁鸣志等大汉奸的头子还是不容易。

第三，我们全国军民不让他做成佛朗哥。我们抗战到底和精诚团结的国策是神圣的。只要我们继续抗战，巩固团结，汪精卫不仅做不成傀儡，他之“为敌人殉葬”是无疑的。且让我们的蒋委员长再度严词斥责，送他入棺吧：

“在过去抗战两年中，军事外交等等一切的经过，都是我们处于主动，敌人几乎是步步都随着我们预计的而自陷于罗网和失败之中，敌人愈挣扎愈错误，我们愈持久愈坚定。其中最关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去年12月22日敌相近卫的声明。自从我们抗战进入第二年之后，敌人没有一天不求速了战事，但他所用的方法，并不从彻底觉悟前非，根本放弃侵略入手。乃是因不能速战速决，而希冀速和速结，并且要想用最阴险最卑劣的手段，用比较过去对朝鲜还要狠毒还要凶恶的办法，根本上想来彻底吞灭我们中国。他这个狡计毒谋，我在当时已经有详细的驳斥，我们军民必定已透彻明了。他这一尝试的失败和他的阴谋被我揭破是敌国一个最大的打击，也是他最近徬徨无计日趋穷途末路的一个大关键。但是这一个妄念，他到如今是依然没有打消的。他已经揭布出来了的东亚新秩序的口号，是不能收回的。所谓东亚协同体和兴亚院等等一套，是明知失败，而不肯放弃的。敌人此心未死，余波未息，这一个运动，必然还要继续地演下去。我们一意抗战，本来不值得再提。所是堪痛心的，乃居然有无耻之徒，响应这个亡华灭华的声明，公然做背叛党国出卖民族的行为，虽然



已经受到了举国民意的痛斥和国法的制裁，终不能不说是我们抗战期间一个最大的污点，更是多少先烈在地下不能瞑目的一个最大的遗恨。老实说，这些汉奸的所谓和平运动，实在是亡国运动，如果敌人和汉奸得遂其毒谋，那么‘东亚新秩序’建立之日，就是我中华民国灭亡奴隶地位确立之时；东亚协同体成功之日，就是中国实行归并于日本之时。在敌国已经宣布‘东亚新秩序’狂论以后，很明显的它对我们中国除了要整个灭亡成为它的奴隶以外，再没有和平的余地了。我们对敌人今天只有胜利，只有完全达成我们抗战的目的：除此以外，亦绝没有其他第二条可走的道路，否则，中途投降，就是‘汉奸的和平’，换句话说，便是奴隶的和平，灭亡的和平。除非存心出卖整个中国的汉奸，决没有人再来否认这一个事实，本来在去年年底，我们抗战二期开始，内外形势，显然好转，胜利目标，即在眼前。这些汉奸们，却要在此紧要关头，破坏抗战，想以无耻谰言，欺骗民众，动摇我们同胞对于抗战的信念，陷害我们浴血苦斗的将士，抹煞我们全国军民殉国殉难无数牺牲所造成的功绩，陷了本国，去解救敌国。我们翻遍历史，实在找不出这种丧心病狂寡廉鲜耻伤天害理的先例。实在说起来，敌人宣布一套‘东亚新秩序’实在不仅是对中国下毒手，也无异于向世界宣战，无异于宣布与全世界为敌。敌人的心中意中何尝有想到丝毫的和平，这些汉奸们却不想敌人是已经自掘了坟墓，埋葬了自己，却要背叛国家甘心为敌人殉葬。”（抗战二周年纪念告全国军民书）

“汪精卫已经死了，但他还没有躺下去”，而我们这一民族巨人的怒吼，必然将引导着我们全国军民铭心刻骨的哀愤，咬牙切齿的坚忍，如火如荼的朝气，排山倒海的力量，淬厉奋发作殊死战，完成捍卫国家，驱逐暴敌，复兴民族之大业。（抗战二周年纪念告全国军民书）而把这些无耻汉奸的死尸打得躺下去。



这就是汪精卫在其卖国第三部曲中所演主角的真相及其必然的前途。

现在汪精卫这幽灵还在得意地唱他第二部曲。他在粪秽中度过他的狂欢节。他正继承着古今中外一切卖国贼的无耻与卑污，进行其鼓励外敌侵入，掀起内乱<sup>①</sup>和破坏后方秩序的大阴谋。他要建立起外国奴隶主在中国独占的血腥统治。他到现在已经无所谓理论了，他也根本用不到什么理论了。假如他还有所谓主张，那只是日本强盗的血淋淋刺刀，上面刻着“昭和十四年制”等等字样。而我们必然能用全民族的持久的无敌的斗争来粉碎这位幽灵的魂魄的。阿门！

(抗战二周年纪念日子于重庆)

---

<sup>①</sup> 吴稚老所引陈璧君在沪谈话：“我们不惜起个内乱。推倒他（按指蒋委员长），和成了，就让汪先生出来组织中央，国就不亡。”又汪复化侨某君书中有云：“一旦不幸到了□□□的时候，我还有希望名正言顺出来收拾。”



### 三、关于 30 年代的 世界经济



## 火药气下的世界景气

全世界的军阀和资本家都在喝彩，恐慌已成过去，新的景气已经来到了！

不错，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业生产从 1932 年的下半年起确乎已有增加的趋势。1933 年的工业生产，如和 1929 年的繁荣年头相比，自然还差得太远（约低 30%），但较 1932 年却已有 13% 上下的增加。就在本年许多国家的工业生产还在继续增加。好比日本竟已恢复到恐慌以前的水准，股票的价格异常腾贵，特别是制麻业、造船业、煤矿、钢铁业以及毛织业的股票价格指数已经超过 1931 年 3 倍到 4 倍。

全世界的军阀、资本家以及一般学者们现在都在祝福这新来的“景气”。他们万分鄙视所谓资本主义世界基本的矛盾，他们胜利地用人办的办法把恐慌克服了。

目下他们在克服恐慌的挣扎中，所惯用的主要办法，有下面三种：第一，是热烈准备战争。各国的资本家都在暗地盘算，假如新的战争起来，军火生意必然扩充，新殖民地必能到手。因为各国都在准备战争，因此年来军火生意特别“兴隆”，军需工业以及和军事直接或间接有关的工业部门也都“神气活现”，于是



少工厂的业务不仅恢复恐慌以前的原状，甚至超过以前几倍。他们的股票价格急激上升，一部分资本家的口袋里从此便装满了火药气十足的“景气”。

第二，是厉行通货膨胀。所谓通货膨胀就是将流通的货（货币）拼命地扩张，使币价跌落。物价人为地上涨。资本家所最苦恼的是物价低落，因为这样就减少了他们的利润。现在物价对于币价既然作相对的上升，那么他们在国内市场上自然又能“大沾油水”了。此其一。此外，币价低落能使出口便利，换句话说，他们出口货品的价格，便会跟着币价之跌落而跌落，因此他们在外国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就提高了。英国和日本从1932年以来，美国从1933年以来，他们在世界市场上的角逐，主要地就靠着这柄武器。

第三，是加紧对于工农的榨取。资本家在刻薄劳工和农民的时候，是把“国家”观念摆在脑后的。只要你有剩余的劳力可被榨取，那么不问你是本国人也好，外国人也好，他们便用尽方法，如通货膨胀，取消失业津贴，减低工资，增加工作时间，加强劳动强度，实行强制劳动，掠夺殖民地，扩展投资加紧剥削殖民地大众等等，来缓和自身的危机。比如日本的“景气”主要地就建筑在这种国内和外国大众的枯骨堆上。

作者很想把上面的几种办法，逐项在本文中提出讨论。至于本文所能说到的却只限于第一种办法。

仿佛有人这样说过：“战争是可怕的吗，是的。可是战争所给予的利润也很可怕呢！”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也惟有这个真理才能引动全世界的军阀和资本家不管千百万大众的厌恶战争，仇视战争，拼命地拉着世界向战争的路上迈进。且来看看战前期内资本家们所捞到的红利是何等“可怕”。

近几年来世界贸易的总额虽在“江河日下”，军火的输出却



如“日上竿头”。

世界出口贸易和军火输出

年 份	世界出口贸易	世界军火输出
1928	100.0	100.0
1931	58.7	58.9
1932	39.5	63.7
1933	36.0 (约数)	75.0 (约数)

就各国来看，法国军火的输出从 1931 年来，几乎增加了 4 倍，捷克 1932 年到 1933 年增加 2 倍。军火工厂所得的红利，煞是可观，如法国的薛乃宝·克鲁索公司在恐慌中仍有 25% 的红利，捷克的斯可达公司的红利，在 1931 年为 17.5%，到 1932 年增加到 21.9%。军需工业的股息既然如此优厚，股东们自然会笑逐颜开，而各国的政府对于他们也抱着一种愉快的心理，他们用种种方法来促进军事工业的扩张。列强的政府都在援用津贴金的办法来支撑各种有军事意义的工业部门。例如德国国社党政府对于非铁质金属（对军用品制造异常重要）工业支出巨额津贴，便是一例。美国海军部长史璜生和海军委员会主席文生且用救济失业，扩大工业生产的名义，来实现其添造军舰的企图。目下各国政府对于本国的汽车工业，航空企业非铁质金属和特殊金属的生产，特殊化学工业等等最有军事意义的部门，都尽量辅助，促其扩展。

在现时军事技术之下，一切重工业部门几乎都和军需品制造有关，因此近年来五金工业，汽车工业，化学工业都在很快地扩张。现在先举几种战时所最需要的金属世界生产量为例：





(单位：千吨)

	生铁	钢	铅	锡	锌
1932年最低1月产量	2.749	3.532	85.9	5.5	58.4
1933年最高1月产量	4.732	6.838	109.6	8.0	97.4

这种生产增加的趋势入本年以后还在继续。又如资本主义各国的汽车工业自1933年夏季以后，也有突飞猛进之势，汽车技术的改进（如汽油引擎之为第色尔引擎 Diesel engine 代替），汽车工厂的广泛地兼制各种战争时用具（如美国福特汽车公司的兼造各种战车），都在普遍推行。德国国社党政府的推进汽车工业最为出力，他们预备将整个军队机械化起来。

化学工业生产的扩张，也在军事准备的要求之下，急激进行。例如日本的住友、三池等公司的“肥料”生产（肥料其名，军事化学品其实），在1933年较1932年增加了2倍。美国去年上半年造磷酸的生产较前年增加12%。化学工业的红利足以表示推动其扩充生产的动力是何等激烈。美国的杜邦公司1933年第二季的红利较第一季增加64%，如和1932年同期比较则增加了100%。英国古尔脱公司的红利，1932年上半年期为1.25%，到1933年上半年期增加到1.5%。日本各大化学公司的红利都在飞涨，如将1932年上半年期的红利和1933年同期相较，则朝日自8增为10，帝同自10增到15，东洋自6增为8，昭和从8增为12。

资本主义列强除了积极扩充各种与军事有关的工业以外，对于和战争有密切关系的商品的积存，也予以最大的注意。现时各国都在努力增加这类商品的输入，同时防止或限制他们的输出。例如最近期内几个国家的非铁质金属的进口额很快地增加。同时有一两个原来有铜输出的国家，现在因为准备未来的战争，维持



铜的适当贮藏量的关系非但不准输出，甚至再从别的国家输入。资本主义各国为要确保战时物品的供给，往往在贸易方面结成多少个集团。例如英国和丹麦就缔结了一种商约，规定农业国的丹麦在战时应当作为英国的食料根据地。又如日本的三井物产公司在1933年下半期也想和秘鲁订立商约，规定由后者经常供给棉花。此外日本还想和巴西订立一种互惠条约，规定前者替后者建造军舰，后者供给前者以棉花（但巴西方面愿以咖啡不愿意用棉花来交换）。这种贸易集团的结成，就更促进了目下通行的锁国经济政策（Au-tarchy）的厉行。

军需原料的保有和竞争，酿成一种原料市场的景气。这种景气的发展倒从我们远东方面开始。这自然要感谢我们的东邻日本了。日本从去年以来，就热病样地搜集各种军需品，又从美国和拉丁美洲各国输入棉花，从澳洲输入羊毛，从加拿大输入小麦和木材，从苏联输入煤油，从英国和美国输入铁屑。

上面说过了各部门工业生产在军事意义底下的膨胀和各国资本家们便“一箭双雕”，一面“救济”了失业，减少了社会的摇曳，一面保证了加强取得剩余劳动的可能。

然而这种办法还只是强制劳动的初步。聪明的列强当局现时正在将大批的失业群众驱入强制劳动的网里，用国家的名义将他们最后的津贴剥夺净尽。这种强制劳动的编制有三种主要的任务，第一，在养成军需品生产的干部；第二，在养成现役军人的预备人员——艰苦耐劳的青年；第三，在准备未来大战时的后方服役人员。德国国社党的纲领明白地规定实施义务的强制劳动，而且希特勒就把它当做与失业“斗争”的主要手段。他们设立了“劳动义务营”收容许多失业工人。于是青年失业工人应有津贴被剥夺了，失业人名录上已经把他们的姓名除去，于是德国的失业人数减少了。德国这种强制的义务劳动完全采用行政的方法来



编制，国社党政府不管日内瓦的反对，预定把 30 万至 40 万的青年工人收容到劳动营里去。这种组织名义上虽然不是军队的组织，然而如遇必要，将他们变成全般的军役义务的组织，却是易如反掌。

强制劳动的实施自然不限于德国美国。罗斯福总统为要完成“森林工事”，已经授权从 18 岁以上 25 岁以下的青年失业工人中选拔 25 万人组织森林保护市民军（Civil Conservation Corps）。这种计划的实行完全委托于美国的正式军队，待遇是规定每人给膳食费 1 元，不过他们每月 30 元的津贴中，必须扣除 25 元，以维持他们的家族！他们一经登记便送入军营，在现役军官的指挥之下，执行强制的工作。美国如是，其他英法保加利亚意大利日本匈牙利波兰诸国亦莫不如此。这种计划的扩张对于军需工业家又是一项预定的福音，因为军事性质的强制劳动越加盛行，军需品保有军需品的热烈竞争。接着我们要说一说公用事业的发展。资本主义各国的所谓公用事业（Public works）的扩展，都能明显地表示它所具有的军事目的和内容。各国政府，特别是法西斯的政府，都在高唱公用事业发展计划，来敷设铁路，开拓汽车道，疏浚运河和建筑边境上的要塞。他们总是慈悲为怀，称这些工程是容纳失业工人的“新泉源”，这样一方面可以收买劳工的好意，一面可以隐蔽军略的目的。因此各国当局对于这一方面的花费也和建造军舰和飞机一样，是不大计较的。德国政府从 1932 年 11 月到 1933 年 12 月一年内为了各种经济政策而支出的款额共为 35 亿至 40 亿马克，中间用于具有军略意义的铁路上的倒占了 16 亿马克。

现在我们要来指明各国政府在目下战前景气下所厉行的劳动政策。在这里我们对于那些普通的伎俩如资本家个别地减低工人工资，延长工作时间，增加工作强度，乃至政府的减少失业津



贴，摧残社会保险等等，都将略而不谈。我们在这里所要说的，是和战争准备有密切关系的强制劳动的采用。谁都知道，在帝国主义时代各种社会的、经济的、文化的因素都有落后的倾向。目下盛行的封建式的强制劳动代替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的趋向，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各国当局时常发表失业人数减少的动人消息。这种消息的骨子里有一种悲惨的真相，那就是整天失业的人数容许减少了，可是半失业的劳动者却在无限制地增多。这种“有饭大家吃”的办法，使得原来“差堪温饱”的人们也要“半饿半冻”起来。现在各国的军需工厂和别种企业内，所谓“不完全工作周”的办法已在普遍采用。一个工人在一周内被迫地只做两天或三天的工，他们的工资固然少得可观，可是他们劳动的强度却可以提到最高强度……请读者注意，这种强制劳动的创设是以失业大众的扩大存在为前提的。那么全世界的军阀和资本家真的在怕失业工人的太多吗？

以上约略说过了的四点，即与军需有关的工业生产的扩张，军需品的统治，公用事业的发展 and 强制劳动的厉行四点，大概已能说明目下所谓战前世界景气的轮廓了。最后我们说到这种“景气”的前途。狂热的战争准备固然使若干生产部门的范围急激扩张，同时造成庞大的市场，然而这种生产仅是不生产的生产，这种市场仅是不生产的消费市场。这种生产和市场的扩张，在现有的恐慌条件底下，只能以最大的力量和最快的速度，使资本主义经济一切基本的矛盾加深起来。第一，这种工业生产的扩充丝毫没有改善劳工的生活，只使资本的集中和积集更快地加强，因此生产与消费间的基本矛盾也只能更加尖锐。第二，军事生产增加的刺激已在创造国家财政整个破产的前提。军费的极度膨胀，在日益缩小的国民收入上，已成不能再忍耐的负担，这样，财政危



机的爆发，自是迫在眉睫。第三，军费膨胀使国家预算破坏，同时令货币制度崩坏，因此更能加深资本主义世界的信用和本位币恐慌。第四，军事准备日趋成熟，使未来战争的爆发成为不可避免的结果。到那时一切生产机构和劳动大众的血肉都会变成灰烬。那么，这战前“景气”的前途是什么呢？我们无用怀疑，这前途是恐慌的加深和战争的爆发。因此，虽然今日全世界的军阀和资本家都在歌颂这充满着火药气的“景气”，而在我们却要另找出路的。

（《世界知识》第一卷，第二号，1934年10月1日）



## 太平洋市场的争霸战

现在轮到我来讲太平洋问题中的市场问题。

大家晓得，目前资本主义世界还陷在恐慌的泥沼里面。恐慌的根本原因，是生产的过剩。那就是说，劳动者替资本家生产了大批的商品，可是这些商品竟找不到大批的主顾，结果，物价暴落，工厂倒闭，而信用和金融恐慌也从此产生。所以我们可说，目前资本家所认为最迫切的问题，是怎样替过剩产品找到主顾的问题；换句话说，便是一个市场问题。

其次各位一定知道，资本主义的初期的发展，主要是靠国内市场的统一和扩张，而一到资本主义发展到较高阶段的时候，它的生命就建筑在国外市场的开拓之上。特别是恐慌期内，资本家眼见国内大众购买力一天天薄弱，国内市场一天天萎缩，所以他们不得不拼命地向外扩充，争取商品的国外市场，来弥补因为国内市场收缩所受的损失。因此，帝国主义列强的市场问题主要地就是一个国外市场的问题。

第三，帝国主义者们在争取国外市场的时候，是各有各的武器的。它们在进攻方面用的是跌价倾销，汇兑降低等等武器。而在防御方面是用关税壁垒，定额输入来限制外货的进口。这是就帝国主义列强来说。至于被那些帝国主义者统治着的殖民地和半殖



民地，情形便完全两样。它因为生产技术幼稚，经济组织落后，特别因为整个经济生产都在帝国主义者掌握之中，因此不能“邀天之佑”，来实行什么倾销；同时，更重要的，它们因为身受“主人们”的钳制，实在连防卫的手段都是讲不到的，因此，它们是无法竖起它们的关税壁垒。结果，帝国主义列强的商品，虽然在它们相互之间已经“碰壁”，可是它们却能回转头来，向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漏洞”，尽量地输出。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是廉价原料的供给场所，资本家要减少他们的成本，增加他们的利润，不得不设法独占这些方便的原料市场。

帝国主义者为了要推销他们过剩的商品，为了要争取廉价的原料，自然不得不以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为他们最主要的争夺对象。这样，现在帝国主义列强视为生死问题的国外市场问题，归根结底，只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市场的争夺问题罢了。

不幸得很，整个太平洋固然是帝国主义列强对于太平洋上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再分割的问题，而太平洋的市场问题也就是它们对于太平洋上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市场的争夺问题。

现在是太平洋时代了。

不错，世界政治重心之从大西洋移转到太平洋，确乎是20世纪最重要的事实。这从世界贸易的变动中，也可以看得很清楚的。这种贸易的变动从1915年巴拿马运河开通以后特别来得显著。从此以后，从纽约到美国西部的海路，缩短了1万里，航行太平洋的船舶很快地增加起来，到1924年，经过巴拿马运河的货物，就有凌驾苏伊士运河之势。根据国联的统计，从1913年到1925年，大西洋的贸易很快地减少，而太平洋方面的贸易却在坚实地增加（下表以1913年贸易额为100）。



## 甲 大西洋贸易 (1925)

	输出	输入
美国—欧洲	92.6	81.1
加拿大—英国	94.6	94.9
澳洲—欧洲	97.5	83.3
日本—欧洲	83.3	86.7
中国—欧洲	95.1	92.2

## 乙 太平洋贸易 (1925)

	输出	输入
美国—亚洲	103.7	114.3
美国—澳洲	102.0	101.0
加拿大—亚洲	104.8	101.4
澳洲—亚洲	102.9	104.7

假使就各洲贸易的本身来看，那么欧洲的贸易额所占世界贸易总额从 1913 年的 61.1% 减到 1925 年 54.5%。太平洋的情形恰恰相反，在同时期内，北美洲的贸易从 12.4% 增加到 16.0%；亚洲从 11.9% 增加到 14.4%；澳洲也从 2.5% 增加到 3.1%；南美洲增加得最少，从 7.6% 增加到 7.7%。

太平洋贸易所占比重的增加，就意味着帝国主义列强对于太平洋市场的“眷顾”，在一天关切一天，同时也就是太平洋的市场问题在一天严重一天。

帝国主义列强在太平洋争霸战上势力的配置是非常复杂的。可是倘使我们将次要的因素和动力暂置不论，那么我们可以说太平洋上的冲突主要的是英美日 3 个帝国主义列强的角逐。因此我们在分析太平洋问题的时候，也就以英美、日美和英日间的争夺





来做我们观察的中心。

第一，我们来看英美两帝国主义在太平洋市场上的“争霸”吧。

帝国主义列强基本矛盾之从战前的英德对立，转变为英美对立，是现代资本主义发展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事情。我们无论从商品的销售方面看，或是从资本的输输出方面看，资本主义世界主要的斗争总发生于英美之间。

英美两帝国主义斗争的范围是普遍于全世界的，可是，不幸得很，它们主要的角斗舞台却是太平洋上的南美、中国和英国原有的殖民地和自治领地。

英国在世界贸易中所占的统治地位，早在 1925 年已给美国抢过去了。在那年英国对外贸易在全世界贸易总额中所占的成分为 14.8%，而美国却为 15.7%。到 1929 年英国再减为 12.5%，美国却再进而为 18%。美国对于英国这种在贸易上的优势，在南美洲表现得最为明显。在南美太平洋沿岸的四个国家——智利、秘鲁、赤道国和哥伦比亚，美国的商品虽然已经排挤了英国的商品。它们在 1926 年的输入总额中，英美两国所占的比率有如下表：

	智 利	秘 鲁	赤道国	哥伦比亚
美 国	32.6	46.2	32.4	47.6
英 国	17.2	15.6	22.6	16.2

可是上述的情形在这一次世界经济恐慌期内，起了很大变化。英镑的跌价对于美国商品在南美的市场，给予严重的打击。

我们可以看出美国对南美的进出口贸易总额在本届恐慌最初的 3 年以内，曾从 14.65 亿美元，减到 5.75 亿美元，节约减少



60%；同时英国的贸易额数，曾从 8 亿美元减到 5.27 亿美元，即仅减少 36%。英国在 1931 年秋放弃了金本位，1932 年美国对南美的贸易比较 1931 年跌落了 42%，而英国的贸易只减少了 11%。

美国对于英国这种积极的反攻，当然不能坐视的。1933 年它也放弃了金本位，它在南美马上采取最激烈的手段，来对付英帝国主义，以夺回其两三年来所丧失的阵地。自然，美国这种新的进攻，在目前条件之下，一定能够保持其对英的优势，美国对于沿太平洋的智利哥伦比亚和秘鲁等国，因为投资方面占有绝对的优势，于贸易的统制，更加容易实现。英美两帝国主义在这些年头，正在利用货币战争的武器来加紧它们对于市场的争夺。它们夺取南美的斗争，将要成为英美帝国主义冲突的中心场面。

现在我们来这两个帝国主义的“巨头”在英国殖民地内的冲突。加拿大之在“日不落国”藩篱之内，这是大家所知道的。然而美国的资本却把这个藩篱打得粉碎。我们不讲美国在加拿大的投资已经超过了英国，就在贸易方面，英国的地位也还是不及美国。比方早在 1913 年的时候，英国对加的贸易总额为 3.1 亿美元，而美国对加的贸易却有 5.8 亿美元之多。同时，就贸易平衡来说，英国的地位更远逊于美国。倘使我们把英美对加的输出和输入分开来。那么英国在 1913 年对于加拿大是保持着入超的地位，而美国却是大大地出超。当年加拿大的出口总额是 3.56 亿元，其中运到英国去的有 1.7 亿元；运到美国去的只有 1.4 亿元。进口的情形便完全相反，那年进口总额 6.71 亿元之中，有 1.39 亿元是从英国输入，而美国货的进口却有 4.37 亿元之多。

英帝国主义对于这种贸易上的劣势，自然不甘忍受。它在 1931 年即放弃了金本位，到 1932 年再在加拿大召开了渥太华会议，缔结了一个“群固藩篱”的协定，结果所得的收获虽然不能



像预期的那样丰满，可是此后美国对加拿大的贸易确乎急激减少，在这里，我们并不能替英帝国主义太过于乐观。事情恰恰相反，渥太华协定一方面并没有阻止英国对加贸易的减落（1932年英对加输出也从1亿美元，减到8600万美元），另一方面却加强了加拿大（和一般自治领地）对英离心的倾向。这种离心的倾向，是可能成为大英帝国的致命之伤的。同时，加拿大的离心在英帝国主义看来，反面就是对于美国的接近。结果，加拿大的市场也就叫英美间的火并，越来越凶了。

美帝国主义在英国其他自治领的进攻并不见得和缓。比方说吧，美国货品在新西兰的输入上，1912年只占10%，到1929年已增加到19%。在澳洲1929年的输入上，英国的部分减低到43.4%，而美国则增大为24.6%。近年以来，澳洲的进口贸易表现出资本主义史上空前的降落，可是美帝国主义的迈进，还是不减当时。

关于英美两帝国主义在中国市场上的斗争，后边再讲吧。

现在我们且收束起英美斗法的场面，来看日美两帝国主义争夺市场的恶斗吧。

原来美国与日本在太平洋上的冲突是两个近代最积极的，最具攻势的帝国主义，为了太平洋上全部的支配权而起的狂热的斗争。刚才我们已经说过，美日两帝国主义的崛起，都是规定近代太平洋问题的基本的动力；而它们两者之间的矛盾，也正在跟着它们努力的膨胀，和它们所采取政策的日趋攻势，在一天天尖锐起来。这种尖锐的程度，在我们亚洲人看来，几乎已经超过了英美之间的冲突呢！

一般说来，美日两帝国主义间的矛盾，它们在政治方面的对立还过于它们在市场上的争霸。美国在中国和远东其他市场的贸易，与其说与日本处于竞争的地位，毋宁说是对于日本给予相当



的援助。美国对那些市场的输出有一部分是经过日本经纪人的手的，而约有半数竟须经过日本银行的手。此外，日本输出到中国的商品，尤其是纺织产品，多数是由美国的原料或半制品而加工的制品。（注意，这次来华的美国经济考察团，他们经过日本的时候，日本工业家就这样威胁他们；要是美国想独占中国的市场，要是美国要直接向中国输出棉织品，那么美国对日本的输出，一定要大受打击。）同时美国的钢铁和机械，还供应日本本国和日本在华企业的需要。

是的，日美在政治上的对立还过于其在贸易上的冲突。自然，这句话只是相对的说法。日美两国在太平洋市场上的冲突，我们非但不能说没有，而且还在一天一天地激烈。

我们先举两个有趣的例子吧。

一个是美国资本“单刀赴会”，踏破了日本的殖民地朝鲜的门户。当1903年朝鲜还是一个独立国家的时候，美国对朝鲜的输出只有199188美元；10年之后（1913年），却增加到329万美元；到1929年又增加到500万美元，如和1903年相比，竟增加了25倍。无怪日本也要说“日本把主权伸到朝鲜半岛，却没有把外国贸易的门关起来”了（松岗正男）。

现在讲另外一个例子。菲律宾是美国的殖民地，这是大家知道的。可是“短小精悍”的日本却正在用大批廉价的商品，冲破菲律宾的藩篱。1929年日本对菲律宾输入总额总共占8.3%（美国占63.9%），到1930年增为10.5%（美国为64.3%），到1931年再增而为11.1%（美国为63.7%），1932年下半年起日元价格大跌，日本棉布，人造丝和生丝对菲的倾销更加积极。

自然，日美市场斗争的局面并不限于上述两地，它们在南美中美，特别在我们中国，也是非常尖锐。据美国商务部的统计，美国对中南美的输出1932年为158930000美元，1934年为



255293054 美元，即差不多增加了 6 倍。无怪美国众议员华尔要建议“将美国出厂税减轻，俾出品易与日货相竞争”（哈瓦斯社本年 3 月 26 日电）了。

本年 4 月日本又派遣经济使节到南美巴西。“美国方面预料此种经济使节势必增加日货的南美洲之销路；且必增购巴棉，减购美棉，故美国棉业者将受巨创。按美国对中南美洲，以互惠条约固其在美洲之经济地盘，故殊不喜日本进出中南美洲。”（华联社 4 月 4 日稿）仅此一端，也就窥见日美两帝国主义争夺中南美市场的激烈了。

现在我们要讲英日两国在太平洋上争夺市场的面目。

我们大概都能清楚地记得罢，英日两帝国主义在过去对于太平洋问题的处理上，特别在征服中国的过程中，好像总是采取同盟的形式。然而，尽管它们在反抗美国和镇压远东革命势力的目标之下，形成它们的共同战线，日英两帝国主义的利益，终是南辕北辙的。

这种利益的冲突在远东市场上表现得最为明显。我们在此必须注意在此斗争之中，日本是取着绝对的攻势；特别是最近期内，老大的英国在贸易方面几乎已有“招架不暇”之势。我们先看英日两国棉织品对世界的供给量，近来起了什么变化。

英日出口棉布在世界棉布出口总量中所占的百分比 (%)

	1927	1929	1931	1933
英	52	47	36	38
日	17	23	29	39

日本棉布已经在世界的规模上驱逐了英国的地盘，我们从上表已经看得很清楚了。实际上，这种竞争在远东市场上也表现得



最为尖锐。

英日棉布在印度的销售量 (单位: 百万码)

	英国货	日本货	消费总量
1929	1248	562	4183
1930	523	321	3689
1931	385	414	3689

1931年日本棉布在印度的销量已经超过英国, 1932年更增加到644百万码。这样莫怪1932年12月孟却斯特的商会要向政府威胁, 说假使政府不命令印度购买兰开夏的货物, 那印度这个殖民地就算破灭了。实际说来, 这样的威胁固然“空洞无效”, 就是1933年日印所订具体的协定, 还不能阻止日货的“社会倾销”。你看, 1934年日本输往印度的棉布还不是有536656千码, 超过协定的比率262千码吗?

英日商品在太平洋各地的战争都是一般无二。举荷兰印度为例吧。日本货品到1931年在荷印进口货中已占到最大的优势。

英日对荷印的输出额 (百万荷盾)

	1930	1931	1932	933
日本	113	101	85	101
英国	88	44	35	31
荷兰	163	99	58	39

英日棉布对英领马来半岛的输出

(每年计其第三第四季, 单位: 百万码)

	1929	1930	1931
英	24.7	8.5	4.3
日	107	15.4	15.0



老实说吧，日本的商品正像英国自由党报所说，已经不单夺去了英国在东亚和印度的市场，而且也攻到英国的本国呢。关于这，我们是无暇论列的。在这里所要重视的，是英日间的矛盾就在市场问题上也已经远超过太平洋的境界了。

以上各节，我们已经把英日美三国对于太平洋市场的争霸，说了一个轮廓。讲到这里，读者不免发生这样的疑问：“大家知道，中国是资本主义世界最重要的市场，而且是帝国主义者分割的主要对象；那么，为什么你在讲英日美争夺太平洋市场的时候，终是左右言他，不说到中国呢？”

好，现在我们就集中我们的注意到中国市场上来吧。

中国问题在目前是太平洋问题的核心，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配布着的势力关系也是非常复杂。在这里我们也只能选出几个在中国市场上占支配地位的角色来谈谈。那些主角也就是英美日三帝国主义。它们在中国对外贸易的总值中，倒占去了一半以上。现在我们先讲英美日3国对中国市场问题所采取的基本策略。

自然，分割和占领是一切帝国主义列强对华的共同政策。不过分别看来，美日两国的策略是更具积极的攻势，而老大的英国比较上常是采取防御的策略。更详细地说：

(一) 美国资本不仅在中国若干重要的贸易部门（棉花，煤油制品，铁道材料，机械军火，电路装置等）与英国资本作猛烈的竞争，而且还要夺取最重要的原料资源（如丝皮革，植物性脂肪等）。美国资本更想凭藉其雄厚的资本，攫得中国政治和经济的支配权，以获得中国市场之全部。同时它再以“门户开放”为武器，与列强排挤美国的倾向相对抗。

(二) 英国在很早的时候，就攫得霸占中国特别是华南和长江流域的优势。不过战后的英帝国主义无论在经济和政治上都是走的“下坡路”，所以它在中国市场上的优势，早经日美占夺过



去。英国目前主要的任务是在向日美作有组织的反攻，以图恢复其原有的地位。

(三) 日本利用其对中国军事上的优势，从世界大战开始，就公然实行其以占夺中国领土为目标的大陆政策。它在 1910 年左右已经在中国对外贸易上占到支配的地位。1932 年上海事变以后日本对华贸易的首位，就给美国夺去，可是东北的市场却被日本独占了去。目前日本正在凭藉其在军事和政治上的优势，积极向中国市场扩张，以图获得中国全部原料的独占和整个市场的支配。

接着我们来概括地看英美日三国对华贸易的地位的变动吧。

这里我们很清楚地看到英国对华贸易的优势地位早经日本在 20 世纪初“篡夺”了，而日本对华贸易的“王冠”，在最近期内却又给美国抢了过去，在此，我们千万不要忘却中国东北贸易全被日本独占去了的事实。

各国对华贸易的地位 (占贸易总额百分数)

	1931	1932	1933	1934
日	35.6	39.1	51.8	53.3
英	3.9	4.3	3.4	4.8
美	2.7	2.5	3.9	3.9
中国本部	30.9	25.0	14.4	11.8

日本在东北市场固然已经取得完全的支配，它在中国本部市场上的势力也绝对不容我们忽视。各个帝国主义列强一面固然在扩充它们制造品的市场，一面还在垄断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原料。日本在独占中国原料方面的成绩，是堪称“独步”的，这就日本在中国出口贸易中所占的地位可以看得出来。





英日美在中国出口贸易中的地位

	1931	1932	1933
日	31.89	13.47	22.16
英	14.80	13.67	18.56
美	9.39	11.99	13.56

上表我们不仅可以看出日本在中国出口贸易所占地位的优越，同时还可以明了它同英美两帝国主义对于中国原料和半制品的关心。原料的独占在目前列强都在狂热准备第二次大战的时候，可以说特别表现得尖锐，同时也有更严重的意义。

此外，我们还要说到列强在争取中国市场的时候，不但用增加输出和独占原料的方法，而且用增加投资的办法。

最近英镑借款的“甚嚣尘上”，中日经济提携的清脆声浪，以及美国白银政策的厉行，经济考察团的来华，都是它们争取中国市场的新形态。不过关于投资问题，非属于本讲范围以内，恕不多赘了。

在目前，资本主义的经济恐慌还丝毫不见缓和，未来的世界大战却已近在眉睫，帝国主义者为了缓和其自身的危机，为着准备未来的战争，不得不在半殖民地的中国“鲸吞”“蚕食”，以争取这个资本主义世界中最重要市场。

在目前，恐慌对于大家的负担正在一天一天加重，未来的大战又给予广大群众以当炮灰的远景。帝国主义者在牺牲大众挽救自己，这是无疑的了，难道中国的大众就能“听天由命”，一任他们来宰割吗？



## 土耳其论

“为要攫得政治与经济的发展，为要树立一种适合于现代精神的管理制度，其基本条件必须具有完全的自由权和独立权，这样才能仿效其他国家实行各种发展的方案。因此，我们反对一切足以障碍我们政治法律和经济发展的决定。”

这是以凯末尔为首领，争取土耳其民族解放的国民党，在1920年1月28日君士坦丁堡会议上所通过的民族誓辞第五条的条文。这历史的文件就是新土耳其立国的基本原则，也就是土耳其有血性的（决不是屈辱的）资产者群，凭藉决不是放弃，更不是摧残大众抗战的力量，完成其反对帝国主义统治的民族解放运动的铁则。

在目前某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侵略远过于以前英帝国主义侵略土耳其的时候，特别是在目前全中国的民族危机远过于以前的近东病夫的时候，特别是在目前全中国的民众像睡醒了的雄狮一样，要结成铁链般的抗敌救亡阵线的时候，我们来抽空对于新土耳其怎样在排斥帝国主义的干涉，铲除封建余孽之后，从事于较合理的建设，加一番研究，那也不能算是无益的吧。

土耳其在1923年革命以前，是跟我老大的中国“远”“近”



辉映的病夫——一个是近东的病夫，一个是远东的病夫。当时土耳其之所以成病夫，也跟中国一样，是因为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封建残余的跋扈，大众的生活，惨苦得像牛马一样。

从1288年到1326年，安那托利亚人在鄂斯·曼苏丹的统治底下，逐渐完成统一的局面，组成了土耳其国，他们在不到一世纪的时期中，不仅征服了小亚细亚，占领了不鲁撒（1326年占领，1329年改为国都），而且侵入巴尔干半岛诸国，占领加利玻利，西雷西亚和阿得利亚那堡。

从1453年马穆德二世夺取君士坦丁堡以后，土耳其又跨进了一个新的发展的时代。商业一天发展一天，一般剥削者很热心地舍弃他们军事的性质，变成了地主。其时，广大的土地都集中到回教主的手里，苏丹的暴力统治就建筑在这些回教主的经济和政治势力之上。在那时候，一般农民的生活困苦达于极点，回教徒的农民比天主教徒过着更苦的生活。

这时土耳其的国势，日益衰微。1571年，土耳其与意大利西班牙战，吃了一次败仗。1683年与波兰战，又吃一次败仗，后来又一败于俄，再败于德，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于是从此以后，一直到世界大战止土耳其就变成列强争夺的肥肉了。其间土国民众虽爆发过数次民族解放运动，但并未有成就。

世界大战起来了，参战国对于土国的输出商品几乎完全停止，这给予土耳其民族工业一个最好的机会，于是民族资产阶级革命的勇气也给鼓起了百倍。1919年，以凯末尔为首领的国民党——土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组织，正式在安那托利亚成立起来，1920年就发表有名的“民族誓辞”，要求保障土耳其领土完整，不许帝国主义干涉内政。于是全国革命运动就在凯末尔的领导之下，疾风般的展开起来。土耳其全国的民众都站在一条铁般坚强的战线上，跟帝国主义者搏斗，跟封建势力和“为虎作伥”的



“土奸”拼命。他们凭着热烈的救国情绪，他们在不投降的凯末尔领导之下，展开他们神圣的民族解放和摧毁专制统治的战争。

结果，1923年世界上就有一个簇新的土耳其共和国呱呱坠地了。这翻开了土耳其人民生活史的新页，同时又翻开了近东历史的新页。而全世界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大众，也接纳了一股温热的朝气；他们的前途是光明的呀！

土耳其资产阶级革命成功以后使土耳其在历史上跃进了一大步。这一大步如果和眼前各资本主义国家正在大开倒车的情形相比，那时确是可以惊人的，在过去13年凯末尔的统治底下，土耳其政府确实展行了民主的两大任务，即反帝国主义和反封建主义。它在安那托里亚曾经号召身受两重压迫的农民，击败以英帝国主义为背景的希腊军队彻底推翻苏丹的帝政，并且废除各种不平等条约。

凯末尔所领导的国民党，就不是丧权辱国的政党，它是充满着要求民族独立和现代主义的朝气的。它代表着土耳其独立的民族资本家的意旨，反对帝国主义的宰割，反对封建残余的跋扈。

土耳其的政权就由这样的—一个“有出息”的政党掌握着，从共和国成立以来，凯末尔从未离开大总统的宝座，而总统就是一个独裁者——因此土耳其的民众在形式上我们—一看就知道是在力求独立存在的民族资产阶级独裁之下生存着。依照土耳其的宪法，土国一切立法和行政权力，都由国民大会掌握，出席国民大会的代表是由人民选举出来的，而实际上都是国民党的党员。总统由国民大会选出，总统有权否决国民大会所议决的法律。国民党的主席依照党纲的规定，当然是凯末尔。土耳其国民党在全国各地都有独立的组织。每个党员都要遵守党主席团的决议。

凯末尔和土耳其的国民党就凭藉着上述的统治机构，继续执行他们反帝反封建的任务。这是的确的，凯末尔从执政到现在，



从没有放弃独立民族资产阶级的精神，做出卖国求荣的勾当过。他从来没有对侵略的外力，作过任何的让步。他们和一般拥护他们的民众和士兵，曾经击败过英帝国主义的御用兵，曾经撕毁希腊统治者恢复古希腊的幻梦，曾经强迫希腊迁出移民。最可称道的，他们虽然资源缺乏，可是当他们真个从事“国民经济建设”的时候，却从来没有向帝国主义借过债款——他们深知弱小民族向帝国主义举债，尽管名义上是“平等合作”，事实上终是“饮鸩止渴”后患无穷的。你看，列强对土投资，不是以新政府承认帝国时代的旧债为条件吗？

土耳其的民族资产阶级并没有像中国那样买办化，他们要求建立完整的民族工业。他们希望民族资本的建树，能够超过别的资本主义国家，至少它的出口能够供应国家内的需要。他们切切实实地想靠国内自身的力量，创造他们光荣的纪录。所以他们从1933年起，也仿效苏联，实行所谓“五年工业化计划”。这个计划的目的：是在提高工业生产率，造成国民经济的自足自给。

这个五年计划的经费总计是4500万土耳其镑，其中2000万镑是购买外国机器原料用的。农业方面，规定5年以内增加棉田3.5万公亩，每年供给原棉6.3万包。计划内关于职业教育，财政整理也有所规定。

土耳其资产阶级的力量毕竟还很薄弱，所以政府对于重要的工业都收归国营。这一点，对于买办资产阶级的经济阵线确有削弱的作用。1922年凯末尔在一篇政纲式的演说里，曾经说过，“只有在国营政策之下，才能开发资源，使它们适应国家的利益。”从1923年到1926年期间国营企业政策雷厉风行，国家企图取得各种重要工业企业，建立新厂，垄断生产，国营水陆交通工具。凯末尔政府敷设了许多新的铁道，收买外资建造的铁道，创造了沿海航业。



不但这样，土耳其政府为巩固国防起见，开始注意到建设重工业的问题。五年计划规定了电气化的步骤，预定，建立总电厂3所，同时提出了如建立五金工业的问题，像钢铁、焦炭，及其他金属的开采都有具体的规划。当然，在土耳其的五年计划中，轻工业仍然占主要的地位，纺织业和制糖业的生产大大增加了，因此到最近，土耳其所大宗输入的纺织品和食糖都有显著的减少。

严格地说，在土耳其目前的社会经济条件之下，要实行真正的计划经济，实在是不可能的。因为资本主义的经济根本上就是无政府性的，是无法计划的。因此，我们不能希望土耳其要有苏联同样的成功。可是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忽视土耳其的民族资本的确能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主义的纲领之下，从事经济建设，结果对于土耳其资本主义的推进，不能不给人以极大的动力，而五年计划的部分成功，也不能不说是土国资本主义经济的一大开展。

农业生产方面也有显著的进步。革命前的土耳其，只有耕地500万公顷，现在已增加到700多万公顷。以前土耳其每年必须输入大宗的小麦和面粉，现在却有粮食输出。同时土耳其的农场，也因为受到农业集体化的影响，已有不少在开始应用机械耕种了。

土耳其人民的文化程度，从革命以来，也已经提高了不少。就教育而言，土国受过小学教育的人数在1923年到1933年10年中间，即从30万增加到56万，受中学大学教育的从1万增加到4.9万。凯末尔政府对于消灭文盲工作的努力，着实够人钦佩。它以极大的力量来提倡拉丁化的新文字，它认为拉丁化新文字是普及教育，提高民智的最有效的利器，到现在，土耳其全国人民，无论男女老幼，几乎没有一个不识字了。



妇女的解放也是土耳其国民党的重要任务之一。土耳其的妇女，特别是劳动妇女，当然还谈不到彻底的解放（因为妇女的彻底解放要和劳动的彻底解放同时完成的），可是她们所受的压迫和凌辱，的确比革命前减少多了。很显然，她们的地位已经大大提高，女教师和官吏，几乎已经到处可见。男女社交公开了，学校里面也可以男女同学，男女间的关系，可说已经焕然一新。

新土耳其在经济建设和社会文化方面，确乎都有很多的建树，这一点又反映到土耳其的国际地位上来。解放后的土耳其在外交关系上的成就是非常可观的。土耳其不消说得已经用他们整个民族的英勇斗争，脱离了半殖民地的地位。同时它并没有学波兰匈牙利等国的榜样，人还没有像样，便摆出凶狠的帝国主义侵略面目来。相反的土耳其现在已经成为近东的一个主要和平势力了。这一点是最值得珍贵的。新土耳其不但已经折断了束缚它自身的不平等条约的铁链，而且现在已是近东弱小民族——如波斯、阿富汗、伊拉克、阿拉伯、埃及诸国的领导者。另一方面，它在目前巴尔干协商国中，占到很高的地位。这里足以称述的，新土耳其与苏联的关系已经发展到屡次被苏要人们称为“模范邦交”的地步。它们俩尽管在社会的政治的制度上有很大的差别，然而它们为着世界的和平，为着人类的解放，便手挽手地，在荆棘满地的艰难道路上，共同努力，共同奋斗。新的土耳其绝对没有侵略的野心，苏联的和平政策更是苏联和全世界大众神圣愿望的表现，因此它们能够相合无间，它们能够在经济上，财政上，乃至文化上，进行真正的合作，进行真正的亲善。

最后，我们应该告诉读者，新土耳其的民族虽然从帝国主义的束缚中挣扎脱逃了，新土耳其的民众虽然见到封建遗毒的消灭了。同时国民经济与文化建设都有相当的成绩了；然而土耳其劳苦大众的根本问题，还不会解决。占全土人口 80% 以上的农民，



他们在民族解放战争中间正同法国大革命时的农民一样，是一切损失的直接负担者，但是革命以后，他们得到些什么呢？土地的大部分，现在仍然留在少数地主和富农手里，凯末尔政府现在就部分地建立在这些地主富农的利益上面。在中央安那托利亚的农民，65%只占有半公顷到1公顷半的土地，农民每年的平均收入，不过120土耳其镑，其中须以1/3缴纳国税。大部分农民是负债的，他们颤慄在高利贷者的魔手前面。世界经济恐慌爆发以后，农产价格的惨跌更使土耳其的农民沦入“水深火热”的境地，逃亡的农民一天天增多，为盗匪的也很不少，社会的安全问题，早已使凯末尔政府感到头痛的了。

土耳其工人的情况也是一样的恶劣。农业国家工人的工资一般地是低的，土国的工人当然逃不出这个“厄运”。工业发展的速度，赶上农村加速的破产，因此市里充斥着从乡村里跑出来的“产业后备军”。这样，工资越来越低，工作时间越来越长——一般工人的工作时间竟至十四五小时。加之在凯末尔统治之下，工人罢工和组织工会的权利是被剥夺了的。土耳其的工人在民族解放战争中，也曾流过不少的血，出过不少的力，可是他们现在的境况，却如此悲惨。

因此我们知道，土耳其的民主革命虽然成功了，可得到革命的成果的，不是农民，也不是工人，而只是一小部分的资本家。凯末尔的经济建设，在土耳其资本主义的发展上是有巨大的贡献的，对于大众生活的改善却不大相干。

总之，从上面的叙述中我们可得出几个重要的结论：

(一) 有人要问：为什么土耳其的有产者群，能够不背叛人民的利益，坚决地执行反帝国主义反封建的民主任务呢？我们简单的答复是：第一，土耳其一开头就是一个极端的军事封建制的国家，不过它并没有像日本一样，发展成为“军事封建的帝国主





义”而成为一个半殖民地国家。国内民族资本老早就处在外资和封建两者压迫之下，所以它不得不求解放。第二，欧洲大战对于土国民族资本给予强烈的刺激。第三，在执行民主任务时，土耳其有产者并不怕有更进步的阶层来反抗他们，因为那时土耳其工人力量还异常微弱；这一点是和别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最不相同的地方。

(二) 土耳其的民族解放运动并没有和国内社会经济改造的任务联系起来；结果，一方面民主任务也不能执行得十分彻底（例如对于半封建地主的让步）；民主革命运动不能开展得充分，同时下层大众只做成革命的负担者，没有享受到革命的果实。在这里特别要注意到土耳其的土地问题和工人待遇的改善问题，当时丝毫都没有解决，因此一般大众的生活还是凄惨万分。在这里，我们可以知道民族解放以后，要是走向资本主义的前途，那么结果会怎样的？

(三) 虽然是这样，可是凯末尔所领导的革命和经济文化建设是有伟大的进步意义的，它们把土耳其的历史推进了一个阶段，它们对于土耳其人民彻底的解放，完成了优秀的准备工作，因此，我们可说，凯末尔的政权是和一切投降帝国主义的亡国政权，是丝毫没有相同之处的。

（《世界知识》第三卷第十一号，1936年2月16日）



---

## 四、对 70 年代以来 世界经济问题 的论述



## 关于美国经济的几个问题

我们这次应邀到美国讲学，历时两个多月，先后在十个大学作了讲演，同一些重要的经济学家和其他社会各界人士进行接触，交换意见，并且与一些经济研究机构建立了联系。下面根据我们在讲学过程中的感受，就美国经济的几个问题，谈一点粗浅的看法。

### 一 一分为二地看待美国经济

我们粉碎“四人帮”，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以来，在社会上，在一部分同志中间，存在着一种看法：似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切都好。这是一种片面的、形而上学的看法。他们往往只看到资本主义国家好的一面，而看不到或不注意资本主义国家坏的而且是更加根本的一面。我们这次在美国所见所闻，深深感到，即使像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我们对它的社会和经济情况，也必须作一分为二的观察。因为只有这样看问题，才能比较符合实际。

美国当然有它的长处，有它优越的一面，这一面几年来大家



谈得很多了。譬如，在自然条件方面，美国地大物博，煤、石油、天然气、铁、铜、铝、铀等资源丰富。它的面积同我国差不多，总共 936 万平方公里；而人口比我国少得多，只有 2.2 亿。我们从接触中深深感到，美国人民确实是伟大的人民，他们的实干精神强，办事效率高。美国生产发展水平很高，它的国民生产总值 1979 年达到 23 688 亿美元，平均每人 10 692 美元。美国经济管理水平也比较高，企业管理有一套比较有效的办法，当然这也是剥削工人阶级的更为巧妙的办法。同时它的科学技术发达，文化教育，特别是大学和职业教育搞得较好。美国居民的生活水平也是比较高的。制造业工人周平均工资为 200 美元左右；拥有私人住宅的居民，约占居民总数的 65% 以上；拥有一辆或两辆以上汽车的家庭，约占家庭总数的 82%；大多数的家庭都有彩色电视机、电冰箱和洗衣机。

与此同时，我们要看到美国的短处，它的弱点，它的阴暗面，而且原来的一些长处，有的正在消失，有的逐渐走向反面，变为短处。

首先，美国的自然资源虽然很丰富，但由于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大量消耗，它的某些重要资源正在日益减少，趋于枯竭。比如石油资源，剩余可采储量只有 40 亿—50 亿吨，因此国内大规模开采已受到限制，产量逐渐缩减，相当一部分用油需要依靠进口。1979 年石油进口每日平均为 881 万桶，全年花费 600 亿美元。石油进口量占到国内消费量的 48%。当然，美国大量进口石油，也有作为战略储备的一面。例如在得克萨斯和其他许多州，都储存着大量的石油，作备战之用。然而，它的一些重要资源，特别是石油资源正在日渐减少，的确是实际情况。目前美国城市人口结构的变化也说明了这个问题。原来许多有钱人不愿意住在城里，每天都驾车回到远郊的别墅去；但是近两年来，这



些人又逐渐搬回城里来住了，原因就是缺少汽油、油价昂贵。

其次，更加重要的是，美国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性和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制之间的矛盾，不仅没有削弱，而是越来越激化了。任何一届总统，不论是民主党的还是共和党的，任何一个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此都一筹莫展。这个基本矛盾的存在是美国经济产生周期性危机的根本原因。二次大战后，美国经济已经受到过多次危机的冲击，特别是进入7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长期处于一种滞胀的状态，经济增长缓慢，通货膨胀和失业问题严重。美国经济的年平均增长率已由60年代的4.1%下降到70年代的2.8%。由于多年来奉行凯恩斯主义，采取一整套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措施，导致通货膨胀日益严重，物价急剧上升。美国消费物价年平均增长率，由60年代的2.3%，上升到70年代的7%；消费物价指数，如以1967年为100，1978年则达到195.4，几乎翻了一番。美国虽然是一个“高物价、高消费”的国家，但是，由于职工工资增长的速度跟不上物价上涨的速度，职工实际收入就往往出现下降的情况。

美国的失业现象更为严重，失业率长期维持在较高的水平上，1974—1978年平均失业率达到7%，1978年和1979年的失业人数有600万人左右，1980年一度达到800万人。工人随时受到失业的威胁。在我们同美国工人接触过程中，他们说：“我们的生活看起来很不错，但是谁能料到明天是不是就会失业！”工人失业以后，只能靠极其有限的失业救济金维持生活。美国黑人等少数民族遭到失业的危险性更大，失业率更高。1977年美国白人失业率为6.2%，而非白人失业率则高达13.1%。1980年黑人青年失业率高达25%。

第三，从美国居民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看，贫富悬殊，差别极大。在美国，一般工商业界的职员，每年大约收入1万—



1.5 万美元；大学教授高一点，一般是 2 万美元以上，有的达 5 万—6 万美元。当然，收入最高的是那些大资本家，也就是那些大公司和大银行的董事、总经理，他们的收入大大超过政府高级官员（每年 6 万—10 万美元）。通用汽车公司的大老板亨利·福特二世的年工资和股息收入共达 97 万美元，另外还有大批其他收入。而生活在政府规定的贫困线以下的人（即四口之家年收入不到 6662 美元者）约 2450 万人。可见，高低收入之间相差几百倍。与工业工人相比，农业工人的收入更低。许多农业工人，特别是季节性的农业工人，生活很苦。这些季节工每年从南方赶往北方，住的是草棚或帐篷，每小时工资只有 2 美元甚至 1.5 美元，每年工资只有 1000—2000 美元，有的甚至不足 1000 美元。黑人的收入一般比白人低得多。1978 年中等家庭年收入，白人为 17640 美元，黑人为 10880 美元，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白人占家庭总数的 6.9%，而非白人则占家庭总数的 27.5%。

第四，从国际条件看，美国受到来自多方面的挑战和威胁。苏联大搞霸权主义，处处同美国较量，在经济力量上与美国的差距已有所缩小；在军事力量上，则已赶上甚至许多方面超过美国。苏联的全球战略是到处包抄、孤立和削弱美国，特别是入侵阿富汗以后，紧逼波斯湾，对美国在海外的利益构成严重的威胁。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来自西欧、日本的挑战也日益严重。西欧和日本的经济实力越来越强，成了美国在世界市场上的主要竞争对手。美国的资本家特别怕日本这个伙伴。目前，日本的汽车，不仅在国际市场上排挤美国的汽车，而且占领了美国的国内市场，使美国汽车工业遭受很大的打击，引起美国汽车工人的罢工，要求限制日本汽车的进口。还有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挑战，特别是石油输出国，它们以石油为武器，同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斗争，要求建立比较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



序，这对美国垄断资本主义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威胁。

因此，我们要一分为二地看待美国经济，既要看到它目前还有某些长处，有它的有利的一面，否则，就会认为资本主义在美国很快就要消灭了，这是不符合实际的；同时，也要看到它的短处，它的不利的一面，而且这些又是根本的方面，否则，就会认为资本主义在美国将永存下去，这也是不符合实际，不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显然，我们应当避免这两种片面的看法，坚持全面的、一分为二的看法，也就是坚持唯物辩证法。

## 二 里根的经济政策和 80 年代的美国经济

美国新总统里根上台，接下了一个经济上的烂摊子，面临着重重困难。

美国曾经受过战后多次危机的打击，特别是 1974—1975 年那次战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使美国经济陷入几乎是停滞不前的困境。从 1979 年 4 月起，美国工业生产指数又开始下跌，此后虽有小的起伏，但始终没有超过 1979 年 3 月份的最高点。进入 80 年代以后，美国经济又发生了新的危机。从 1980 年 2 月份开始，工业生产指数连续下降，到 7 月份，与 1 月份相比，下降了 8.3%，自 8 月份起，虽有所回升，但回升幅度很小。与此同时，西欧各国的经济情况也在急剧恶化，日本经济形势也在逆转。这次由美国开始的经济危机，正在逐步演变成为世界性的经济危机。

我们这次在美国，亲眼看到经济衰退的情况。大量的中、小企业倒闭，许多地方工人罢工，学校师生罢教罢课。有的大企业也濒临破产。如克莱斯勒汽车公司，全靠政府补贴支撑过日子。由于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和失业率增加，人民生活趋于恶化。不



少美国人对我们说，物价高涨使他们的生活受到很大的威胁。工资虽然有所提高，但远赶不上物价上涨的速度，生活越来越困难。这就是美国当前的经济情况。

面对这样的局面，里根的经济顾问艾伦·格林斯潘说，除非里根采取坚决的措施，谋求决定性的转变，否则，美国在整个80年代将面临经济停滞的局面。里根的另一高级顾问、里根政府的预算局长斯托克曼甚至惊呼，里根可能面临一次“经济上的敦刻尔克”（意即总溃退）。他劝告里根赶快宣布，现在美国经济已处于紧急状态。这就逼得里根在他上任之初，必须集中力量处理国内的经济问题。

里根在竞选时宣称，他在经济政策上的一个根本主张就是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他自称信奉“供应学派”学说，竭力推崇企业自由竞争，反对政府过多干预。去年曾经来我国访问的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针对已陷入困境的凯恩斯主义理论，极力主张经济活动自由化。他认为目前美国和西方世界形成停滞膨胀的局面，主要是由于政府机构过于庞大，对经济干预过多，妨碍了经济的活力，降低了经济的增长速度，因而需要实行自由市场经济。而里根对弗里德曼的自由化理论是颇为赞赏的。

里根提出的经济政策，归纳起来主要有如下几点：

一是减少税收。里根认为，征收高额税金，挫伤了企业投资和个人消费的积极性，是造成生产停滞的一个重要原因。他主张减少个人所得税以增加消费需求和个人储蓄，减少企业所得税以刺激投资和发展生产。美国个人所得税率采用累进制。高收入阶层的税率高达70%，低收入阶层的税率为14%。企业所得税税率高达35%—65%。因此，里根主张大量减少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实际上是代表了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即那些银行家、





企业主、董事、经理等的利益。

二是减少福利和政府开支。里根认为，政府开支过大，社会福利过多，这是使私人投资受到限制、通货膨胀不断加剧的重要原因。他主张精简联邦政府机构，消灭联邦政府中各种浪费、铺张和舞弊现象，同时压缩福利开支，以此弥补减税后联邦政府收入的减少，并逐步实现财政预算收支的平衡。

三是扩大军费开支和军工生产。面对苏联霸权主义的挑战，作为保守派代表人物的里根，认为必须重振美国国威，从实力地位出发来抗衡苏联的霸权主义。因此他主张增加军费开支，扩大军工生产，以加强国防力量。这也反映着垄断财团，特别是那些同军火生产有关的财团的利益。

里根在经济上的这些政策主张，在一定时期内有可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他采取减税以刺激投资的政策，可能使生产有所发展，就业有所增加。但是，减税会使政府的收入减少，这又会扩大财政赤字，加剧通货膨胀。为了平衡财政收支，就要减少政府开支，而政府支出中最重要的是军费和社会福利两项（占预算总支出的3/4左右）。军费是肯定要增加的，因此主要就得削减社会福利费。但美国依靠社会福利费维持生活的人很多，削减这方面的开支，无疑会引起广大中、下层人民特别是劳动人民的不满，加深社会阶级矛盾。我们接触到的美国教育界人士，不少人生活本来就比较清苦，现在更加担心了。但里根如果不这样做，就不能控制财政赤字，通货膨胀又难于解决。可见，里根的经济政策是自相矛盾的，这不过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美国经济困难重重、积疾已深的一种反映。可以肯定，任何一个美国总统，包括里根在内，都是无法开出全面医治美国经济顽症的有效药方的。当然，里根在竞选时提出的这些政策，在他上台执政以后，并不一定都会照办的。从历届美国总统竞选的情况看，他们说的是一



回事，以后做起来往往又是另一回事。因此，对里根执政后的80年代的美国经济，今天还难于作出准确的预测。同时，决定经济发展的因素是很复杂的，既有国内的，也有国际的，既有经济的，也有军事和政治的。总的看来，在不发生新的世界战争和没有科学技术方面重大突破的条件下，美国的经济在80年代即使能有一定程度的好转，但要获得很大的起色，从根本上摆脱滞胀、衰退的局面，我认为是不可能的。

### 三 里根上台和美国垄断财团的变化

这次我们在美国讲学期间，正碰上美国总统选举。在竞选中，共和党和民主党双方花了几十亿美元，最后里根战胜卡特，当上美国第40任总统。

里根是美国西部人，他当过家乡加利福尼亚州的州长。这次里根上台，主要的是依靠美国大财团特别是西部财团的支持。里根在竞选中，提出减少税收和增加军费的主张，都是从维护垄断财团以及与军火生产有关的垄断资本的利益出发的。他在同卡特进行竞选电视辩论的时候，抓住两个要害问题攻击卡特，他要选民想一想：一是你们的生活是不是比4年前改善了？二是美国的国际地位是不是下降了？经过这场辩论，赞成里根的人数很快压倒了赞成卡特的人数。美国普通人的想法是：局面是糟，换一个人试试罢，不管他是谁。美国普通人对竞选是淡漠的，真正热衷的主要是垄断资本家及其代理人。

美国西部财团，主要是一些控制新兴工业的财团，它们经营电子工业、化学工业、宇航工业和导弹、飞机、尖端武器等工业部门。而东部财团则是一些老财团，经营钢铁、石油、建筑等工业部门。这两部分新、老财团之间，既相互竞争和争斗，又互相



渗透和联合。里根不仅代表了西部、南部财团的利益，后来也逐渐取得了东部财团的赞助。东部财团经营的像石油这些工业部门，在海外有着重大的利益，它们希望有一个比卡特更强有力的总统来加强美国的力量，保护它们的国内和海外利益。正是由于取得这些大财团的支持，里根才能登上总统的宝座。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财团发生了一些重大的变化：

第一，财团成员的变化。过去美国财团带有很重的家族性，财团成员往往是一些家族成员，如洛克菲勒、梅隆、摩根和杜邦等财团，其成员分别由洛克菲勒家族、梅隆家族、摩根家族和杜邦家族组成。战后这种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大批新的资本家加入这些财团，使财团的浓厚的家族性逐步改变，具有了相当的社会性。财团成员也逐步知识化，原有的资本家学习和掌握科学技术，成为有专业知识的人才；一批经营管理人员、工程师、律师等加入财团，成为新的资本家。

第二，财团结构的变化。老的财团，过去主要经营钢铁、煤炭、建筑等工业部门。后来随着一系列新兴工业的建立，经营石油化学工业、原子能工业、电子工业、宇航工业等工业部门的新财团逐步兴起，从而构成现在的美国十大财团，它们拥有的资产总额，1978年共达12504亿美元。它们以银行为中心，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密切结合，组成包括冶金、石油、机械、电机、汽车、化工、建筑材料、军工、纺织、食品、交通运输、公用事业、商业等各个经济部门的完整体系。其中，老的财团主要集中在美国东部地区；新的财团主要集中在南部特别是西部地区，如西部的加利福尼亚财团，南部的得克萨斯财团，都是在战后，特别是60年代以后迅速兴起的。西、南部财团的兴起，打破了原来由东部财团操纵美国经济的局面，使东部财团的地位相应下降。西、南部财团在与东部财团的竞争中，逐渐壮大自己的实



力，对美国经济和政治发生越来越大的作用。老的财团在竞争中也向一些新兴工业部门或其他有利可图的工业部门投资，以求保存和发展自己的势力。如摩根财团，原来主要经营冶金等工业，后来也向电子工业、医药工业等方面扩展。

第三，财团进一步国际化。二次大战后，美国财团进一步扩大资本输出，发展跨国公司。现在世界上的跨国公司，除由日本、西欧控制一部分外，大多数由美国资本控制。如美国通用汽车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公司，它的总公司设在纽约，它的国内主要生产地是在底特律及其附近城市，它在世界上几十个国家都设有子公司，经营生产、装配和销售业务，它有职工 84 万人，1978 年获取纯利 35 亿美元。1977 年美国私人对外直接投资高达 1 498 亿美元，获利 201 亿美元，这些投资的绝大部分都是通过跨国公司进行的。可见，跨国公司已经成为大财团即垄断资本向外扩张的主要形式。

美国财团的变化，说明了美国垄断资本势力的扩大，及其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和政治的控制力量的加强。大的财团，大的垄断公司，在美国占着统治地位。美国 500 家最大的工业公司，控制着美国制造业销售额的 85%，获得美国制造业利润的 84%。

有人认为，财团发生的一些新的情况，削弱了垄断资本的作用。例如，一种情况是，大公司把股票分散，似乎减少了垄断资本的控制权。其实不然。分散股票，这不过是垄断资本筹集资金、扩大资本、增加利润的一个重要途径，也是它们企图笼络人心、缓和社会矛盾的一种手法。实际上，通过分散股票，垄断资本可以控制越来越大的资本额。就连美国官方也承认，少数大股东只要控制住 5% 以上的股票，就能享有对整个公司的支配权。据美国官方透露，19 个大城市中 49 家大银行，分别在 5 270 个企业中持有 5% 以上的股票。而广大持有少量股票的职工群众，



只能听命于大股东的安排。

另一种情况是，经理人员的权力的扩大，似乎也减少了垄断资本的控制权。这也不是事实。实际上，大财团、大公司的所有者和管理者越来越融为一体了。一方面，经营管理人员往往掌握着大量的股票，成为强有力的股东；另一方面，原有的资本家也学习技术，学习管理，成为业务上的内行，因而往往同时又是管理人员。二次大战后，企业家自己搞技术、搞管理的现象越来越普遍。显然，这里无所谓两者分离的问题，经营管理者控制，也就是企业所有者的控制。正是这两者的融合，使垄断资本的控制权进一步扩大了。

二次大战后，美国垄断资本越来越加强对国家机器的控制，利用国家机器来为垄断资本的利益服务。不管是哪个总统上台，卡特也好，里根也好，国家机器依然是一个集体的资本家。美国联邦政府本身就是美国最大的垄断资本集团，它拥有最雄厚的资本，它是美国垄断资本中最大的所有者、最强有力的经营者和管理者。它利用国家政权的各种手段来干预经济，为垄断资本服务。里根所鼓吹的减少政府干预、实行自由市场经济和自由企业制度的主张，只是表面文章。实际上，里根上台以后，只可能变换一些国家干预的手法，而不会减弱更不会取消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因为美国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不仅加强了垄断资本对资产阶级国家的控制，而且要求国家机器成为直接为垄断资本服务的更有力的工具。这也是美国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趋势。这一趋势是任何一个美国总统所无法逆转的，里根当然也不会是例外。



## 四 以农立国和美国农业的现代化

我们在美国费城同 1980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金获得者、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克莱茵交谈的时候，他很强调的一点，就是美国是一个以农立国的国家。他说，美国就是以农立国，从农业起家的。我们在美国看了一些材料，又同一些人士进行了交谈，感觉到克莱茵的这一说法很有道理。美国的经济确实是以农业为基础发展起来的。

美国农业为美国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大批的粮食、原料和劳动力，提供了广阔的国内市场。独立战争（1776—1783 年）前后，美国农业人口占到总人口的 95%。独立战争的胜利。沉重地打击了美国的奴隶制和封建的土地关系，促使资本主义农业开始在美国得到发展。从独立战争到南北战争（1861—1865 年）近一个世纪的时间，美国农业由原始的、自给性的生产逐步向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过渡。当时，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业国之一。由于美国优越的自然条件和廉价的黑奴劳动力，使农业为美国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廉价的粮食、肉类和原料，农产品成了当时最主要的出口物资，通过农产品的出口，换回大批美国工业所需的机器设备等生产资料，有力地促进了美国工业的发展。1800—1860 年，美国农业生产增长了 5.4 倍，1810—1860 年，美国工业生产增长了近 9 倍。但当时，美国仍然是个农业国，1859 年农业在工农业净产值中的比重仍占到 58%。

南北战争后，废除了美国南部的奴隶制度，允许农民垦荒种地，在耕种五年后土地即归自己所有。这些措施有力地促进了资本主义农业的发展，农场数目显著增加。从 1880 年 400 万个增



加到 1910 年的 636 万个。1860—1900 年，农业生产又增长了近两倍。与此同时，工业生产也迅速发展，到 19 世纪后期，工业净产值开始超过农业净产值。1884 年，工农业净产值中，工业所占的比重上升到 60%，到 1889 年更上升到 65%。工业生产的发展，反过来又为农业的机械化、现代化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基础。

从南北战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用了 80 年左右的时间，美国农业才逐步由落后的畜力农机具的阶段，过渡到初步实现农业机械化。而美国农业的高度机械化和现代化，则是在二次大战后才全面地实现的。目前，美国农业已经全盘机械化、电气化、化学化和良种化，并在农业中广泛应用现代科学技术如电子仪器、激光等等。

随着农业机械化和现代化的逐步实现，美国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1820 年，美国每个农业劳动力，只能养活 4 个人；以后大约用了 100 年的时间，到 1920 年，才能养活 8 个人，翻了一番；到 1950 年，又翻了一番，能养活 16 个人；1970 年能养活 47 个人，1978 年能养活 65 个人。与此同时，农业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不断减少。1910 年，农业人口 3208 万，占总人口的 34.9%；1950 年农业人口减为 2305 万，占总人口的 15.3%；1960 年又减为 1564 万，占 8.7%；1970 年为 971 万，占 4.8%；1977 年为 780 万，占 3.6%。美国人口仅占世界总人口的 5%，却生产了世界粮食总产量的 20% 左右。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产品出口国，1977 年，美国农产品的出口额约占世界农产品出口额的 18%，其中粮食占世界粮食出口额的一半以上，大豆占 70% 以上，棉花占 27%。美国各类农产品出口量占国内产量的比重是，小麦占 44%，玉米占 40%，大豆占 60%，棉花占 41%。美国手中掌握的农产品，成为美国争霸世界的一项重



要武器。苏联入侵阿富汗，美国采取的制裁措施之一，就是对苏联实行粮食禁运。

在美国农业发展过程中，有以下几点值得我们借鉴：

第一，实行生产专业化。这就是根据各个地区不同的自然条件，为发挥地区优势而形成的农业生产上的地区分工，也叫做农业生产的地区专业化。这种专业化在 19 世纪以前就以南棉北粮的简单分工形式开始出现，直到 20 世纪经过漫长的时间，逐步形成美国农业的地区专业化。例如，著名的玉米带地区，从俄亥俄州一直延伸到明尼苏达州，这里气候温暖、土壤肥沃、雨水充足，适宜玉米的生长，其中五个州的玉米产量约占全国玉米总产量的 2/3。玉米带地区同时又是以玉米为主要饲料的养猪和肉牛业的集中地。这个地区的生猪占到全国的一半。棉花集中产区，已经由东南部移到西南部，如得克萨斯草原、加利福尼亚和阿利桑那的河谷地区，这一带夏季炎热干燥、日照充足、雨水较少，有利于棉花的生长，其棉花产量目前已占到全国的一半以上。其他种植业如小麦集中在北部平原，烟草集中在北卡罗来纳、肯塔基，水稻集中在路易斯安那、阿肯色、加利福尼亚，甜菜集中在西部灌区，马铃薯集中在缅因州和阿普斯托克一带。畜牧业产地除玉米带外，美国的东北部和大湖区，气候适宜牧草生长，而且大城市比较多，成了奶牛业的集中地带。

在地区专业化的基础上，农场也实行专业化生产。许多农场专门经营一种或两种主要农产品。有的农场专门种植玉米或棉花，有的农场则专门养鸡或养奶牛、肉牛等等。农业生产的专业化，是使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一条重要途径。

第二，发展农工商联合企业。所谓农工商联合企业，就是农业生产同与它有关的农业生产资料的供应、农产品的加工、贮藏和销售等行业结合起来，形成了供、产、销经营上的一体化。这





是农业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一种新的经营体制。现在美国所谓现代农业的概念，就是在农业现代化基础上实行的农工商一体化。目前美国正大力发展这种一体化。农工商联合经营的形式很多，最盛行的一种形式，是由农产品加工企业买地或租地直接兴办农场，例如，由果品罐头公司直接兴办原料产品的农场。另一种形式，是农场同农产品加工企业订立合同，搞供产销协作。例如，园艺场同果品公司、养鸡场同禽蛋公司签订合同等等。农工商联合企业的发展，大大减少了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增加了与农业有关的支农工业、农产品加工工业和销售方面的人员，即农业的前部门和后部门的人员。这种农业部门同与它有关的前、后部门的结合，是适应农业物质技术现代化的一种经营体制，也就是农业组织形式的现代化，同时又是垄断资本加紧控制农业的一种方式。

第三，重视农业科学研究和农业教育。美国政府对农业科研给予大量拨款。如 1970—1977 年，联邦政府的整个农业经费从 62 亿美元减到 29 亿美元，但其中的科研和服务业经费，却由 7.3 亿美元增加到 11.3 亿美元，目前达到每年大约 15 亿美元。除联邦政府外，各州政府对农业研究也给予拨款。同时，美国政府还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农业科研和推广系统。美国农业科研工作系统，由联邦农业部、州立农学院和私人科研机构三部分组成。公、私农业研究机构拥有大批的农业科技人员，其中公营机构的科研人员约 18500 人。各州的农学院普遍建立了农业试验站和推广中心，各县也设有推广站，配备技术推广员。全国农业技术推广员约 11500 人。据估计，1929—1972 年期间，美国农业产量增长额的 81%，生产效率提高额的 71%，都来源于农业科研成果。

美国很重视农业教育和农业科技人员的培养工作。1976 年，



美国农、林、牧专业的大学毕业生近两万人，获得农业专科学位的约 25 万人，受过中等农业职业教育的达 106 万人。此外，还通过办训练班、巡回教学、函授、电视、广播等多种方式，普及农业技术教育。

当然，在美国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同它的整个国民经济现代化一样，存在着深刻的危机。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农业能源消耗很大，农产品成本很高，许多中、小农场在激烈的竞争中已经破产或濒于破产，失业现象严重。这些都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美国农业无法避免的痼疾。

## 五 美国的社会问题和少数民族问题

美国是一个经济高度发达的现代化的国家，同时也是一个腐朽和没落的资本主义国家。在那里，各种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日趋深化。

美国的社会道德问题越来越严重。美国人民的物质生活，确实比较富裕，但他们的精神生活却非常空虚。他们往往是混着过日子，谈不到什么远大光明的理想。许多人，特别是有钱人，生活腐朽糜烂。卖淫、吸毒现象极为普遍。大学生中吸毒现象也很严重。离婚率很高，许多有夫之妇跟他人私奔。不少私生子成了社会的沉重负担。一般老年人无人照顾，处境凄凉。在美国生活，还有一种严重的不安全感。哥伦比亚大学的前面，有一个很好的公园，但我们的留学生不敢到那里去玩，因为那里吸毒、卖淫、强奸、抢劫、凶杀等犯罪行为很多。纽约的地下铁道，一到晚上人们便不敢去，那里情况很乱、很不安全。全国各种严重犯罪案件与日俱增。这些社会问题，正是资本主义制度腐朽没落的



一种表现。

美国的少数民族问题严重。美国全国人口 22000 万，白人约 18000 多万，占 86.6%；其他民族约 4000 多万，占 13.4%。在少数民族中，黑人最多，约 2500 万，占全国人口的 11.6%；墨西哥人约 660 万，阿拉伯人约 300 万，波多黎各人约 180 万，印第安人约 76 万，古巴人约 70 万，日本人约 59 万，华人约 43 万，此外，还有菲律宾人、朝鲜人等。少数民族的人口增长率比白人快得多。美国少数民族问题，主要是黑人问题。从 50 年代中期起，美国黑人连续发动了大规模的反对种族歧视、争取平等权利的斗争。60 年代中期，美国许多城市爆发了轰轰烈烈的黑人武装抗暴斗争。1968 年，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被害，使矛盾进一步激化，美国 170 多个城市爆发了黑人抗暴斗争，从而掀起了全国的黑人斗争高潮。

面对少数民族特别是黑人的斗争，美国统治阶级除了残酷镇压以外，采用了分化、怀柔政策，用某些措施来平息和缓和黑人的不满情绪。一方面，在政治上起用黑人担任联邦和地方政府的一些重要职务，如当州长，副州长（华盛顿州，新泽西州等），市长、副市长（华盛顿市、底特律市、伯克莱市），当众、参两院的议员，出任美国驻联合国代表等等。另一方面，在经济上收买和腐蚀少数民族，特别是他们中间有影响的人物。再如设立养老金和保险制度，提高他们的工资待遇，增加一些就业的机会，减少一些歧视现象等。我们在美国的时候，在电视里看到的许多演员是黑人，在机关里看到的许多秘书、打字员是黑人，在医院里看到的许多护士是黑人。但是，大部分少数民族人民的生活还是贫困的，他们仍然受到不同程度的歧视，处于社会的最底层。看来，少数民族问题对美国垄断资产阶级说来，确实是个很大的隐患。这既是民族矛盾，又是阶级矛盾。少数民族将成为美国革



命的一支极为重要的方面军。

美国垄断资产阶级不但对少数民族采取软化政策，对工人也采取收买政策，以削弱工人阶级的斗争精神。美国统治阶级在政治上搞资产阶级民主，并且让一些工会领袖进入资产阶级上层社会，为资产阶级效劳，少数工会头头本身已经成了资本家；在经济上，搞一些所谓“人民资本主义”的措施，让工人持有一定的股票，吸收工人参加企业的管理活动，设立一些社会福利制度，等等。这些措施，对缓和阶级矛盾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美国工人阶级是具有光荣革命斗争传统的阶级，美国工人的罢工斗争仍然持续不断，许多罢工斗争甚至冲破了少数工会上层分子的控制。可以预料，随着美国经济危机的加剧，随着美国社会基本矛盾和阶级矛盾的深化，美国工人阶级的斗争将会进一步加强和发展。经过长期艰巨的斗争，他们必将在马克思主义和本国实际密切结合起来的原则指导下，同国内少数民族和其他劳动人民一道，取得最后的胜利。

（《世界经济》1981年第3期）



## 当前国际经济关系中的 几个问题

### 一 当前世界经济具有怎样的基本格局？ 它的发展前景如何？

我认为，当前世界经济的基本格局大致可以分为四大片：（1）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2）社会主义国家；（3）苏联和东欧国家；（4）发展中国家。把世界经济分成四大片，是否根据毛泽东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不是。三个世界的划分是从政治上提出的当前世界人民斗争的战略规定。把世界经济分为四大片则主要是根据不同的社会经济制度来划分的。

当前世界经济四大片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相互斗争的关系。这种斗争的最终结果，将是发展中国家获得很大的成功，社会主义将在世界范围内获得最后胜利。当然，这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

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前景怎样？1981年4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与美国斯坦福研究所在杭州联合召开国际经济讨论



会的时候，我在代表中方的总结发言中曾指出：当前对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说来，供应学派学说、货币学派学说以及已经被认为失灵的凯恩斯学说等等，这些经济理论及其政策措施，都可能在一定时期内和一定程度上收到一些效果，但是它们都不能解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从而也不能对资本主义经济的不治之症有根本的疗效。一年多来，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继续被一次世界性的经济危机所困扰，生产停滞甚至萎缩，通货膨胀在个别国家虽然暂时略有缓和但仍保持很高的通货膨胀率，失业越来越严重，这些事实就是有力的证明。看来，80年代这些国家的经济将维持有所起伏的“滞胀”和危机的局面。当然，我们也不能排除如果出现某种情况，譬如科学技术有新的重大突破、南北对话与合作真能顺利地发展以及备战势头更加显著等等，西方经济也会出现新的显著高涨。但是，这种可能性看来并不很大。

从基本发展趋势上看，资本帝国主义国家的确是衰老了，但是它能够靠吃些补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继续维持一段生命。这些补药就如中国的人参、鹿茸，老年人吃了还可以在一定的条件下益寿延年。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采取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实行一定的经济计划，搞人民资本主义和福利社会等，这些都起到了局部调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作用，从而还能够允许生产力、科学技术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有所发展。但是，这些补剂都不可能根本克服现代高度社会化的生产力与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一基本矛盾，资本帝国主义最终还是要寿终正寝的。

苏联实行霸权主义是一个铁的客观实际。它从50年代中期开始，对外侵略扩张，大搞霸权主义。它的目的是要同另一个超级大国争霸全世界。它打着“巩固社会主义大家庭”、“国际主义”、“第三世界的天然盟友”、“支援革命”、推行“非资本主义道路”、实行“国际分工”等等漂亮的旗子，用军事占领、政治



控制、经济渗透等等手段，力图在全世界造成一个完全新型的殖民体系。由于经济和实力的加强，它在争霸世界的战略中日益采取全球性的攻势。近年来我在美国、西欧讲演的时候，经常强调不要把我们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与苏联混在一起，统统纳入所谓东方国家之林。因为这种说法并不符合实际。

社会主义制度还处于少年时期。它只有 65 年的历史，经验少，还很不成熟，难免常摔跤。苏联大搞霸权主义应该说是社会主义摔跤的最严重的例子。我们中国搞“文化大革命”，造成了十年内乱，经济濒于崩溃，也是一个例子。柬埔寨搞社会主义犯极“左”的错误又是一个例子。因为这些，使得社会主义这面伟大光荣的旗帜在全世界人民面前降低了威望。但是，摔了跤可以爬起来。中国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由于党和政府政策的正确，经济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日益巩固，这就是证明。社会主义遭遇这种或那种挫折，这从人类历史的长河看，毕竟是短暂的一瞬。我们从挫折中不断总结经验，从摔跤的地方爬起来，重新振作精神，改正错误，就可以使我们社会主义事业继续胜利前进。

对发展中国家的历史地位怎样看，在我们这次讨论会上表现出分歧，这并不足怪。按照我们的看法，发展中国家是当前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霸权主义和争取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主力军。它乃是世界未来的希望所在，是未来繁荣昌盛的世界经济的坚强堡垒。

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现状，在我们的讨论会上也有不同看法。我个人认为：当前，发展中国家的大多数是那些民族主义国家，它们大力发展着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有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例如中国，也是发展中国家。因为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与上述发展中国家大体相当，它们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这类国



家在发展中国家里目前占少数。发展中国家中的另一个小部分是基本上没有脱离半殖民地或殖民地状态，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占统治地位的国家。从整个说来，发展中国家的三个部分当前处于两头小、中间大的状态。民族主义发展中国家是占绝大多数的中间部分，从它们中间，在一定条件下，有一部分将来可能进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行列；而另外一些国家，可能较早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我们把发展中国家分为三种类型，主要也是根据社会经济制度来区分的。现在流行的关于第三世界的分法很多，有些是根据生产特别是对外贸易情况来区分的，如产油国家、进口替代国家、出口替代国家、新兴工业国家等等；有的是按人口平均的国民收入来区分的，如高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低收入国家等。究竟哪一种区分的方法比较科学，我建议大家进一步加以研究。

## 二 南北对话和国际经济新秩序是 杜撰和荒谬的吗？

在这次讨论会上，有人认为南北对话，特别是提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是凭空杜撰，是荒谬不合理的。我们不同意这种意见。我们认为，提倡南北对话，增进南北经济合作，特别是提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并为此而斗争，这不仅是合理和可行的，而且是当前已经存在的铁的事实，也是一个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现在已经发展到一个重要的阶段。我们应当看到，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依赖性进一步加深的今天，世界范围贫富差距的扩大既不利





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也不利于发达国家经济的稳定与发展。这一点现在已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所以，倡导南北对话，加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关系，当前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势头。

发达国家在燃料和原料供应、制成品的销售市场和廉价劳动力的来源方面，对发展中国家的依赖越来越大。发达国家所需石油的 75% 靠发展中国家供应，发展中国家还提供了除石油以外世界主要农业和矿业原料的 60%，许多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在其总出口中所占的份额在明显上升。西方发达国家利用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力而大发其财，1970—1978 年，西方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共约 422 亿美元，而同期从发展中国家取得的利润却高达 1002 亿美元。目前在西欧和北美有近 1000 万名外籍工人，他们主要来自发展中国家，干着发达国家中许多人所不愿意干的最脏最累的活。

在当今的世界经济中，发达国家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是相互依存、同时又相互矛盾和斗争的关系。当然，发展中国家也依赖于发达国家，但是发达国家更多地依赖于发展中国家。在国土、人口方面都占 2/3 左右的发展中国家，它们拥有丰富的资源、广大的市场和巨大的劳动潜力，发达国家如不依靠这些，它们的经济的恢复和顺畅运行，是很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西欧一些国家，特别是法国，对南北对话采取比较积极的态度，主动促进南北经济合作，理所当然地受到人们的赞赏。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许多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纷纷获得政治独立，它们的民族经济也有了一定的发展。我们看到，世界政治形势虽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以发达国家居于垄断和统治地位为特征的国际经济关系的老格局，并没有被打破。它对发展中国家争取经济独立、加快经济发展的努力，起着严重的阻



碍和破坏作用。这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至今仍然贫穷落后的症结所在，也是发展中国家要求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根本原因。我们认为建立在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基础上的这种国际经济旧秩序，是必须改革的，而一个比较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一定要建立起来。这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是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中国坚决站在支持打破国际经济旧秩序，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这一立场上，并且积极参与这一具有巨大历史意义的斗争。1974年联合国特别大会通过《关于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而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为制定《跨国公司行动守则》、《技术转让行动守则》等等的努力，我们都完全同意，并热烈支持。联合国第二个10年发展战略规定，发达国家应以国民生产总值的0.7%来支持一些发展中国家，我们是完全支持的；而且对在行动上不符合这一规定的国家，我们提出了批评以至谴责。争取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是发展中国家加速发展民族经济的迫切要求，也是发展南北经济关系中的根本问题。所以我国政府对南北首脑会谈采取了积极参与的态度。

一个真正的完全平等和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我认为只有到社会主义在全世界取得胜利的时候才能做到。现在为建立比较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是非常重要的。不管有多么大的公开和隐秘的艰难和破坏，它必将逐步加以克服，取得胜利，这是肯定无疑的。

### 三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有没有规律？发展中美经济关系的阻力在哪里？

建设社会主义经济是有客观规律可循的。我们力求按照这



些规律办事。首先，要按照全力发展生产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这一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办事。同时要遵守社会主义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在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中起作用的价值规律以及在个人消费品的分配方面起作用的按劳分配规律等等。当我们的政策和行动符合这些经济规律时，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就比较快，而当我们没有很好实现这些规律的要求或违反这些规律时，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便会遇到挫折和困难。我们一定要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但是我们在工作中却常常违反这些规律，犯这样那样的错误。因此，我们要不断地总结经验，改正这些错误，防止重犯这些错误，避免遭受损失。

我们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曾经犯过“左”的错误，使我们的经济发展出现三起两落。特别是十年内乱，我们的经济受到巨大的损失。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纠正了这种错误，决定采取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我国主要领导人之一陈云同志曾经很通俗地讲过。“我们一要吃饭，二要建设。”我们要吃饱穿暖，但不能吃光用光，而必须提取一部分资金来搞建设。我们一定要适当地安排消费基金和积累基金的比例关系。

近年来我两次到美国，了解到有些朋友担心这样的问题：中国的计划经济为主、适当运用市场机制，在生产资料公有制之外允许个体经济存在，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基础上实行生产责任制，这些是否会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我告诉他们说：不会。在我国生产资料公有制占绝对的优势，在此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为主，运用市场机制为辅来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使经济搞得更活，更好地实现国家计划以及弥补国家计划经济之不足，因此它是为社会主义经济服务的。个体经济是一个必要的补



充部分，它们的存在和运行对于方便和改善人民生活有很大的作用，这也是为社会主义服务。实行生产责任制并没有改变我们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只是改变经营管理的某些体制和方法，使集体和全民所有制企业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同物质利益密切联系起来，更好地发挥工农劳动人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所以它们都是为了更好地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而决不是走向资本主义。“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这是中国人民经过长期艰苦奋斗确立起来的坚定信念，它是牢不可破的，走回头路是绝不可能的。这两年来我到美国、西德、法国访问的时候，有些朋友对中国的政治局面是否稳定表示担心。我说，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国政治上安定团结的局面很快形成，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更加巩固。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上个月我在美国时，曾告诉美国朋友说，就政局稳定这点来讲，现在我们中国决不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差些。

有的美国朋友担心，我国政府的政策多变。我说，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和政府的政策已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我们的政策是在政治上维护和巩固安定团结，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在经济上实行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把经济搞活。这些政策，只会随着新情况的出现而有所发展，不会改变。我们的政策具有高度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有的朋友问：“什么叫做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它们之间是否矛盾？”我们说，自力更生为主就是主要依靠自己国家的资源、资金、劳动力和聪明才智，来建设我们自己的国家；争取外援为辅，就是说，我们也可以借点外债，与外国进行各种形式的经济合作，如合资经营、补偿贸易等等。外援的范围很广，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也属于外援。这些外援可以增强我们自



力更生的力量。同时以这种日益增强的自力更生力量为基础，又可以不断地在广度和深度上发展我国的对外经济关系。所以，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不是对立的。

近年来，中美经济关系有了很大的发展。中美两国建交以后，两国间的双边贸易成倍地增长。中美之间进一步发展经济合作，是富有潜力的。但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却存在着阻力。最近美国里根政府决定向台湾出售武器，给中美两国关系投下了一道阴影。这就是一个大的障碍。当我最近访美的时候，许多美国朋友向我表示，他们反对里根总统这种侵犯中国主权、违背自己诺言的做法。例如西方石油公司董事长哈默先生曾对我说，他于1982年5月4日曾对里根总统提出反对出售武器给台湾的意见。我真诚地希望在座的美国朋友们能和我们一道，共同努力，克服各种阻力，使中美友好关系得到更顺畅的发展。

(1982年6月4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和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联合召开的“国际经济关系讨论会”上对若干问题的商榷性发言)



# 第三世界与国际经济新秩序

## 一 第三世界的崛起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

划分三个世界的观点是毛泽东同志在 1974 年 2 月 22 日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提出的。对于毛泽东同志在他晚年为我们制定的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邓小平同志给予高度评价。他指出：“这一国际战略原则，对于团结世界人民反对霸权主义，……对于打破苏联霸权主义企图在国际上孤立我们的狂妄计划，改善我们的国际环境，提高我国的国际威望，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sup>①</sup>

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划分三个世界的观点，是我们团结第三世界国家参加推动世界反霸斗争和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斗争的重要指导原则，正如胡耀邦同志在党的十二大报告中所说：“第三世界在战后国际舞台上的崛起是我们时代的头等大事，第三世界改

---

<sup>①</sup>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第 160 页。



变了联合国仅仅是受某些大国操纵的一架表决机器的情况，使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扩张主义经常在这里受到正义的谴责。拉丁美洲国家发起的反对超级大国海洋霸权的斗争，石油输出国和其他原料生产国争取对自己的自然资源享有和行使永久主权的斗争，不结盟国家反对强权政治和集团政治的斗争，所有发展中国家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而进行的斗争，这一切形成了当代强大的正义潮流，大大改变了超级大国可以任意摆布世界命运的局面。”

当前的世界经济格局，尽管已经存在着崭新和强大的社会主义体系，尽管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已经取得政治上的独立，但从总体上看，依然是由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支配和控制着的极不公正、极不平等、极不合理的旧秩序，广大的第三世界是受它们控制和剥削的主要对象。这种国际经济旧秩序对第三世界国家争取经济独立，发展民族经济，起着严重的阻碍和破坏作用。这是大多数第三世界至今仍然贫困落后的症结所在，也是第三世界要求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根本原因。改革国际经济旧秩序，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这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是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从 50 年代，特别从 70 年代以来，以 77 国集团为骨干，由不结盟运动作配合，第三世界国家团结奋起，在多条战线上使用石油武器和其他原料武器，利用联合国讲台和其他各种场合，为改革国际经济旧秩序，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而英勇斗争，这个斗争同世界人民奋战的两翼，汇成当今世界上任何力量阻挡不住的时代洪流，在这英勇奋战的两翼中，第三世界，包括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内，理所当然地成为它的伟大主力军。赖有它的奋斗，第六届特别联大于 1974 年 5 月 1 日通过了《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宣言》和《行动纲领》。1975 年 2 月，发展中国家原料会



议又通过了《达喀尔宣言》，正确地规定了关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一系列基本原则和方针。从此第三世界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有了明确的方向。

## 二 现阶段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是战后民族解放运动的继续和发展

战前绝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是帝国主义统治下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和附属国。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特别是中国革命的胜利，推动了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属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经过长期艰苦斗争，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纷纷赢得了政治独立，国际垄断资本的旧殖民体系从此土崩瓦解。但是，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它们利用自己经济上的优势和垄断地位，推行新殖民主义政策，顽固地坚持对广大第三世界在经济上的控制和剥削，为此死死抱住现存的不公平、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不放。这个国际经济旧秩序，就是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对第三世界推行新殖民主义的体系。

当前第三世界国家面临的共同任务就是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积极发展民族经济，以经济独立来巩固已经取得的政治独立。历史经验昭示，一个第三世界国家单单取得政治独立，而没有取得经济独立，那么，这个政治独立是没有基础的，因而是不可靠的，因为帝国主义随时都可以弹指一挥，轻易把它抹掉，此其一；其二，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在经济上照旧依附于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便不会建立起自己独立的强大的民族经济，那么人民群众也只能依旧饱受国际垄断资本的剥削，而这是已经在政治上翻了身的第三世界广大人民决不能容忍的，他们一定会奋起斗争，摆脱这种经济上被剥削被奴役的状况。





已经获得政治独立的第三世界人民要进一步为获取经济独立而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第三世界国家为争取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按其任务来讲，是战后伟大民族解放运动的继续和发展。

按照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规律，只有全世界都进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时代，整个世界才能最终完全地彻底地消灭一切压迫、控制和剥削，从世界经济关系中根除一切不公平、不平等、不合理现象。就是说，只有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社会主义革命在世界范围得到胜利，世界上才会有完全平等、公平和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这是人类比较遥远的，但又是最终一定实现的理想。全世界劳动人民，包括广大第三世界人民在内，必然会为这个最伟大的理想的实现进行持久而艰辛的斗争。

30年来，第三世界人民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而进行的斗争是从当代实际出发朝上述远大目标跨出的第一步，或第一阶段。目前世界经济政治实际的主要特别是：（1）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的统治体系还相当严重地存在；（2）社会主义社会经济体系还不够强大，还缺乏足够的示范作用和吸引力；（3）第三世界国家的当前任务是发展民族经济，巩固民族独立，这一斗争的主要领导力量是带有不同程度买办性的民族资产阶级，他们力求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第三世界的新兴无产阶级还比较弱小，有些还没有作为独立的阶级力量走上政治舞台，有些国家甚至还不存在现代无产阶级。从这样的实际情况出发，现阶段第三世界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而进行的斗争，其对象是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是破除它们的新殖民主义体系，因此这个斗争的性质还属于民族民主斗争的性质。事实也只能是这样，这也就是为什么当前第三世界国家所要求的国际经济新秩序还限于在各国主权平等的基础上，建立比较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



关系，让各国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与发达国家一起，平起平坐，参与决定有关国际经济问题，加速各国民族经济的发展。具体说来，即在行使各国经济自主权方面，第三世界国家要求自由选择自己的社会经济制度，反对霸权主义以任何名义（如所谓“自由世界”、“保障人权”、“非资本主义道路”等等）把某种社会制度强加于人；对本国资源享有永久的所有权和使用权；有权根据本国的情况，制定发展民族经济的战略，实现社会经济改革；有权对跨国公司实行监督和管理；有权参加世界经济的有关活动，公平分享由此产生的利益。在贸易方面，第三世界国家要求改革国际贸易制度，确保原料和初级产品的合理价格，改善其贸易条件和地位，取消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对第三世界国家实行“普惠制”，扩大其工业制成品向发达国家出口。在金融方面，第三世界国家要求改变它们在国际金融组织中的无权地位，争取在这些组织中有更多的参与决策权，改善和加速资金转让，“免、减、缓偿”第三世界国家的沉重债务。在调整和改革世界经济结构方面，第三世界国家要求发达国家将劳动密集型工业逐渐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要求修改工业产权制度，促进有利于第三世界的技术转让。这些内容概括起来，就是要求减轻而不是消灭国际垄断资本的剥削和掠夺；提高第三世界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有利于它们民族经济的发展。这些纲领性要求显然带有改良色彩，它反映了第三世界国家民族资产阶级的局限性和软弱性。它同世界范围内的彻底的反帝反殖的民族民主革命还有一定距离。至于对国际经济关系进行社会主义的改造，那还是以后阶段斗争的远期目标。只有将来当这个斗争、这个运动脱离民族资产阶级的领导，而由第三世界各国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才能在斗争的更高阶段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任务。



正因为现阶段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属于民族民主斗争的性质，第三世界各国在国内必须严格控制和管理外国资本的活动，必须完成反封建的土地改革，必须保证和提高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必须加强国内各民族的团结，必须逐步改善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只有这样，它们才能获得足以支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强大动力，来进行反帝、反殖、反霸的斗争，推翻国际经济旧秩序，创建国际经济新秩序。

为了完成现阶段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任务，第三世界国家还要建立和加强相互间的集体自力更生，即“南南合作”。胡耀邦同志在党的十二大报告中指出：“第三世界各国之间的相互援助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第三世界各国有广大的土地，众多的人口，丰富的资源，广阔的市场。我们中间有的国家积累了相当数量的资金，许多国家拥有各具特色的技术，在发展民族经济方面也大都有各自的经验可供别国借鉴。我们之间的经济合作，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南南合作’，就一部分技术和设备的适用对路而言，其成效往往不亚于同发达国家的合作，这种合作有助于冲破现存不平等的国际经济关系和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具有伟大的战略意义。”

近年来，阿拉伯石油输出国对阿拉伯穷国的援助，亚洲国家和地区同中东、非洲国家的工程劳务合作，特别是东南亚国家联盟、加勒比、安第斯、西非等大量地区性经济合作组织（1980年4月非洲统一组织决定在2000年建立“非洲经济共同体”）对增进第三世界国家经济互助合作，促进各自民族经济的发展，起了巨大的积极作用。尤其重要的是，第三世界实行集体自力更生和南南合作，是推动南北对话，促成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极其重要的伟大战略步骤。1982年2月在新德里召开南南合作会议，1983年4月在北京召开的南南合作发展讨论会，使第三世界国



家间的经济合作走上新的发展阶段。

### 三 关于国际经济新秩序若干理论 观点的剖析

我国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属于第三世界。我国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具有相同或相似的苦难经历，面临共同的问题和任务。我们虽然已经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辉煌胜利，但是还有一部分民族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有待完成（如台湾回归祖国，收回香港、澳门主权以及在国内肃清封建思想残余）。我们把坚决同第三世界其他国家一起为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而斗争，看作自己神圣的国际主义义务。

现在有人（例如日本评论家北泽正雄先生）认为我们承认第三世界的存在，支持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表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已经“衰退”了，已经“倒退”到第二国际水平了。这不是什么批评，而是彻头彻尾的歪曲和诬蔑。毛泽东同志在 70 年代中期，根据对世界形势的客观分析，提出划分三个世界的理论和战略原则，指出：“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这是毛泽东同志依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当前国际形势的科学论断，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中国人民和第三世界人民在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和战略原则的鼓舞下，在反帝反霸反殖斗争中，在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中，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这难道不是事实吗？这不是马克思主义新发展的胜利吗？马克思主义的“衰退”和“倒退”云云纯属无稽之谈。



上述反对意见来自“左”的方面。从右的方面进行攻击的主要是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及其御用学者。他们轻蔑地嘲笑第三世界国家倡导的国际经济新秩序是“杜撰的”、“荒谬的”、“不合理的”。在1981年10月举行的坎昆南北首脑会议上，某些西方代表曾经发过这种议论。1982年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经济研究部高级研究员劳伦斯·克劳斯曾在北京召开的一次中美学者国际经济讨论会上说：“发展中国家并不需要一个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人们通过各种努力人为地建立一个国际秩序，有可能是危险的”，它“将过分强调产品的分配，而不是强调生产”。对这种直接来自国际垄断资本方面的，对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斗争的恶意歪曲和攻击，我们必须坚决回击。

我们已经指出，战后广大第三世界国家赢得了政治上的独立，但是环绕它们的仍然是以剥削、掠夺和控制为特征的国际经济旧秩序。这基本上是长期以来帝国主义、殖民统治体制的翻版，是新殖民主义的经济政治秩序。它之极不合理、极不公平，连一些发达国家统治阶级中的有识之士也不能加以否认。推翻这样的旧秩序，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是顺乎民心、合乎国际社会的发展法则的，因而也是完全合理的，只有对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伟大正义事业采取抵制和反对，才是逆历史前进方向的思想 and 行为，才真正是十分“荒谬的”，极端“不合理”的。至于把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说成是“杜撰的”，那更同30年来第三世界人民奋斗史实相背离。试问：1974年联合国特别大会所通过的《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宣言》和《行动纲领》以及尔后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共同制定的《跨国公司行动守则》、《技术转让行动守则》等等重大的努力，难道能说是凭少数人主观意愿“杜撰的”吗？这不是证明，这些斗争和业绩正是第三世界人民所迫切需要的吗？至于说到“危险”那倒有几分



真实性，不过，有不安全感的只会是帝国主义及其代言人，对广大第三世界人民来说只会随着为争取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这一斗争取得胜利而增加安全感和舒适感。同样一目了然的是第三世界国家要求改善贸易条件、改革国际金融货币体系、改善贷款条件、转让技术、改革国际经济结构等等，归根到底无非是为了发展第三世界国家的社会生产力，增加生产，发展民族经济。以发展较差的非洲国家为例，70年代它们的制造业平均年增长率为6.5%，大大超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因此，指责第三世界国家要求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仅仅是为了在国际上进行“财富的再分配”，从发达国家“多捞一点钱”，是完全不符合实际的，是对第三世界人民的莫大污辱；相反，对国际垄断资产阶级来说，竭力维护国际经济旧秩序，反对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才是真正为了在国际上进行有利于垄断资本获得最大超额利润的“财富再分配”，而且这还是从发达国家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以来数百年之久的“财富再分配”的继续，从第三世界人民捞一笔血汗钱来供养他们的穷奢极欲的“天堂”生活！可见，劳伦斯的那些话不过是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及其代言人的“夫子自道”而已。

下面，我们要论及国际上一部分进步友人的有关言论。这些朋友在他们的著作中深刻地揭露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对广大不发达国家极其残忍的压迫、控制和剥削，并为后者指点革命出路，探索走向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我们对于他们这一方面的努力和贡献表示支持和钦佩。但是，对于他们关于第三世界和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若干理论和观点，我们却不能苟同。现在，我想对以萨米尔·阿明先生为主要倡导人的“依附论”，提出一点意见来商榷。

“依附论”认为：“资本主义已经发展为一个世界体系，发达国家是这个体系的“中心”（或“宗主中心”），不发达国家属于



体系的“边缘”（或“外围”、“卫星”。）“边缘”国家都是“依附”国家，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没有它们自己的内部推动力，一切决定于“中心”国家，完全为“新殖民主义所控制”。它们“不会出现一种成熟的、自主的资产阶级前景”。当一种社会经济制度被淘汰和被取代时，这个过程首先不是发生在“中心”，而是发生在“边缘”地区。这种观点还号召第三世界国家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同国际经济和世界市场决裂”，理由是“中心”与“边缘”之间的国际贸易是“不平等交换”，只会加强“边缘”的依附性。<sup>①</sup>

现在，我们撮其要者作以下几点分析：

1. 二次大战后，由于民族解放运动的空前高涨，旧殖民体系土崩瓦解，第三世界国家蓬勃兴起，它们作为一大批主权国家登上了国际舞台，“中心”与“边缘”（这里，我们姑且用这个词，这个词用于现在发达国家与第三世界显然已经不恰当了）的关系已经起了局部的质变。现在发达国家同第三世界之间的关系已不是单纯的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而主要是互相依存和互相斗争的关系。尽管发达国家的垄断资本采取新殖民主义的手段，继续剥削、掠夺和控制第三世界国家，但是第三世界国家为了摆脱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已经在本国内逐步取消了帝国主义的经济特权，收回了海关、货币发行权和自然资源的租让权。它们已经不再是任凭帝国主义摆布的“附庸”了。由于第三世界资源丰富、市场广阔，发达国家对它的依赖从根本上说已超过了第三世界对发达国家的依赖。可以这么说，没有发展中国家提供的大量燃料、原料、廉价劳动力和广大市场，大多数发达国家连一天也

---

<sup>①</sup> 萨·阿明：《世界规模的资本积累》（1970年）；《不平等的发明——试论外围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1973年）。



活不下去！更何况现在已有些第三世界国家向发达国家输出资本。例如阿拉伯石油输出国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向美国、西德、英国、日本、瑞士等国的投资逐年增加。到1983年3月底，这三个国家在国外的投资总额达2650亿美元。1982年所得收入超过270亿美元。同时，随着民族资本的成长，外资在发展中国家的比重日益缩小。例如外国资产在印度全国企业资产总额中的比重1950年为55%，1959年降为36.3%，1976年再降到17.9%。在巴西100家最大企业的资产中，外资所占的比重从1968年的37%降为1977年的11.5%。因此，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外国资本在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基本上是不能横行霸道、为所欲为了。在这种情况下，不顾战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上述变化，把已经取得政治独立，并在国际舞台上成为强大的新兴力量的第三世界国家仍然说成是“依附”于帝国主义“中心”的“边缘”部分，不能不说是符合实际了。

2. “依附论”认为，“边缘”经济的发展没有“自己的内部推动力”，它们只能受“中心”的支配，永远处于“依附”地位。我们认为，这个观点不符合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毛泽东同志指出：“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人民，社会生产力，永远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推动力。发展中国家的人民强烈要求发展自己独立的民族经济，它们的社会生产力不断要求提高自己的发展水平。这才是第三世界真正的根本的“内部推动力”。长期以来它们的民族解放运动和民族经济的发展都是以上述根本的内部动力来推动的。因此，认为发展中国家没有经济发展的“自身内部推动力”，而必须到发达国家那里寻找发展经济的“推动力”是不合逻辑的，错误的。另外，“依附论”者在这里还陷入了自相矛盾：他们一面认定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没有自己的内





部推动力，一面又强调“一种社会经济制度被淘汰和被取代，这个过程首先不是发生在‘中心’，而是发生在‘边缘’地区，”而且认为第三世界发展民族资本是不可能的，只能直奔社会主义，那么我们不禁要问：“边缘”首先发生社会经济制度的变动，甚至一下子就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这个推动力又是来自何处呢？难道帝国主义“中心”会给“边缘”送去一个“淘汰”和“取代”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主义制度吗？应当指出“依附论”在逻辑上陷于自相矛盾的原因，一是脱离当前第三世界的实际，二是离开了科学的基本方法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3. “依附论”者曾经强调，为了避免永久的“依附”，第三世界应该同“国际经济和世界市场决裂”。我们只能说，它是一种永远不能实现，而且是有害的幻想。取得民族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必须从实际出发，正确地处理它们同发达国家既互相依赖又互相斗争的关系，以自力更生为主，独立自主地参加国际分工，适当地利用外资，引进先进适用的技术、力求与发达国家平等互利，互通有无。社会主义国家如中国还把对外开放作为一项坚定不移的根本政策，民族主义发展中国家更加不可能也不应该同外部世界隔绝。相反，它们应该首先在第三世界国家内部实行集体自力更生，开展南南合作，在此基础上通过斗争，由南北对话，逐步实现南北经济合作。事实证明，这是完全可能的。作为佐证，可以指出欧洲共同体在60年代就同非洲国家签订《阿鲁沙协定》；70年代又同非洲、拉美、太平洋地区53个国家签订《洛美协定》；1979年它同东盟五国签订经济贸易协定；同年它与“阿拉伯国家联盟”举行“欧阿对话”，甚至设想建立“欧非共同体”；1980年它同“安第斯条约组织”举行部长会议，商讨经济合作事宜。第三世界国家既然同西欧发达国家可以这样进行经济交往和合作，为什么它们不能同日本、北美这样做呢？事实



上，它们已经在努力向这方面作，而且潜力很大，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只要我们坚持独立自主，保持清醒头脑，善于运用对发达国家又合作又斗争的“两手”，就不会在这种交往中覆舟灭顶。因此，结论只能是我们不能也不应与“国际经济与世界市场决裂”。相反，我们应该积极参加国际经济生活，打进世界市场，这样才能壮大我们自己的民族经济，增强我们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的力量。所谓“决裂”是消极无为的有害口号。如果“决裂”政策真付诸实现，那无异于自缚手足，而让国际垄断资本放手侵蚀，因为它才不让你“决裂”呢！这样就等于宣告旧的国际经济秩序将永存，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伟大斗争归于泯灭！这又是同“依附论”者的主观愿望背道而驰的。

（1983年8月22日在《世界经济》编辑部举办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理论问题讨论会上的发言节录，见钱俊瑞著《世界经济与中国经济》，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 五、改革开放以来的 中国经济



# 当好全国经济调整、改革、 整顿、提高的先驱

## 一 试办经济特区的重大意义

### (一) 设置经济特区是否合乎我国国情

全世界已有 70 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置了各式各样的经济特区。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加强同外国的经济关系，充分发挥自己的一定的优势，用人之长，补己之短，促进本国国民经济的发展。这些特区，在不同社会制度和国情的国家中，一般都在不同程度上收到了效果。

我国的国情是地大物博，十亿人口、八亿农民，底子薄，资金不足，文化技术落后；是社会主义国家，有强大的人民民主专政；当前生产关系与生产力有一定程度的不适应状况，生产关系要自觉地调整、改革，以适应生产力较快发展的需要。而广东、福建两省和特区沿海接近港、澳、台湾省，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劳力和原材料比较便宜、华侨关系特别多。因此，试办经济



特区，是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一项重要内容，是为了更加大胆地利用外资、侨资，改进经营管理，引进先进技术，使工农业生产更快发展，经济搞得更活，群众生活更快改善。两省和特区二年来实行这种政策和措施以后的经济效果总的说来是好的。实践证明，中央关于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试办经济特区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是符合国情的，前途是光明的。这一点首先应当肯定。当然，在实行过程中产生了许多新问题，工作中还难免发生一些缺点和错误，这就有待于我们及时总结经验，逐步加以克服和解决。

## （二）试办特区有没有理论根据

我认为列宁关于新经济政策、实行国家资本主义，毛主席关于国家资本主义、公私合营的理论和实践，是我们搞特殊政策、试办经济特区的基本指导思想。当然，他们所提出的理论还需要根据实践来加以检验和发展。

## （三）实行特殊政策，试办经济特区，是不是后退？有没有回到资本主义、殖民地的危险

我们的答复是：否！不是后退，没有这种危险。今天我国的基本国情之一就是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劳动生产率还相当低。实行特殊政策，搞一点国家资本主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吸收一点外资、侨资，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科学管理方法，会大大促进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现代化，这是从根本上大踏步前进，决不是什么后退。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占绝对优势的条件下，也决不会后退。

当然，利用外资我们必须付给资本家一点利润，就是说，要向他们缴纳一点贡税。那情况会怎么样呢？列宁很好地替我们回



答了这个问题，他说，“只要能够加速恢复我国的大工业，并切实地改善工农生活状况，缴纳这种贡税对我们是有利的”<sup>①</sup>。何况我们不但要恢复，而且要大大发展我们的大中型工业和服务行业。

在人民民主专政、生产资料公有制、社会主义经济占绝对优势的条件下，我们利用一点外资，决没有回到资本主义、半殖民地地位的危险。列宁说过：“邀请资本家到俄国来不危险吗？这不是意味着发展资本主义吗？——是的，这是意味着发展资本主义，但是这并不危险，因为政权在工农手中，地主和资本家的所有制不会恢复。”<sup>②</sup>我国经过31年建设，情况比当时俄国好得多，因此更没有怕的理由。

#### **（四）在我们的经济特区里是多种经济并存**

有社会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小个体经济。发展到一定时期，可能国家资本主义成分占相当优势。但这并不可怕。由于全国和全省社会主义经济占绝对优势，我们的方针政策是导向有利于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因此，特区经济发展的最后结果必然由社会主义经济所支配。

#### **（五）有人担心我们搞特殊政策，会使广州港澳化**

我们说，不会。我们搞经济特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维护和巩固我国领土主权完整，其结果必然是我们影响港、澳，而决不是现有的港、澳情况扩大到广州市和广东省。当然，我们扩大同港、澳的联系，扩大同外资的关

<sup>①</sup> 《列宁全集》第4卷，第548页。

<sup>②</sup> 《列宁全集》第32卷，第360页。



系，必须高度警惕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必须进行反腐败的斗争。这一点也决不能忽视。

### **(六) 两省搞特殊政策，办经济特区对全国四化建设将会有什么影响**

我们在两省和特区可以较多地利用外资，引进先进的适用的技术和科学管理方法，以这里为基地，有计划有步骤地为全国培养技术和管理人才，并且以这里作为试点，为全国改革经济管理体制和经济结构提供较好的经验，提供学会同外国人做生意、提高经济效益、提高在世界市场上竞争能力的经验。我们这样做，如果收到预期的成效，就会有力地影响台湾省上下的观感，极大地有利于促进台湾回归祖国、统一祖国的神圣事业。同时可以扩大国际影响，促进我国对外经济贸易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 **二 做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 先驱和排头兵**

**(一) 中央决定在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和试办经济特区的重要意义，我们应当着重从理论上和战略上加以阐明**

科学社会主义作为社会制度的实践，还处于少年时期。从十月革命算起，64年在人类历史上只是短短的一瞬间。我们搞社会主义的经验还很不丰富，基本成功的经验有，但不那么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还只是得到初步的实现，远没有得到充分的实现。另一方面，在国际范围内，包括我国在内，严重的反面教训却不少。这些反面教训，在一部分进步人士中，曾经产生了信



仰危机，有一些人甚至错误地认为资本主义优越于社会主义。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我国从粉碎“四人帮”，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已经确定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是全党全国人民的中心任务，并且实行国民经济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和对外开放的方针。如果中国能走出一条胜利建成社会主义的路子，创造出成功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来，那将对全人类作出极大贡献，将对全世界工人阶级革命事业起伟大的推动作用。

社会主义搞了六十多年，主要模式有两个：一是苏联模式，一是南斯拉夫模式。在斯大林领导之下的苏联模式的基本特点是高度集中，单一指令性计划，重、轻、农序列的经济结构，高积累，低消费，缺乏民主。这在苏联处于四面楚歌、资本主义包围时期，在斯大林领导下起了很大的积极作用。但它的缺点也不少。毛泽东同志在1956年对此曾作过中肯的批评。南斯拉夫实行了工人自治，后来发展为社会主义自治，有较高的民主，更大的分权，中央权力较小，各民族邦权力大，注意计划性较差。这两种模式各有优点和缺点，问题都很多。匈牙利经济改革，取两者之长，去两者之短，有较好的成效。但因国家太小，对外依赖过多，也遇到许多困难。它也可以说是一种模式。这三个国家尽管情况有很大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大量利用外资，大胆请外国专家，吸收国外的先进科学技术。

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初期，基本上是照搬苏联的模式。毛主席在50年代虽然指出这种体制的缺点，但实践上并没有加以纠正。相反，从1957年以后，把当时已经存在的“左”的错误扩大化，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用政治运动压倒经济建设，在经济建设中盲目追求高速度、高指标、高积累，人民生活没有得到应有的改善。这种情况，到10年内乱时期达到了顶点。





30年来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主要教训是什么呢？是“左”，是“左”的错误指导思想。它主要表现在：

1. 不认识或不充分认识人类历史上每个社会形态都不曾是也不可能是纯而又纯的。它们一般地都包含着旧社会的残余和新社会的萌芽。奴隶社会包含有原始社会的痕迹，封建社会包含着奴隶制的痕迹，资本主义社会包含着封建社会甚至奴隶社会的痕迹。至于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马克思早就指出，因为它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社会，“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sup>①</sup> 几十年来的实践证明，在经济方面除了在按劳分配问题表现出来的资产阶级权利之外，还有商品货币关系，还有少量的个体经济，等等。它们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尤其在经济上比较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都能在国家计划的指导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占绝对优势的前提下，为社会主义服务，起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作用。

2. 不认识或不充分认识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仍然存在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常常错误地把商品生产和交换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至少认为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就会导致资本主义复辟。

3. 对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规律没有认识清楚，或认识得不太清楚。这条规律的基本要求就是用现代科学技术装备社会生产力，大力发展生产，其最终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对这条规律认识不清的必然的后果是企业的技术改造和革新不够，特别是人民生活改善很差，从而极大地影响劳动人民的生产积极性。

---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0页。



4. 不了解在中国这样的国家，经济管理体制过分集中，容易造成缺乏民主和官僚主义，而且带有相当浓厚的封建性。在这种体制下，社会主义民主和职工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决然难以发挥。

## **(二) 彻底清理“左”的错误指导思想，是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基本环节**

所谓特殊政策、灵活措施，主要是两条，一是利用两省和特区的地理优势，比其他省、市、自治区在广度和深度上更大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更加洋为中用，更加资（资本主义）为社（社会主义）用。所谓资为社用，就是大胆吸收外资、侨资，引进先进技术，学习资本主义科学管理方法，办好国营的、合营的以至外资独营的企业，大力发展生产。二是给两省和经济特区以较大的自主权，包括人权、财权、地方立法权等，在两省和特区范围内经济政策更放宽一些。同时要给企业以更大的自主权，使国家、企业、个人三者的利益更好地结合起来。这一点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都在试验。两省扩大了自主权，要看看如何才能最好地最大限度地发展社会生产力，为全国提供有益的经验。

在用人上要尊重专家，专职专用，发挥他们的特长。过去错划的“右派”、“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白专道路”分子，以及属于其他冤、假、错案的人，其中有很多知识分子、技术专家，有不少人是很有才干的。现在，有不少省、市、自治区，思想还不够解放，还不敢用这些人。建议你们两省大胆择优使用，千万不要让计算机专家去分房子，让化学专家去当收发员，也不要让他们担任过多的行政职务，妨碍他们发挥专长。

在特区搞经济，搞法上要更灵活，机构一定要精简，要轻装上阵，上面千条线，下面只要几根针就够了。要更多地运用市场



机制，善于利用价值规律，逐步打破行政区划的限制，顺畅各种经济渠道，特别是流通渠道。无论条条还是块块都要服从经济规律。管理经济要用一定的行政方法，但千万不要迷信行政方法，要学会运用价格、税收、信贷等经济杠杆管理经济。要工农贸合一，产销结合；要更大胆地打破铁饭碗和大锅饭制度；要在工商行政的管理下，保护合理的竞争，适当地发展这种竞争。这是降低成本、降低消耗、增加花色品种，提高质量和经济效益的重要途径。

建议要除“五怕”：

1. 不要怕出乱子。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更多地实行对外开放，因为没有经验，不免出点小乱子。当然，我们要力求不要出乱子，更不要出大乱子，特别注意防止走私贩私，投机倒把，贪污受贿，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就应坚决打击。但是决不要因噎废食，怕这怕那，影响执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决心。

2. 不要怕资本主义。列宁说过，“向世界资产阶级缴纳一种贡税；……只要能够加速恢复我国的大工业，并切实地改善工农生活状况，缴纳这种贡税对我们是有利的。”在人民民主专政下，有强大社会主义经济，只要善于资为社用，就没有回到资本主义道路的危险。

3. 不要怕先富。不平衡发展是绝对规律。社会主义社会是从不平衡到相对平衡。资本主义是少数人富起来，大部分人贫穷饥饿；我们则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大家共同富裕。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表现。

4. 不要怕冲击。有人认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会冲击其他省、市、自治区。我看对冲击要做具体分析，有的冲击可能打击其他省、市、自治区经济（例如廉价收购其他省、市、自治区产品，



高价出口等), 这些两省要注意防止, 要有高度全局观点, 决不要以邻为壑。但是, 有的冲击 (如要求更多的花色品种和高质量的产品, 按照合理的合同出口等) 有可能刺激它们改进工作, 促进其他省、市、自治区以更高的效率发展经济。

5. 不要怕犯错误。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和试办特区, 都是新生事物, 很难不犯一点错误。当然要力求不犯大错误。犯了错误, 就及时总结, 改正错误, 工作就进步了。

### (三) 两省要做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先驱和排头兵, 先行一步

要在经济体制改革、企业管理和技术改造、科学办企业、培养人才等方面, 敢于突破。要敢于充分利用中央给予的权力, 当然也不要滥用这种权力。要敢于突破条条块块给予不适应两省情况的框框, 当然如有改变, 应向中央及时请示报告。要放长线钓大鱼, 不惜亏小本赚大钱, 千方百计利用外资、侨资, 除特殊情况外, 不要向中央伸手。昨天项南同志讲了一个权, 一个钱, 权要向中央去争, 钱要向国外去争。要不惜出高额学费, 不惜“牺牲”, 纳点“贡税”, 向西方资产阶级好好学会做生意, 学会经营管理。要敢于创新, 敢于冲破重重阻力, 包括思想上、人事上、物质上的各种阻力和困难。当然, 要同有关方面充分协商, 同心协力把事情办好。

所谓先驱、排头兵、就是带头人, 就是模范。先行一步就是说, 其他各省、市、自治区以后都要结合各地的实际跟着走。所以两省应采取既积极又稳妥的方针, 要作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模范; 要作洋为中用, 资为社用的模范; 要作照顾全局、艰苦奋斗的模范。要十分警惕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 坚决反对和打击走私贩私和贪污受贿。要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大力加强共产主义的思



想教育，防止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尽可能不吃小灶，不吃偏食，不贪不必要的优惠。否则，就不可能在全国普遍推行，失去促进全国改革体制、实现“四化”的排头兵和前驱的作用。

#### **（四）建议中央各部委对两省实行的特殊政策、灵活措施、试办经济特区，积极支持，大力协助**

要“高抬贵手”，尽可能给两省以方便；要“刀下留情”，决不要对两省视同其他省、市、自治区一样，搞一刀切，要看到广东、福建两省这里有个“特”字。各部门自己有什么改革的打算，建议主动提请两省先作试验。把两省作为自己的试验基地，岂不很好？要充分相信他们。党中央信得过两省领导班子，他们一不是克林顿，二不是蒋经国，他们是优秀的党员和领导人。在党中央正确领导下，放开双手让他们干。让他们在经济上真特殊，真灵活，真先行，真正做全国经济调整、改革的“先驱”和“排头兵”。希望两省和特区同志随时总结经验，改进工作。我们相信两省同志对全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一定能够作出重大的贡献。

（1981年5月至6月在国务院召开的广东、福建  
两省和经济特区工作会议上的发言要点）



# 中国经济的调整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不变

## 一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

中国人民经过几十年艰苦卓绝的奋斗，于1949年创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国土辽阔，人口众多，资源丰富，但因为长期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剥削，至今还是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它属于第三世界，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西方有些人士看到中国现在实行经济调整改革，在国家计划指导下，适当运用市场机制，发展一些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补充的个体所有制企业，学习外国企业科学管理方法，就说中国已经成为或者将要成为资本主义国家。这显然是误解。还有些西方人士习惯于把中国同苏联放在一起，列入“东方国家”或“中央集权计划国家”，这也是错误的看法。中国政府多次庄严声明，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它以后富强起来，也永远不做超级大国，永远不称霸。

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我国生产资料已归公有，剥削阶级和剥削关系已经消灭。社会生产力基本上得到了解放。1949—



1978年，我国粮食产量增长1.7倍，棉花产量增长3.9倍。1952—1978年，我国工业产值平均年增长率超过11%。1979年，全国全民所有制企业的固定资产达到3200亿元，相当于旧中国近百年积累起来的工业固定资产的25倍。总的说来，我国经济增长速度还高于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

## 二 曲折、起落的33年

新中国成立近33年来，国民经济经历着几起几落的曲折过程。1949—1957年，国民经济内部比例关系比较适当，发展比较正常，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4.6%，国民收入平均每年增长12.6%，职工实际工资平均每年增长5.5%，同时提前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

1958—1960年三年“大跃进”，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重工业增长2.3倍，轻工业只增长47%，农业下降了23%，加上自然灾害和苏联的破坏，人民生活十分困难。

1961年起实行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到1965年经济恢复到正常水平，1966年有所上升。但1966年发生了“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使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的破坏。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开始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工业生产1977—1980年持续上升。但是，我们对10年浩劫所造成的严重困难和问题认识不足，还是盲目追求高指标，1977年特别是1978年提出1985年钢产量要达到6000万吨，从国外引进了一批成套建设项目，国内大中型建设项目增加到1000多个。国家基本建设支出，从1977年的300亿元增加到1978年的450亿元。国民收入中积累所占的比例达到36.5%。1979年基建投资实际数额增加到500亿元。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又趋严重。



近 33 年来，我国经济所以发生这样大起大落、遭受严重挫折的局面，主要原因在于我们的指导思想犯了脱离实际、违反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严重“左”倾错误。例如，我们曾经不善于利用甚至违反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状况的规律。我国国情的主要特点之一是社会生产力水平比较低。片面追求“一大二公”，盲目提高所有制的形式，不但不能发展生产力，反而妨碍了生产力的发展，甚至破坏了生产力。又如，人民政府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应该集中力量搞经济建设，发展生产力。但是，我们却“以阶级斗争为纲”，“抓革命，促生产”，大搞政治运动，削弱了经济建设。再如，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规律要求，不断发展生产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我们却过分提高国民收入分配中积累基金的比例，压低消费基金的比例；片面强调发展重工业，轻视农业和轻工业，轻视消费品的生产和供应，忽视人民衣、食、住、行问题的解决，忽视科学、教育、文化、卫生等精神文明的建设。一句话，忽视长远的和当前的社会需要。

我们曾经违反社会主义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的规律，使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积累与消费比例失当，不善于在计划指导下，适当利用市场调节，搞活经济。社会主义经济是实行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经济，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仍然发生巨大作用。但我们曾经认为商品生产是资本主义的温床，发挥市场经济和价值规律的作用就是发展资本主义，不重视流通环节的建设，忽视企业经济核算，结果就使国民经济搞得很死，经济效益很低。





### 三 中国经济的调整、改革、整顿和提高

1978年我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决定，把全国工作着重点转移到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经过努力，全国人民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开始形成，工农业生产有较快的增长。

但是，由于我们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没有克服，基本建设规模仍然过大，消费品生产还是上不去，市场供应紧张，通货和信贷膨胀，财政出现巨额赤字。这样，就使我国经济潜伏着危险。

面对这种情况，我国政府和人民下最大决心，着手国民经济的调整。首先，坚决压缩基本建设规模，1981年从原计划的500亿元，压缩到380亿元。停建和缓建一些项目，保证一些最必要的项目和职工住宅的建设。

其次，着重调整产业结构。真正贯彻优先发展农业（包括林业、畜牧业、渔业）和轻纺工业，同时大力加强燃料工业、交通运输业。扭转重工业，首先是机械工业为生产而生产、为自我服务的偏向，转到为农业和消费品生产服务的轨道上来。

经过两年调整，我们取得了显著成绩。我国国民经济已开始走上稳步发展的轨道。1979年农业生产比上年增长8.6%；1980年受到严重自然灾害。还比丰产的1979年增产2.7%。1981年粮食总产量接近1979年的水平，是建国以来第二个高产年。1980年，棉花创造了历史最高纪录，去年又有新的突破。油料连续3年大增产，1981年又增产17%左右。1979年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8.5%，其中重工业增长7.7%，轻工业增长9.5%，



超过了重工业。1980年工业总产值增长8.7%，其中轻工业增长高达18.4%，大大超过重工业的增长率1.4%。1981年轻纺工业总产值比1980年增长12%，又远远超过重工业。

最后，我们正着手调整国民收入中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的比例关系。以往几年，我国积累率都超过30%，这显然过高。现在我们力求把它调整到25%甚至更低一点。25%的积累率已经超过美国和西欧各国。我前年访美时，朋友们很关心这方面的情况。现在我可以告诉大家，在这方面我们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据初步统计，1979—1981年的三年间，国家用于增加城乡人民收入和改善人民生活的资金，已达1400多亿元，占这三年国家财政收入的31%，比例之大是建国以来不曾有过的。在三年中，我们已在城乡陆续安排就业2600万人；新建城市职工和居民住宅2.2亿平方米。职工年平均工资由1978年的614元，增加到1981年的772元，增长25.7%。三年来城乡人民的实际购买力（扣除零售物价上涨因素）增长43%。

我们坚决贯彻“一要吃饭，二要建设”的这一条根本方针。一面要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同时必须拿出一部分资金和物资，投入建设，不断扩大再生产，向四个现代化进军，这是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因此，等到我国调整工作基本完成，1985年以后经济更加健康增长以后，积累率就有可能逐步有所提高。

目前我国经济工作是以调整为中心。但是，调整必须和改革、整顿、提高相配合，相辅相成。改革、整顿和提高必须服从和服务于调整。但是，不进行必要和可能的改革、整顿和提高，调整也不能顺利进行，收不到预期效果。

当前，改革、整顿和提高的重点是改革经济体制，整顿经济和企业的经营管理，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产品质量。其总的目标就



是提高经济效益，满足日益增长和不断变化的社会需要。

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克服过去中央集权过多的弊病，正确发挥地方、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改革的关键是适当扩大企业的自主权（包括一部分财权、人权、分配权）和充分发扬职工和农村社员的政治经济民主。

三年来，我国政府实行的农村经济政策，合乎国情，顺乎民心，效果十分显著。我国农村从1958年以来，实行政社合一，公社、大队和生产队三级管理，以生产队为基础的管理制度，力求所谓“一大二公”。这种管理体制不完全符合当前农村生产力的状况，滋长官僚主义和平均主义，不利于广大社员生产积极性的发挥。三年来，全国大部分农村根据国家政策，结合各地不同情况，在坚持集体所有制和群众志愿的基础上，改变经营管理制度，采取各种形式的联产责任制（如包产到户，联产到劳，专业承包，联产计酬等等），使农村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可喜的变化。许多穷队一季翻身，一年大变。富队变得更富。科学种田效果显著。粮食和经济作物大幅度增产，对国家的贡献越来越大，年收入几千元的农户成批涌现，一排排的新瓦房平地升起，集市上人山人海，购销两旺，许多农民家里有了自行车、手表、缝纫机、收音机，甚至洗衣机、电视机，农民存款大增。整个农村呈现出一派生气蓬勃的大好形势。

近两年来，不少企业实行体制改革的经验证明，工业交通企业实行经济责任制是发挥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克服吃“大锅饭”的弊病，使企业迅速得到改造，提高经济效益的最有效的办法。实行经济责任制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如利润分成、利润包干、自负盈亏、以税代利（润）、计件工资、优质奖金、岗位补贴、满勤奖等等。所有这些形式和定额指标，要因地、因厂，甚至因车间、工种制宜，不要“一刀切”，根据



群众经验和意见，逐步完善。各地实行经济责任制后，收效一般很好。四川重庆市的冶金局过去9年连续亏损，1980年这个局所属企业开始实行经济责任制，规定全年上缴国家360万元利润作为包干任务，超收的企业可以提留一部分作为职工福利基金和奖金。结果这个局当年就扭亏为盈，全年盈利1175万元，其中上缴国家466万元，比包干任务增加29.4%。

改革经济体制的另一项重要任务，是正确落实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和全国一盘棋的方针。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实行真正的计划经济。但是，生产资料公有制还将在长时期内存在着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区别，同时还存在着少量的个体所有制作为必要的补充。因此社会主义经济不能不长期地存在着在国家计划指导下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应该根据价值规律实行严格的经济核算，应该适应社会的市场的需要。它的流通，不论生活资料还是生产资料，除一部分物资按照规定价格由国家调拨（按成本计算）外，大部分都要通过市场交换来实现计划所要求的充分灵活的调节，真正做到产需结合，产销结合。它的分配应按照劳动产品的数量和质量，通过货币和商品形态，实行真正的按劳分配，包括奖金、补贴在内。这就是计划指导下的充分发挥市场机制辅助作用的社会主义经济管理体制。

在这种体制下，我们保护和鼓励计划指导下的适当合理的竞争（区别于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这种竞争对经济有破坏性作用），打破那种“吃大锅饭”、“铁饭碗”式的包办垄断局面。而这种适当合理的竞争将能大大促进社会主义企业厉行经济核算，以尽量少的活劳动消耗和物质消耗，生产出更多符合社会需要的产品，提高经济效益。

在这种体制下，我们逐步打破那种“画地为牢”和行会式的



按行政区域和部门来管辖的制度，按照计划，实行全国一盘棋。同时，在生产日益社会化的基础上，逐步实行跨行业、跨地区的协作和联合。组织这样的协作联合，将更有利于发挥各地区、各行业和各单位的优势，扬长避短，发挥最大的经济效果。

整顿的重点是分批分期地搞好企业的全面整顿。经济管理，要善于运用各种经济杠杆，建立和健全经济立法。企业管理应严格实行经济责任制，厉行经济核算，充分发扬职工经济民主和政治民主，逐步实行企业各级行政领导人员由职工大会民主选举和罢免的制度。特别重要的是整顿和健全各级领导班子，这是整顿企业管理的关键。同时应认真实行定员定额，把多余的职工调出来，轮训学习，提高他们的文化科学技术水平。

当前提高的内容，主要是提高工作效率，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提高产品质量。一句话，要提高经济效益。当前要着重发展劳动密集型企业，妥善解决就业问题。对原有企业着重挖掘潜力，大搞技术改革和革新，加强劳动纪律，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要大力发展科学技术，逐步增设技术密集型企业。这是我们未来发展的方向。每个企业都要力求产销对路，大力提高产品质量，增加花色品种，适应国内市场需要，增强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这里的关键是在增进职工物质利益的同时，大大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提高职工觉悟。

#### 四 坚持对外开放政策

社会主义新中国一贯努力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打破各种封锁和障碍，发展与世界各国的经济往来，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和合作。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大力学习外国的长处，对外实行开放与各国建立和发展平等互利的经济关系，这是已故毛泽



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一贯教导，也是我国政府奉行的坚定不移的方针，决不会改变。十年动乱时期，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使我国处于闭关锁国的不正常状态。粉碎“四人帮”以来，我国的国际交往大大增强。我们在反对霸权主义、保卫世界和平，争取实现我国四化的国际和平环境的对外总方针下，我国对外贸易和对外经济关系大大发展了。目前我国已同世界上174个国家和地区发展了经济贸易往来。这首先表现在中美的经济关系上。1972年中美发表“上海公报”后，中美贸易有了大的突破，两国贸易额已经连年超过美苏贸易额。中美其他方面的经济技术合作和文化交流也迅速发展。中国同日本、西欧、东南亚和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贸易关系都在稳步发展。

为了加速我国实现现代化，我们要积极利用外资和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关于利用外资，我国政府根据我国的实际需要和可能（如偿付能力和国内配套），贯彻积极利用、稳步前进的方针。我们采取合资经营、合作经营、补偿贸易、来料加工等等多种方法，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利用外资来勘探、开发我国的丰富资源，发展我国的国民经济。关于引进技术，我们正结合我国现有的基础和消化能力，以引进中间性的适用技术为主，同时适量地引进尖端技术。我国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将不再着重引进成套设备，而以引进关键性部件和专利、软件为主。我们反对用整套搬进的办法，而主张在学习和仿制中有所改进，有所创新。我们正大力加强科学研究、培养技术人才和经营管理人才的工作。

有些朋友担心我国政局能否长期稳定，政策能否保持连续性。全世界人民都能看到这个事实：从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来，我国已经确定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这种局面，从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越来越巩固了。因此，在国内政局的稳定程度这一点上，我想朋友们会同意我的这个论



断：我国比当今世界上任何一国毫不逊色，而且我们将会越来越稳定。它的基本原因是：三年来共产党中央和国务院制定的各项方针政策是正确的，是符合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和心愿的。这些方针政策，将坚持贯彻执行，并将随着新情况的出现，继续有所发展。

还有朋友担心，我国实行经济调整，压缩基建，减慢经济增长速度，结果，将使中国经济萎缩，对外经济关系不会有大的发展。事实将证明这种担心缺乏根据。我们今后几年的调整，正是为 80 年代后期和 90 年代经济健康的稳步增长创造条件。我国经济越壮大，我国对外经济关系将越加发展，我国对外开放政策将越加向广度和深度前进。

我国当前的经济调整和对外开放政策是互相关联，相辅相成的。前者是基础，后者是条件和产物。我们将坚持我国经济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同时坚持对外开放，加强国际合作。我们将坚决贯彻执行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今后我国经济发展的十条方针，以期在本世纪末基本上实现四化，把我国初步建设成为一个具有高度民主、高度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我想，这不仅是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也是符合世界人民、首先是美国人民的殷切希望的。

(1982 年 4 月在美国费城“美中经济讨论会”上的发言)



# 关于对外开放战略的若干 理论问题

党中央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抓两件大事，一是经济体制改革，一是对外开放。搞好对外开放，首先要明确有关对外开放战略的一些理论问题。

## 一 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是马克思主义的战略 决策，是我们长期坚持的基本国策

无产阶级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应当是开放型的国家。历史上的封建社会是一种封闭的、基本上自给自足的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是开放型的。资产阶级开拓了世界市场，使全世界各国的生产和消费都变成世界性的，它打开了世界并征服了世界。为了自己的政治经济利益，资产者走遍世界，到处开拓，到处经营。与资产阶级相伴而生的无产阶级更是世界性的，无产阶级的产生和发展、所从事的解放事业，作为它的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都具有世界意义。马克思、恩格斯讲过，工人无祖国，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阶级，它应当而且必须吸收全人类的一切先进的成就，以此为基础，去建设没有剥削、没有阶级，真正自





由平等，光明灿烂的新社会。因此，无产阶级应当具有最远大的眼光，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它所领导的国家应当是更加开放型的国家，以便于最终使国家消亡。

关于对外开放，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一系列重要的论述，形成我们对外开放战略方针的理论基础。按照原定的写作计划，马克思曾打算在《资本论》第4卷和第5卷论述世界市场、对外贸易、外汇等问题。但他没能来得及对这些问题作详尽的阐述。但他在《资本论》中的一些有关论述，例如，关于世界市场、商品的国际价值、世界劳动的平均单位的理论，以及关于资本输出等等，至今仍然有效。《共产党宣言》描述过，资产阶级造成了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世界性联系，使它们在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上互相往来和互相依赖。这种状况，今天依然存在。列宁在领导苏联初期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制定了新经济政策，提倡租让制，把社会主义国家的矿山租给外国资本家，利用外国的资金和先进技术。他强调，不学习资本主义的长处，就不能建设社会主义；并且指出，一个共产党员如果不能接受人类历史上一切先进的成就，不肯学习资本主义的一切长处，那他就不能成为真正的共产主义者。

斯大林根据列宁的论述，认为苏维埃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是相互依赖的，不能孤立存在。本着这个指导思想，在苏联第一个和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大量引进了外资和先进技术，并且聘用了大批的工程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帮助苏联搞建设。二三十年代的许多重点项目，几乎都是利用了西方国家的资本，并聘用了美国和德国的工程技术人员搞起来的。一些帮助苏联建设的外国专家还获得了列宁勋章、红旗勋章。

毛泽东同志在建国初期，也强调要学习一切国家的长处，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发展对外贸易。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根据马克思主义原理，结合我国实际，制定了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的战略决策，指出必须打开两个市场，即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必须利用两种资源，即国内资源和国外资源；必须学会两套本领，即搞好国内建设的本领和发展对外经济贸易活动的本领，把对外开放作为长期不变的基本国策。对外开放是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必不可少的一项战略措施，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的前途，关系到亿万人民的根本利益。

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要从具体国情出发，特别是从生产力的状况出发，采取多种经济形式。不仅要有全民所有制经济，集体所有制经济，还要有个体经济作为必要的补充。按照对外开放的方针，引进外资，创办合资企业或外国资本的独营企业，这也是对社会主义经济必要的和十分有益的补充。因此，对外开放是一个长期的战略方针。

## **二 对外开放是全面开放，是面向世界， 而不是面对世界的某一局部的开放**

### **(一) 要同发达的资本主义世界发展经济贸易**

处理我国同资本主义世界的关系，要从世界形势的实际出发。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长期并存、互相依赖、互相斗争，最后导致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胜利，这是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一条根本规律。第一次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革命形势很好，使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作出这样的估计，认为资本主义很快就要灭亡，社会主义很快就要胜利。然而，事实却是两类国家的长期并存。列宁估计帝国主义尽管是资本主义的垂死阶段，



但还会有高度的发展。二次大战后斯大林却认为这种估计过时的。但是，事实证明列宁的估计是正确的。战后，资本主义国家局部地调整了生产关系，大力发展科学技术，促成了经济高速增长“黄金时代”。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形势的发展，证明资本主义还有一定的生命力。现代最先进的科学技术，主要还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掌握。另一方面，社会主义作为新生事物，在其发展过程中，由于经验不足，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掌握不够，也常常出现失误，走弯路。从国际上看是这样，从中国的情况看也是这样。这是事实。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我们必须认识到，社会主义体系和资本主义体系会并存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在长期并存中，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既相互依赖，又相互斗争。我们需要利用外国资本，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方法，而外国资本则看中和需要中国这个广大的潜在市场。这两类国家的相互斗争始终存在。我们的斗争目的在于最终取代资本主义制度，而他们却妄图使我们资本主义化，使资本主义永存。斗争的最终结果，按照社会发展客观规律，一定是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

因此，对于资本主义国家，我们要实行大胆的开放政策。有人认为，开放会复辟资本主义，办经济特区是殖民地化，开放沿海城市是重蹈旧中国“门户开放”的覆辙，劳务输出是送上门去受人家剥削。这种种观点都是受“左”的思想的束缚，都是错误的。这些同志常常失去自信，害怕资本主义，却不了解我们已经拥有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人民民主专政，保证着我们沿着社会主义道路胜利前进。苏联建国初期，条件那么困难，国际环境那么恶劣，列宁和斯大林还敢于采取对外开放政策，我们在今天这样有利的国际国内环境下，更应当采取积极的对外开放政策。



## **(二) 要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平等友好基础上发展经济贸易关系**

社会主义国家应当按照各自的国情，采取合乎本国实际的模式建设社会主义，互不干涉，互不强加于人，实行真正平等友好的经济合作。近年来我们恢复和发展了同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正常关系，增加了经济文化方面的友好往来，这是完全正确的。

50年代初，斯大林曾提出，有两个并行的、相互对立的世界市场的理论。战后，世界分裂成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两个世界市场的理论就是依据这种形势提出来的。当时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严格的封锁禁运。在这样的条件下，这种理论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互助建设，起一定的鼓舞作用。但是，60年代后，社会主义阵营不复存在，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逐步与社会主义国家恢复正常的关系，进行经济贸易往来。现在，世界市场依然是统一的世界市场，并不存在两个并行的、相互对立的世界市场。随着新的技术革命的发展、随着国际分工的日益深化，统一的世界市场也愈加发展。斯大林的上述理论显然已不符合当今世界的实际情况。

## **(三) 更要向第三世界开放**

积极团结和支持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是我国对外政策的基本立足点。我们要支持他们为建立比较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而进行的斗争。这一斗争，实质上是第三世界国家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霸权主义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继续。我们要积极参加南南合作。帮助它们建设独立的民族经济，以巩固其政治上的独立。要扩大同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贸易关系，其中包括对那些比较穷困的国家给予国际主义的援助。

我们对外开放要做到全面开放与区别对待相结合。如上所



说，我们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第三世界国家一律实行开放政策，但对各类国家又要有所区别。对资本主义国家是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进行平等互利的经济技术合作和交流。对社会主义国家是真正完全平等友好的合作。对第三世界国家是在平等互利，形式多样，讲求实效，共同发展的方针下大力发展经济贸易往来和互助合作。对同一类国家中的不同国家，也要根据不同的情况区别对待。总之，我们的对外开放，是实行多元化的战略方针。

### 三 对外开放同自力更生、对内搞活经济的关系

自力更生决不能理解为自给自足，闭关锁国。自力更生是指主要依靠自己的努力，运用自己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来进行建设。闭关锁国是封建主义自然经济的表现，同社会主义根本不相容。对外开放，目的在于增强我们自力更生的能力。比如，引进先进技术改造现有企业，提高劳动生产率，使我们的生产更加现代化，这就增强了自力更生的力量。而自力更生的能力越强，对外开放的领域就越广阔。我们工业力量的增强，促成越来越多的商品出口，换来越来越多的外汇，从而又促进了越来越多的商品进口。因此，对外开放与自力更生是相辅相成的。那种把二者对立起来的观点是错误的。

对外开放与对内搞活经济的关系也是这样。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这种计划经济要自觉地依赖和运用价值规律，用经济杠杆来实现。这是我们所要求的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即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我们不应该把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等同起来，也不能把商品经济同计划经济对立起来。奴隶社会有自己的商品



经济，它为奴隶主服务；封建社会也有自己的商品经济，它为封建主服务。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是最高度发展的商品经济，劳动力也成了商品，它完全为资产阶级服务。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不同层次的社会生产力，各种经济成分的共存，以及发展对外经济贸易的需要，决定了社会主义社会一定存在着商品经济。这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它是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服务的。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明确解决了这个重大问题，这个新的突破对于解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问题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这样，我们就能够摆脱从苏联搬来的那种把计划经济作为惟一主体，排除市场机制，靠行政手段办经济的僵化模式，把作为国民经济细胞的企业搞活，整个国民经济搞活。对外开放，引进外资，吸收先进技术，学习科学管理方法，改造老企业，兴办新企业，将极大地推动我国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将增强国家财力，增强利用外资的能力，从而更加促进对外开放，在广度和深度上继续向前进展。

#### 四 对外开放的宏观效益和微观效益相结合

一般来讲，发展中国家有两种经济发展战略，一种是进口替代战略，另一种是出口替代战略。这两种战略方针在许多情况不同的国家都收到一定的效果，但也都有一定的缺点。进口替代战略着重发展民族经济，限制国外先进工业制造品的进口，但它常常保护了国内产品的落后。出口替代战略着重搞加工出口工业，促进经济高速增长，但容易导致国民经济单一化，加深对发达国家的依赖，丧失经济的独立自主。我国的国内市场庞大，资源丰富，进口、出口都有一定基础，所以应把两种战略方针兼收并用，不是单纯搞进口替代或出口替代，既要发展民族经济，又要



发展对外贸易。对外贸易采取出口进口互相促进的方针，不要为出口而出口，为进口而进口，出口多进口多都是为了提高社会主义宏观效益，促进现代化。比如，进口粮食可以使有些地区发展多种经营，发展乡镇工业。我们对进出口贸易的理解要从国家的宏观利益，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全局要求来考虑，不能单纯看微观效益。进出口的微观效益主要靠改革外经外贸的体制、改善经营管理，使外贸扭亏为盈。引进先进技术、利用外资必须靠科学的经营管理方法，经济效益才能大。我们必须把对外开放的宏观效益和微观效益统一起来，微观效益要服从于宏观效益，而宏观效益又必须以微观效益为基础。

还有两种理论也需要研究。一种是作为出口替代的指导理论的李嘉图的比较成本说或叫比较利益说。在英国资本主义刚刚发展之时，比较成本说在反对封建割据，处理谷物税，开拓自由贸易，发展资本主义的过程中起了积极的进步作用。这种学说在今天的国际贸易中，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有效的。按照这个理论，贸易双方都得到好处，两个国家都节约了劳动。这是李嘉图比较成本学说的合理核心，我们应该接受这个核心，在对外经济关系上，在对外贸易上，在一定程度上还可以利用这个理论。出口替代论以这个理论为根据，尽量多出口，可以互相节约劳动，首先使自己国家的经济发展起来，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这个资产阶级的古典理论有一个基本性错误，它掩盖了发达国家对比较落后国家劳动人民的剥削。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开放和对外贸易，不能把这个理论作为指导思想。我们有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对外贸易理论和对外开放理论作为我们的指导思想。

另外一种理论叫“常数”论，即一个国家的进出口额要和该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保持一定的比例，这是个常数，不是变数。这个理论在70年代以前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是比较合乎实际的。



70年代以后，由于科学技术大进步，国际经济关系越来越密切，所以国民生产总值中出口额会越来越大，常数成为可以逐步增加的变数了。现在，我国的进出口额还少得很，还应大力发展，所以常数论对我们不适用，我们不应受它的限制。

## 五 对外开放与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认为，进入资本主义时期一切国家和民族的物质生产是世界性的，精神生产也必然是世界性的，都不能为一个国家所垄断。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吸收世界上全部文明的积极成果，不仅包括我们所说的物质文明，也包括我们所说的精神文明，比如科学、技术、艺术、哲学、卫生习惯、道德规范、文明礼貌等等。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的最主要标志是劳动生产率要高于资本主义，但现在我们还远远不够，所以要引进它的先进技术、经营管理方法来提高我们的劳动生产率，发展我们的生产。现在科学技术革命中的生物工程、海洋工程、宇航工程等基础科学，资本主义国家都比我们先进，就应当学习，决不能搞林彪、“四人帮”所鼓吹的那种愚昧落后的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总是用一分为二的观点来看待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主义有它的致命弱点，它必然要灭亡。但是它比封建主义好，它没有封建社会那样森严的等级观念。资本主义企业的办事效率比我们许多部门许多企业要高得多。在对外开放中学习他们的高效率，这也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个内容。当然，在吸收他们长处的同时，又必须防止它们的消极的、腐朽的东西，抵制和反对各种精神污染。我们要坚决实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方针。总的来说，对外开放与精神文明建设不矛盾。

只要我们贯彻中央的正确方针，就可以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





明的发展。

在对外开放中，我们还应当注意研究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观点，供我们参考。比如，关于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的关系问题，苏联东欧国家从50年代起就展开了讨论，材料很多。我们就应当深入研究，这对我们是会有帮助的。

## 六 对外政策与对外开放

我们外交政策的基础应该说是经济外交。因此，经济上实行对外开放，同各个国家开展经济贸易往来，对我们的外交工作会起决定性的作用。我们办经济特区，作为我们对外政策的窗口。我们的经济外交活动除了政府间的贸易经济活动之外，还要有民间往来。民间外交要同政府外交相结合，就能形成一个真正强大的力量。“一国两制”是我们对外开放中具有深远理论意义和重大现实意义的构想，香港和台湾回归祖国以后，我国的对外开放将有更多更大的窗口，将会极大地开拓我国的对外经济贸易活动。

最后，讲一点天津对外开放问题。天津背靠首都，是沿海第二大城市，是带动华北经济的枢纽。天津不仅仅是天津的天津，而且是华北的天津，全中国的天津。因此，研究天津的发展战略，一定要面向华北、面向全国、面向太平洋、面向全世界。在80年代末、90年代、21世纪初，太平洋和亚洲地区很可能成为一个新的世界经济中心。天津作为沿海大港口城市，工业、商业、交通运输等方面具有很大的优势，在我国对外开放中将发挥极大的积极作用，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天津的工作做得很出色，可以说中外闻名。我相信天津市在党中央领导下，一定能在执行对外开放这一基本国策中大胆创



新，为全国提供更多的好经验，为开创全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作出更大的贡献。

(1984年10月22日在天津市对外开放理论讨论会上的发言摘要)



## 从香港问题圆满解决论“一个 国家,两种制度”英明构想

在举国欢庆新中国成立三十五周年前夕,中英两国政府草签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全国人民,包括500多万香港同胞在内,欢欣鼓舞,世界舆论包括英国朝野人士在内同声赞誉,认为用和平谈判方法解决香港问题为和平解决当今世界各项历史争端问题树立了良好的榜样,因而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

和平解决香港问题这一决策的理论基础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科学构想。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中国有香港、台湾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出路何在呢?我看只有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一国两制”这个构想的内涵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国家内,在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而在1997年恢复行使我国主权的香港和今后将回归祖国的台湾,在较长时期内保持资本主义制度。在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容许两种制度长期并存,互相支援,共同繁荣。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们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根据这个精神,我党决定了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社会主



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个文明建设一起抓等一系列基本政策，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逐步地恢复和形成了许多符合我国国情的特色。随着香港问题的圆满解决与台湾的和平回归祖国，我们这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将会带有一个新的重大特点，那就是中英两国政府所确认的，并受到世界舆论所赞赏的“一国两制”的英明构想。它确实是科学社会主义实践史上的一大创举。

“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设想，是我党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彻底摆脱“左”倾错误，解放思想，贯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这一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产物。早在1978年底，党中央和邓小平同志在制定和平解决香港、台湾问题的决策时就形成了这个设想。1979年元旦，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宣布了争取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1981年9月30日，叶剑英委员长进一步阐明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九大方针政策，其中包括“台湾在祖国统一后可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自治权”，“台湾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同外国的经济、文化关系不变。私人财产、房屋、土地、企业所有权、合法继承权和外国投资不受侵犯”。1984年5月15日六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更加明确地指出：“统一祖国，振兴中华，是历史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从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鉴于历史的经验和台湾的现实，我们提出了祖国统一之后可以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设想。”

关于香港问题，1982年9月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华时，邓小平同志就曾同她谈了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方案和平解决收回香港主权的主张。接着制定对港十二条方针政策时更是把这个设想具体化了。以后在1984年4月18日和7月31日，邓小平同志两次接见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时都谈到“一个国家，



两种制度”的设想问题。六届人大二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详细地说明实现这一方针的具体政策：“我国将在1997年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这是坚定不移的决策。为了继续保持香港的稳定和繁荣，我们在恢复行使主权后，对香港将采取一系列特殊政策，并在50年内不予改变。这些政策包括：根据我们宪法第31条，成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由香港当地人自己管理，享有高度自治权；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和生活方式不变，法律基本不变；香港将继续保持自由港和国际贸易、金融中心的地位，继续同各个国家和地区以及有关的国际组织保持和发展经济关系；英国和其他国家在香港的经济利益，将受到照顾。”

“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设想是我党中央和我国政府充分地尊重历史，尊重现实，照顾各方，深思熟虑，为了和平统一祖国而提出来的重大决策。

就香港来说，众所周知，香港几千年来一直是我国领土，只是在100多年前，鸦片战争后，英国凭借三个不平等条约强占的。而这三个不平等条约，中国人民就从来没有承认过。因此，中国到1997年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是天经地义的，是完全符合国际法的。100多年来，港英当局依靠和利用了各种有利条件，特别是我们香港同胞的聪明才智、刻苦勤奋，祖国大陆对香港的大力支持，以及一定时期的国际有利形势，在香港进行了经济开发。特别近20年来，香港经济高速发展。70年代其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率超过10%，两倍于西德，四倍于美国。香港对外贸易额在亚洲仅次于日本占第2位，在资本主义世界占第16位。香港工业产品质量较高，现在成衣、手表、玩具、收音机、电风扇等10种产品的出口额占世界第一位。1983年人均生产总值达3.89万港元；人均收入达4600美元，在亚洲仅次于日本和新加坡。居民生活水平大为提高。整个经济形势比较稳定和繁荣。主



要缺点，它是处于殖民地地位的资本主义社会，贫富悬殊，精神生活空虚，社会治安不宁。

党中央和国务院遵照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基本路线，对上述香港的历史事实和现状，作了充分考虑。同时鉴于当前世界处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制度长期共存的历史阶段；国内全力实行搞活经济和对外实行开放政策，建立经济特区，开放沿海城市，积极利用外资、侨资，建立国家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企业，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和催化剂。正是从世界和中国这样的实际情况出发，作出了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科学构想，首先来解决香港问题，在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中迈出一大步。实现这个决策，对香港人民非常有利，对全中国人民非常有利，对世界各有关国家和全世界人民也都是有利的。

为什么说这一决策对香港人民非常有利呢？首先，是因为它可以实现香港绝大多数居民渴求和平回归祖国的愿望，使他们摆脱二等公民的屈辱地位，享有作为强大的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和主人翁的无上光荣。同时，可以使香港长期保持稳定和繁荣。香港的绝大多数居民是真诚愿望中国能如期恢复行使主权的，但同时又担心在收回主权以后，说过的话没有保证，从而使人心动荡，资金和人才外流，人民生活水平下降。香港居民的这种心境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现在中英联合声明明确决定，按照“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方针，在1997年收回主权之后，香港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现行法律基本不变，自由港和独立关税地区的地位不变，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不变，香港同各国、各地区和各个国际经济组织的经济文化关系不变，私有财产和外资合法利益受到保护，特别行政区的政府由香港当地人组成。在这种情况下，香港的局面必然能够继续保持稳定和更加稳定，香港作为一个国际金融、贸易、航运、旅游中心，将继续保



持繁荣和更加繁荣。居民生活水平，不仅不会降低，由于经济继续发展，大陆内地的供应更加充分，还将继续提高。这是完全可以肯定的。因此，上述那种担心是完全不必要的。

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方针解决香港问题对全中国人民非常有利。首先，这个方针保证了香港问题用和平方法来解决，实现了和平统一祖国这一伟大任务的一个重要部分，而且必将有力地推进台湾和平回归祖国。而且只有用这样的方针，才能保持香港稳定与繁荣。正如英国外交大臣豪氏所说，中英双方应该妥善地解决问题，“以实现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基础上确保香港未来的稳定和繁荣”。其次，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方针解决香港问题，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将有极大的帮助。我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现在的劣势是资金不足，技术和经营管理方法比较落后。香港保持资本主义制度，保持稳定和繁荣，极大地有利于我们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我们可以通过香港这个国际金融中心和贸易中心，直接间接地获得大量外资、侨资，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科学经营管理方法，并且进一步扩大对外贸易。我们还可以通过香港聘用外国专家，为我国培训人才，促进我国智力开发，加速我国现代化进程。

此外，亚太地区今后将逐渐成为一个新的世界经济中心，香港在亚太地区作为金融、贸易、交通运输中心的作用将越来越重要。今后，它将作为我国的一个享有高度自治权的特别行政区的重要角色，和我国沿海的上海、大连、天津、广州等港口城市相互配合和协作，实行内联外放，一方面大大打开国际市场，在广度和深度上发展我国对外经济贸易，另一方面大大促进大陆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有人认为，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将会使香港的资本主义逐步挤垮我国的社会主义。我们认为，这种担心是完全不



必要的。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占绝对优势。但是我们必须有适当数量的个体经济作为必要的补充；在实行对外开放过程中，我们还将建立一定数量的中外合营和外资独营的国家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企业，同样作为一种必要的补充，以加速我国的现代化建设。香港尽管经济比较发达，它们长期保持资本主义不变，相对来说，它也将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的发展壮大，而决不会动摇我国社会主义的基础。试想大陆人口是香港人口的 200 倍，全国土地面积是香港地区面积的 9000 多倍，香港的生产总值约为大陆社会总产值的 1/25（1982 年）。在这种条件下，香港的资本主义经济再怎么发展，也绝对不可能在全国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绝对改变不了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

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方针和平解决香港问题，对世界有关国家都很有利。它首先对英国有利。第一，它使英国摆脱对香港的那种早已过时的殖民统治，将使英国在全世界赢得美好的政治声誉，受到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赞赏。两年多来，英国领导人在中英谈判和平解决香港问题中所持的明智的和有远见的立场，赢得了人们的钦佩。其次，中英双方协议保证，在 1997 年后，英国在港的经济利益将会受到照顾，对英籍公务人员和警察，香港特别行政区将予以留用，待遇不降低。第三，更重要的，有利于以后中英两国将以更大的广度和深度，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进行经济、文化合作。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资源丰富、正在全力进行现代化建设的中国，对英国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潜在市场。英国人民对中国人民有深厚的友谊。中英经济、贸易交流合作的前景十分广阔。这对英国经济的振兴，是很有利的。和平解决香港问题，香港仍然保持自由港的地位，仍然是国际金





融、贸易、航运中心，这对美国、日本，对东南亚国家，对澳、欧、非各国的经济活动和复苏振兴都将是有利的。

“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设想，由我国领导人正式提出后，受到了广大港澳同胞、台湾同胞和国外侨胞的关注、同情和支持。台湾学者沈君山和立法委员卜少夫等主张“一个中国，两个制度”的竞赛，就是例子。特别值得指出的，英国朝野人士，包括撒切尔夫人、前首相希思、外交大臣杰弗里·豪以及不少国会议员，也支持这个设想，同意用和平方式把香港主权归还中国，保持香港的稳定和繁荣。杰弗里·豪并且表示，这种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方法，可以“为全世界树立合作的榜样”。现在香港问题能够得到和平解决，更使我们信心倍增，肯定“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设想是行得通的。

“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是我党中央、国务院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与当前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创造性的新发展。它构成了我们和平统一祖国这一基本国策的理论基础。其一部分内容已经载入我国的宪法第31条。它符合香港人民、台湾人民和全中国人民以及全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因而决不会轻易变动的。

有人说，“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方针，好虽好，但怕只是说说而已，并不能见诸实施；或者说只怕说不定什么时候，人事一变，也就变了。我们说，这种担心是没有根据的，不必要的。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过拨乱反正，无数事实证明我们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是符合人民利益的。在现在，在今后，凡是正确的政策决不会变，也谁都变不了。我们的国家是按政策，按宪法、法律办事的。我国的任何政策都是根据民主集中制，由中央集体作出决定而不是任何个人说了算的。我们的宪法和法律更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制定通过的。我们坚



决维护正确政策、宪法和法律的连续性。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说话向来是算数的。我们“言必信，行必果”，决不搞什么小动作。

有人认为，我国在收回香港主权以后，让香港长期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不变，这就证明资本主义制度比社会主义制度优越。这个想法不对。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明确地肯定社会主义制度远远优胜于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确实有它的优点，但它有致命的弱点：存在着剥削制度，贫富悬殊，人民不能当家作主。社会主义克服了资本主义的这个致命弱点，同时学习资本主义的一切长处，来逐步充分发挥自己的优越性。我们为了用和平方式解决香港问题，并且保证香港的长期稳定和繁荣，所以采取“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方针，为远东和世界和平作出贡献。同时，在以大陆的社会主义制度为主体的前提下，大陆与香港、台湾在经济上相互支援，取长补短，共同发展，实行两种制度在一国范围内的和平竞赛。这一竞赛的过程和结果，将对世界人民和人类进步事业提供有益的经验。

还有人说，所谓“一国两制”，不过是“一党两制”改头换面的说法。这是曲解。我们必须把党和国家的关系摆正。不错，中国的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并且取得了胜利和辉煌成就。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和建设主要靠正确的思想和政策。我们的国家属于人民，而不是属于党。相反，中国共产党的惟一任务就是为人民服务，为人民的国家服务。人民是国家的惟一主人，共产党员及其干部是人民和人民国家的勤务员。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府吸收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参加，共同管理国家政务，互相监督，荣辱与共。香港在收回主权以后，实行港人治港，由香港本地各界人民的代表组成特别行政区政府，根据行将制定的基本法管理香港，根本谈不到“一党专



政”的问题。所以，“一党两制”的帽子是决然戴不到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头上来的。

“一国两制是共产党的统战阴谋”，台湾宣传机器这样说。这话说对了一半，说错了一半。它说对的部分，就是在实现和平统一祖国，正确解决香港问题的艰巨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确乎必须广泛深入地展开国内和国际统一战线工作。我们要向香港各界代表人物做大量的统战工作，也要向英国朝野人士做大量的国际统一战线工作。统一战线仍然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个法宝。说错了的一半是什么？那就是共产党员和中国人民，无论在国内问题或者国际问题上都绝对不允许搞阴谋。相反，我们向全世界公开讲明“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设想，公开说明我们的各项政策，一切都放在桌面上和平地友好地进行会谈和解决各项问题的。

有人评论“一国两制”说，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上层建筑又可以极大地影响甚至改变经济基础。中国实现和平统一后，香港、台湾的主权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上层建筑的最大改变，这种改变必将促使香港和台湾资本主义经济基础改变，云云。我们认为，这种理解是教条式的，不切合实际的，错误的。因为第一，中英两国政府作出了中国从1997年后恢复在香港行使主权，香港的社会经济制度和生活方式长期不变的决定，这是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所起的最强有力的反作用。第二，香港当地居民自己组织政府来管理，并且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形式把“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决策固定下来，这样便保证了香港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长期不变。

最后，有人提问，实行了“一国两制”，经过两种制度的和平竞赛，最后结果将怎样呢？我们认为，今天谁也不必，也不可能为六七十年以后香港的社会经济制度预制蓝图。我们坚信我们



的子孙后代将会比我们更加聪敏懂事得多，他们必能根据社会发展的科学法则和自己的切身体验，密切结合当时的实际，作出最明智的抉择。

用“一国两制”和平地解决国内和国际争端，在世界上是一个新的尝试。在当前中英合作、和平解决香港问题上，它已初见成效。正因为这个方法既切合实际，又合情合理，只要各方以维护世界和平、振兴各国经济为重，采取“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和平商谈解决问题的方针，对于缓解和消除当前世界上许多类似的足以引起严重冲突的爆发点，可能是大有裨益的。近来欧美不少学者评论道，“一国两制”思想的提出，“可以为未来的政治哲学开一新纪元”，还“足以开创未来世界的新局面”。<sup>①</sup>看来，这种评论并非全无根据。

（《世界经济导报》1984年10月1日）

---

<sup>①</sup> 参见梁厚甫：《谈一个国家，两种制度》，香港《明报》1984年6月15日。



## 六、关于世界经济研究 与世界经济学 的学科建设



## 按照科研规律,搞好 世界经济研究

当前,我国已经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经济科学,包括世界经济学科在内,在实现这项光荣而艰巨的历史任务中,毫无疑问,负有特殊重要的使命。学习世界各国的长处,把外国一切好的经验,先进的科学技术、经济管理和企业管理中合乎科学的东西都吸收过来,为我所用,乃是加速实现我国的四个现代化的一个重要途径,这就要求我们加强对世界经济的研究。

世界经济是一门重要学科。要搞好世界经济的研究工作,我们必须按照科研规律办事。我想就这方面谈几点粗浅看法。

### 一 必须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对待 世界经济研究

科研的目的是对客观实际进行调查、分析、研究,以寻求、认识和掌握事物的发展规律,并利用这些规律来为人民谋利益。因此,科研工作必须采取唯物主义的观点和理论与实际结合、实事求是的态度。“实事”就是客观实际,即研究对象,“求”是研



究，“是”即客观规律。也就是说，研究工作要从客观实际情况出发，搜集和积累大量的事实材料，然后对这些事实材料仔细地加工整理，系统地周密地分析和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发现和认识客观规律。为了达到这一要求，有必要做好两项工作，一是加强有关的图书资料工作，筹建世界经济资料中心，研究人员都要重视和学会做资料工作，做好读书札记和资料卡片、索引工作。二是加强对各国经济的实地调查研究，有计划地分批分期地派科研人员出国考察、调研，取得第一手材料。三是加强与国内经济机关和生产单位的联系，了解它们在实行现代化过程中的问题和需要，以便有的放矢，洋为中用。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们行动的指南，是我们研究世界经济的指导思想，而不是我们研究工作的出发点。我们的出发点是当今世界经济的实际情况和问题。自从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经济出现了许多新现象，对我们提出了许多新课题。我们必须一切从当前的实际情况出发，尽可能地掌握详尽的材料，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进行分析，得出新的看法，新的观点，新的结论。我们决不能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过去具体问题所做的现成结论上，墨守成规，踏步不前。这不是马克思主义对待科研的态度，相反，这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态度，对我们的科研工作十分有害，必须坚决反对。

## 二 必须用研究事物内部的运动及其与他事物的联系的方法研究世界经济，用辩证方法来研究世界经济

任何客观事物的发展都有它自己运动的规律。我们应该怎样



认识和掌握它们的运动规律呢？“社会的变化，主要地是由于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sup>①</sup>。这说明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是内因，它是由客观事物本身的内在矛盾决定的。但客观事物互相之间又都是有联系的，因此其外部条件对事物变化也起着一定的作用。所以，我们不仅要透过事物的现象，研究事物内部的运动，而且要研究它与其他事物的联系。只有这样，才能揭示它的规律性。如对资本主义生产周期和经济危机的研究，我们要从生产社会化和资本主义占有这一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出发，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过剩的实质。另一方面必须看到当前资本主义国家干预经济的作用，经济集团的作用，通货膨胀、财政税收政策等经济因素以及某些重大政治因素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才能认识当前资本主义生产周期和经济危机的规律性及其新特点。

### 三 科学与迷信根本不相容，科学无禁区

事物是不断发展的。绝对真理由无数相对真理构成，是“相对真理的总和”<sup>②</sup>，一切以条件、地点和时间为转移。所以科研工作要富有创造性，要坚决破除迷信，不要被老框框套住。要敢于攻难关，补缺门，勇于根据客观事物的发展提出新概念，新命题。任何迷信从来都是人们自己造成的，它与科学水火不相容。科学根本不承认有什么禁区。任何客观事物都是可以认识的。我们既反对不可知论，更反对“不应知论”。过去研究世界经济有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77页。

② 《列宁选集》第2卷，第134页。





很多禁区，我们要坚决地逐步地加以突破。比如，从60年代以后，对苏联和东欧各国的经济，就被视为禁区，不敢从实际出发，加以深入周密的研究。这是不对的，必须打破这样的禁区。类似上述的迷信，至今在世界经济研究中还有不少。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我们固然要着重地进行研究，对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苏联的经济，对于当代资产阶级各派经济理论，我们也必须认真地分析和研究，它们对于我们都有借鉴意义。其中有些东西是应该着重批判的，但是不研究，不懂得，我们凭什么去批判呢？那不是胡说一通又是什么呢？而我们过去的毛病却正在这里。

#### 四 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相结合

马克思主义世界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世界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它对世界经济的研究起指导作用，为世界经济的研究提供最基本的原理、经济范畴和经济概念，世界经济必须以此为依据来开展研究。掌握好基础理论，我们对世界经济的研究就易于透过事物的现象，抓住事物的本质，找出世界经济发展变化的规律性。例如，对当代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的研究，如果我们不掌握马克思、列宁关于资本积累、资本集中和资本垄断的基本原理，就不可能理解当代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和新的特点。同时，对世界经济的深入研究，又可以充实和丰富政治经济学基础理论。世界经济和政治经济学，两者密切联系，互相促进。马克思在创作《资本论》时就对英、法、美、德等国家经济研究得非常透彻。马克思对这些国家的经济所做的深刻研究，引用的大量具体事例，极大地丰富了《资本论》所要阐明的原理。今天，我们对国家垄断



资本主义经济的深入研究，无疑会丰富和发展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光辉学说。

## 五 真理愈辩愈明，要大力提倡学术 民主，百家争鸣

客观事物是十分复杂的。一事物往往是多对矛盾的结合体，而每对矛盾都有两个方面。矛盾的发展和暴露都有一个过程。当矛盾还没有充分暴露的时候，人们往往难于认识它的全貌和性质。此外，一事物和其他事物有多种联系，而人们的认识常常受到一定条件的限制，有很大的局限性。所以在学术问题上一定要贯彻党的百家争鸣方针，发扬民主，鼓励大家发表不同意见，以实践为根据，展开讨论，集思广益，互相补充、矫正，使得出的结论逐步地比较正确地反映客观实际。比如，世界经济学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象究竟是什么，应该如何研究？国内外学术界对这问题是有争论的，我们就应该展开讨论，各抒己见。再如，对苏联和东欧各国的经济改革也存在不同的看法，我们也应该实事求是地加以研究，展开争论，以便得出比较符合实际的结论。

## 六 科研工作要允许失败，要允许 科研人员犯错误和改正错误

“失败是成功之母”。这句话是人们从长期实践中得出的经验总结。在科研领域，决没有百战百胜的将军，决没有不犯错误，一贯正确的英雄。毛泽东同志说：“由于实践中发现前所未料的情况，因而部分地改变思想、理论、计划、方案的事是常有的，全部地改变的事也是有的。即是说，原定的思想、理论、计



划、方案，部分地或全部地不合于实际，部分错了或全部错了的事，都是有的。许多时候须反复失败过多次，才能纠正错误的认识，才能到达于和客观过程的规律性相符合，因而才能够变主观的东西为客观的东西，即在实践中得到预想的结果。”<sup>①</sup> 在世界经济研究工作中，例如对世界性的或某一国家的经济危机的预测，由于实践中发现没有料到的情况以及其他种种原因，需要改变原来的看法的事是常有的。因此我们对学术上犯错误的同志决不能打棍子、扣帽子、抓辫子，应该鼓励人们充分发挥独立思考作用，发表不成熟的意见，提出独到的见解，并允许他们犯错误和改正错误。只有这样，才不致使那些尽管最初看来并不很完整，但却颇有科学价值的新思想、新理论、新观点被扼杀在它们刚刚诞生的摇篮里。只有这样，才有利于科研人员不畏科研道路上的崎岖小道，勇往直前地去攀登科学新高峰。

## 七 个人研究要与集体协作、 集体讨论相结合

科学研究是人的逻辑思维活动，通过各个人的大脑活动来实现，因此个人研究是基础。同时，在这基础上进行集思广益的集体协作和集体讨论，又是非常必要的。今后随着科学的发展和科研手段的现代化，集体研究可能不断增多，但个人的深入思考和研究仍然是基础，我们决不能轻视。片面地过分地强调集体研究，集体创作，常常容易抹煞人们的独创性，不利于科研的蓬勃发展。不应忘记，马克思写的《资本论》、列宁写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样一些划时代的光辉著作，主要是他

<sup>①</sup>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82—283页。



们个人科研的成果。当然，我们在社会主义社会条件下进行科研，应该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下从事科研的优越性，要使个人研究与集体协作、集体讨论合理地结合起来，充分发挥个人和集体的作用。

## 八 科研规划、科研项目要与科研人员个人的研究方向、长处、兴趣、爱好相结合

就一个科研单位来说，制定的科研规划项目应该尽可能地照顾到本单位科研人员的特点，这样，就不仅能使规划订得比较合乎实际，切实可行，而且有利于发挥科研人员的特长，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而就科研人员个人来说，个人的研究也要为完成本单位规划规定的任务或国家交给的任务而努力，而且应该把完成党和国家交给的研究任务放在首位。世界经济研究工作者对自己的专业学科和课题要刻苦钻研，持之以恒，不要随便更动研究方向。要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解决，务求逐个突破，有所创新，切忌蜻蜓点水，浅尝辄止。

## 九 要保证科研人员的科研工作时间

时间是搞好科研工作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条件。党中央提出必须保证科研人员每周有 5/6 的时间搞科研。它反映了科研规律的要求，完全正确，非常必要。没有足够的时间，科研是决然搞不好的。必须保证科研人员的 5/6 时间，不要让他们参加不必要的或过多的社会活动，要尽最大可能减少科研人员担负的行政工作和开会时间（学术会议除外）。不要硬叫他们搞形式主义的、无实效的政治学习。一个科研人员一生能够从事科研工作的时间是



很有限的，任何一项比较有价值的科研成果，都需要科研人员注入大量辛勤劳动，需要大量时间。马克思从1843年开始研究经济学，他几乎用了大半生的宝贵时间来研究和写作《资本论》，但直到他去世，还没有完成《资本论》3卷的全部创作工作。《资本论》第1卷于1867年问世，马克思于1883年与世长辞，幸有恩格斯整理马克思的遗稿，才使《资本论》第2、3卷得以在1885年和1894年分别出版。我们必须充分了解科研工作的艰巨性。

## 十 党的领导要引导和保证全体科研人员按照科研规律搞好科研

各级党委要把科研工作列入自己的重要议事日程。“四人帮”诬蔑所谓臭老九的余毒必须彻底肃清。应当把科研人员当做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看待。他们有缺点、错误是难免的，应当根据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热情帮助他们，在新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向前看，向前进，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事实证明，党委书记、委员们，经常听听学术报告，参加科学座谈，大有好处。一个科研单位能否把本单位的科研工作搞好，关键在于这个单位的党的领导。党委领导科研工作，首先要引导大家按照科研规律，用科研特有的手段和方法，开展科研工作，决不要单纯地靠行政手段，凭长官意志办事。要把政治思想工作渗透到科研业务中去，与科研业务密切结合，做得深入细致，逐步地真正地使科研人员达到又红又专的目标。行政后勤部门则要真心实意地为科研服务，为它创造必要的物质条件，包括提供一定的经费和设备，以保证科研任务的完成。

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发展经济科学也必须



按照科研规律办事。当然，科研规律对科研工作的要求不止以上几点，本文仅就其要者谈一些看法，目的是希望引起大家对这一问题的重视，为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多做贡献。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技术现代化，是四个现代化的先行官和关键；而按照科研规律办事，又是这个先行官和关键的关键。

（《经济科学》1979年第1期）



## 世界经济学与国际经济学

在1980年9—12月赴美讲学期间，我曾与霍布金斯大学和布鲁金斯研究所的美国经济学家、就世界经济学与国际经济学的问题举行座谈，广泛交换了彼此的看法。

座谈是从评论英国剑桥大学教授怀尔斯的《共产主义的国际经济学》一书开始的。

怀尔斯认为，马克思主义在国际经济的理论方面没有什么重大的发展。对此，我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我们主张建立和发展的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经济学，这是不同于西方的所谓国际经济学的。而在马克思主义世界经济学方面，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还是我们的同时代的人，都已做了不少工作，并为它的创立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大家知道，马克思在《资本论》等著作中，曾对国际分工和世界市场等问题作过精辟的论述。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导言中，马克思还曾设想要把政治经济学分成五个部分，其中第四部分是“生产的国际关系，国际分工，国际交换，输出和输入，汇率”。第五部分则是“世界市场和危机”。此外，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对世界市场和国际贸易等世界经济问题进行了大量深入的



研究。

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以及关于俄国资本主义发展和市场问题的一系列著作中，对帝国主义时期垄断资本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作用和性质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既是一本政治经济学的著作，又是一本世界经济的著作。此外，列宁对社会主义经济以及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也作了大量的分析。

斯大林曾一再详细论述过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形势，提出了资本主义总危机的理论和“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的理论（尽管这一理论是有错误的），并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

毛泽东在论述当代帝国主义时，特别强调了经济危机与世界战争的关系，并提出了中间地带的理论和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

在经济学界，人们也早就把世界经济作为“包括世界全体的生产关系以及与这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交换关系的体系”，来加以研究。尤其是以瓦尔加等人为代表的苏联经济学界，对世界经济曾进行了比较深入、广泛的研究。尽管他们的研究工作有着不容忽视的缺点（主要是存在着一种“左”的倾向），长期缺乏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但在世界经济理论的某些方面确曾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那么，西方经济学家为什么会认为马克思主义在国际经济理论方面没有什么重大的发展呢？这主要是因为西方的所谓国际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者所理解的世界经济学有着本质性的区别。按照西方学者的看法，所谓国际经济学，实际上就是国际关系学。对于这种经济学（严格说来，是指它的研究客体），尽管马克思主义者也按照自己的观点把它作为世界经济的一个方面的





内容来加以研究，但它毕竟不是我们注意的中心，更不能代替世界经济学。我们认为，西方的这种所谓国际经济学，至少在如下三个方面与马克思主义世界经济学是根本不同的：

首先，目的和出发点不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建立起来的世界经济学，其目的在于说明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怎样一步步接近于社会主义的大门，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如何得到正确的发展，从而促使社会主义在全世界取得胜利。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世界经济学要揭示社会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必然取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规律性。而资产阶级的国际经济学则从资产阶级的立场出发，千方百计从理论上、方针政策上和方法措施上维护世界资本主义制度，维护（甚至力求扩大）国际垄断资本在世界的统治。

其次，研究对象和内容不同。资产阶级的国际经济学尽管已有几十年的历史，内容相当丰富，但它着重研究的是国际贸易、国际货币金融、国际收支，以及生产增长率和经济增长的模式等方面的问题。而马克思主义世界经济学则研究从世界经济形成以来，世界范围内的生产方式（包括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总体，兼及有关的上层建筑，重点是研究国际生产关系；就当前来说，主要是研究世界上的各种生产方式在世界经济体系中所占的比重、它们的相互关系，以及这种比重和关系的变化趋势。马克思主义世界经济学以世界经济的整体作为其研究的对象。它的研究对象比国际经济学宽广得多，深入得多。当然，这并不是说，世界经济学不研究国际经济关系方面的问题。相反，在世界经济学中，国际经济关系是占有重要地位的。国际经济学中的某些研究课题，如国际贸易中的价格问题、国际金融中的汇价问题、国际垄断资本和跨国公司的管理方法问题、生产增长的模式问题、生产成本的计算问题，以及科学技术如何推广到经济生活中去的问



题，等等，马克思主义世界经济学都必须进行研究，并从国际经济学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中吸收其科学成分，来充实自己的内容，以利于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国家的经济建设。

第三，研究方法及其所得出的结论也根本不同。资产阶级的国际经济学由于其出发点是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因此，它的研究方法从根本上说必然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资产阶级国际经济学虽然有时也谈资本主义的弱点，但它总是强调资本主义是最好的生产方式，总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效果差，劳动生产率和人民生活水平低。这就使它不可能实事求是地看待资本主义世界的现实。它不仅不去揭露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而且对这种矛盾蓄意抹煞和掩盖。因此，它是不可能找到解决诸如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失业和通货膨胀等方面问题的正确途径的。而马克思主义世界经济学为了揭示世界经济发展变化的规律，必须坚持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论的科学方法，一切从实际出发，对具体事物进行具体的分析，并着重注意揭示事物的内部矛盾及事物运动变化的规律，特别是世界范围多种生产方式（主要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生产方式）的矛盾和斗争及其运动的规律。因此，马克思主义者能够从本质上和规律性上正确说明当前的世界经济危机、失业、通货膨胀等问题；指出这些现象都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产物，只有彻底变革资本主义制度，才能解决这些问题。

我们必须指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经济中确乎出现了许多新现象和新问题。这些新现象和新问题迄今还未能作出完整的科学的说明。例如，到底应如何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问题、“南北对话”在经济上可以和应该达到什么目的的问题、发展中国家应如何加强团结和加强集体自力更生的问题、第三世界的发展战略问题等等，都是有待于马克思主义世界经济学进行研究的课题。我们相信，随着马克思主义世界经济学的创立和发



展，这些问题是一定能够得到正确解决的。

任何一种经济学都不会是一成不变的；它们总是随着客观情况的改变而有所变化。即使是资产阶级经济学，也是处在发展变化的过程中。不过，它的这种发展变化的一个基本特点，是日益庸俗化和技术化。大家知道，1929—1933年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危机后，西方出现了凯恩斯主义学说。凯恩斯主义强调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主张赤字财政。这对缓和当时的经济危机曾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凯恩斯主义的推行所导致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却进一步加剧了资本主义的矛盾。目前，资本主义世界所出现的生产停滞、严重失业和通货膨胀长期并存的所谓“停滞膨胀”，就是这种矛盾不断激化的表现。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现实已经宣告了凯恩斯主义的破产。于是，供应学派和制度学派便在西方时行起来，货币学派也以新的装束登上舞台。而所有这些资产阶级经济学说，当然都不可能从理论上找到根本解决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方案，但它们却有可能探讨在一定程度上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行局部调整，使之在一定时间和一定范围内适应当前生产力状况，甚至容许和促进生产力一定程度发展的办法。资本主义制度确已到了衰老的即垂死的阶段。但是，国际资产阶级决不甘心于坐待死亡，它必然千方百计地采取种种补救手段（如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加强国内和国际资本的垄断、实行各种各样的改良主义政策，等等）来苟延它的生命。而资产阶级经济学也就在这一过程中随之发展变化。资产阶级经济学尚且可以有所发展，具有严格科学性的、以客观实践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世界经济，当然更会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战后，世界经济中一系列新现象的出现，正预示着马克思主义世界经济的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即将到来。

如上所述，马克思主义世界经济与资产阶级国际经济学既



有根本的区别，又有一定的联系。就研究对象而论，它们在本质上是不同的，但又有所交叉。因此，在发展马克思主义世界经济学的过程中，与西方经济学者进行一定范围的合作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有益的。在波士顿，加尔布雷斯教授在同我的谈话中曾提到，中国实行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政策是正确的。他指出，无论是资本主义经济还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历史都证明，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必须结合起来。他甚至认为，中国的做法是符合他所提出的所谓“两个动力机”经济的理论的。在费城，我同克莱因教授（1980年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讨论了中国的经济发展问题。当时，他特别提醒我们一要注意抓农业的发展，二要注意搞计划生育。他认为美国实际上是从农业起家的；与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农业较早过关是它的一个突出的长处。在纽约，当我们与列昂节夫教授谈论计划工作时，他认为他的“投入产出”理论的某些内容是适用于中国的。他着重提到，挪威、荷兰、奥地利、法国、墨西哥在实行经济计划方面的做法和经验值得中国参考。他以日本的“倍增计划”为例，指出搞经济计划必须注意世界市场和各主要国家的经济预测。他还谈到了为联合国制定世界经济发展模式的问题。其中有很多意见是值得我们参考的。事实表明，马克思主义世界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可以互相探讨的问题很多，它们之间应该而且可能进行必要的学术交流。

总之，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世界经济学是一门崭新的学科，它在本质上不同于西方的资产阶级国际经济学，但在某些方面又与国际经济学有联系。因此，如果我们抹煞了二者之间的区别，就会使马克思主义世界经济学降低为国际经济关系学，从而使它不可能揭示世界经济发生、发展和变化的运动规律，并进而使这一以世界经济的整体为特定研究对象的独立学科走上歧途，



但如果我们忽视了它们之间的联系，又势必阻碍对西方经济学中某些合理成分的批判吸收，同样不利于马克思主义世界经济学的健康发展。

(1980年9月在美国霍布金斯大学、布鲁金斯研究所与美国经济学家座谈会上发言的综合记录)



## 马克思奠定了世界经济学的 理论基础

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之一马克思，逝世已经整整一个世纪了。今天，全世界广大劳动人民都在怀着崇敬的心情纪念这位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并以百折不挠的精神来实践他所开创的革命事业。

恩格斯在评价马克思作为伟大思想家的贡献时，曾正确地指出了他在人类社会科学史上的两大发现：（1）“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sup>①</sup>，即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经济基础决定着人们上层建筑，而不是相反；（2）他“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sup>②</sup>。正是这个规律导致资本主义必然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所取代。马克思还根据他独创的唯物辩证法，从资本主义的实际出发，天才地预示了共产主义社会从低级阶段（社会主义）到高级阶段的发展规律。

世界经济作为一个历史范畴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是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74页。

<sup>②</sup> 同上书。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然而，形成世界经济的基本要素（如国际交换、国际分工、世界市场、世界货币等等）又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借以确立的前提。因此，马克思在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时，涉及到广泛的世界经济问题，并提出了很多精辟的论点，从而为我们建立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世界经济学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 一 关于世界市场形成的理论

世界市场的形成是与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换的发展密切相联系的，而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换的发展又“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sup>①</sup>。因此，马克思在考察作为世界市场要素的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换时，首先是从分析各民族生产力的发展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分工的发展程度入手的。

人类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的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随着生产的不断发展，分工进一步扩大。马克思认为城市之间的分工正是工场手工业和超出行会制度范围的生产部门产生的直接原因；而同外国各民族的交往，则是工场手工业初次繁荣的历史前提。因此，在14、15世纪，随着资本主义的萌芽，意大利北部诸城已成为欧洲的贸易中心。15世纪末、16世纪初，由于美洲和东印度航道的发现，以及殖民地的开拓，工场手工业和整个生产已有了巨大的发展，因而市场“已经可能扩大为而且规模愈来愈大地扩大为世界市场”<sup>②</sup>。

17世纪，最大的海上强国英国在商业和工场手工业方面都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页。

② 同上书，第63页。



占据优势。马克思指出，这种商业和工场手工业集中于一个国家的情况，“逐渐地给这个国家创造了相对的世界市场，……它产生了大工业——利用自然力来为工业服务，采用机器生产以及实行最广泛的分工。”<sup>①</sup>从18世纪60年代到19世纪60年代，英国和其他先进国家相继完成了产业革命，实现了从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的过渡，工农业生产和交通运输业获得空前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取得了世界性的胜利。由于机器的广泛采用和生产力的迅速发展，社会分工进一步扩大，并迅速向国际领域扩展，从而形成了一种适合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际分工体系。在新的国际分工体系下，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加强了，越来越多的国家被卷入了世界市场；与此同时，大工业还为沟通世界市场提供了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和通讯设备，世界越来越被联成一个整体了。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以往自然形成的各国的孤立状态。”<sup>②</sup>

马克思的世界市场形成理论着重分析了世界市场既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前提，又是它的历史结果的这种双重作用。他从分析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入手，说明了在生产力不断发展的推动下，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的发展如何导致世界市场的形成。而世界市场的形成过程同时也是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定创造条件的过程。世界市场的形成加速了各国封建制度的崩溃，促进了资本主义关系的确立，因此，“世界贸易和世界市场在16世纪揭开了资本的近代生活史”。<sup>③</sup>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6页。

② 同上书，第67页。

③ 同上书，第252页。





但马克思也指出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一经形成，就会取得一种飞跃的扩张能力。这种“机器经营在破灭外国手工业的产品时，强迫地把外国变作自己的原料产地了。”而为达此目的，它首先必须摧毁殖民地、附属国那种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社会经济结构。马克思在一系列著作中具体描述了宗主国如何通过倾销商品、掠夺当地的土地所有权等方法，来瓦解殖民地附属国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从而把它们变为自己的原料产地和产品销售市场的过程。这样，由于世界市场的开拓，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了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互相依赖所代替了；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被卷到文明中来了。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又指出：“大工业建立了由美洲的发现所准备好的世界市场。”<sup>①</sup>这就是说，世界市场也只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后，才最终形成并进一步发展。

关于世界市场的形成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的这种辩证关系，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做过极其精辟的论述。他说：“固然，世界市场本身，也形成这个生产方式的基础。不过另一方面，这个生产方式固有的按不断扩大的规模来进行生产的必要性，也促进着世界市场的不断扩大。”<sup>②</sup>在该书第14章“作用相反的各种因素”中，他也指出：“对外贸易的扩大，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幼年期，虽然曾经是它的基础，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进展中，由于这种生产方式的内在的必然性，由于这种生产方式对不断扩大的市场的需要，它也已经变为这种生产方式本身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67页。

② 《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373页。



的产物。在这里，我们再一次看见了作用的二重性。”<sup>①</sup>

马克思在世界市场理论，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说明了由于各国民族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分工如何发展为国际分工，国内商品交换如何发展为国际商品交换，而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换的发展又如何导致世界市场的产生。同时，他还说明了世界市场的产生怎样加速了世界各国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瓦解，从而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世界性胜利提供了历史前提；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它的不断对外扩张的内在必然性，又促使世界市场的最终形成和进一步扩展。在这里，世界市场作为一个历史范畴，一方面是在各国民族生产力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历史上诸社会形态下的商品货币关系取得世界规模的发展的产物；另一方面，它又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直接的历史结果，本质上体现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把构成世界市场要素的国际分工、国际交换等，称为“生产的国际关系”<sup>②</sup>，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国际生产关系”。马克思把世界市场及其各要素作为国际生产关系来论述，不仅深刻地揭示了它们的本质；而且对于正确理解和确定世界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也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

## 二 与世界市场有关的若干经济范畴

生产的国际关系即国际生产关系，既与各国国内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有联系，又有其特殊本质的规定性。正是为了揭示这种国际生产关系的特殊本质，马克思对反映这种关系的经济现象进

① 《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37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1页。



行了理论上的抽象，提出了一系列具有特殊内容的世界经济范畴。这里以国际分工、国际价值和世界货币为例，来说明这种范畴所反映的国际生产关系的特殊内容。

1. 国际分工。所谓国际分工，就是产业革命后，由于社会分工的进一步发展使大工业脱离了本国基地，面向世界市场，从而形成了一种同机器大生产相适应的、把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程度上囊括在内的新的分工体系。马克思指出：“由于有了机器，现在的纺纱工人可以住在英国，而织布工人却住在东印度。在机器发明以前，一个国家的工业主要用本地原料来加工……由于机器和蒸汽的应用，分工的规模已使大工业脱离了本国基地，完全依赖于世界市场、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sup>①</sup> 14、15世纪的分工，即在还没有殖民地、美洲还未被发现以及同东亚细亚的往来只有通过君士坦丁堡的那个时代的分工，同已经存在有充分发展的殖民地的17世纪的分工是根本不同的；而后一种分工改变了“各族人民的整个内部组织、他们的一切国际关系”<sup>②</sup>。这就是说，不同时期的分工有着不同的历史内容；这里的所谓国际分工，是与资本主义的机器大生产、与殖民主义制度联系在一起，并以世界市场的形成为其历史前提的。

国际分工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后国际经济关系的一种表现，它具有明显的资本主义剥削关系的本质。马克思在许多著作中都论述和揭示了国际分工的这种资本主义本质。例如在《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中，马克思曾对自由贸易信徒的诡辩作了有力的驳斥。他说：“有人对我们说，自由贸易会引起国际分工，并根据每个国家优越的自然条件规定出生产种类。先生们，你们也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68—169页。

② 同上书，第323页。



许认为生产咖啡和砂糖是西印度的自然禀赋吧。二百年以前，跟贸易毫无关系的自然界在那里连一棵咖啡树、一株甘蔗也没有生长出来。”<sup>①</sup> 事实正是这样。在资本主义的国际分工体系下，少数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成为“加工厂，而广大落后地区和国家之所以成为它们的原料和食品供应基地，主要地取决于国际的社会条件，正如马克思接着所说：“既然一切都成了垄断性的，那么即使在现时，也会有些工业部门去支配所有其他部门，并且保证那些主要从事于这些行业的民族来统治世界市场。”<sup>②</sup> 这就是说，少数拥有工业中关键部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会利用它们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这种有利地位去控制世界市场、剥削和掠夺其他国家。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即使自由贸易在世界各国之间建立起友爱关系，这种友爱关系也未必更具有友爱的特色。把世界范围的剥削美其名曰普遍的友爱，这种观念只有资产阶级才想得出来。”<sup>③</sup>

2. 国际价值。在商品的国际交换中，各国的社会劳动转化为世界范围的社会必要劳动，即转化为商品的国际价值。国际价值也是一个历史范畴，它是资本主义时期的国际商品交换关系的理论抽象。商品的国际价值与商品的国内价值不同，它不是由一个国家的社会条件下生产该种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的，而是由“世界劳动的平均单位”<sup>④</sup>，即一切有关国家生产该种商品所消耗的劳动平均单位所决定的。由于各国的社会劳动生产率不同，由一国范围内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的国内商品价值，与世界市场上的国际价值是不等量的。这样，如果国际商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08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

④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14页。



品交换是以国际价值为基础进行的，就会出现如下的情况：“一国的三个劳动日，可以和别一国的一个劳动日相交换”<sup>①</sup>；“处在有利条件下的国家，在交换中以较少的劳动换回较多的劳动”<sup>②</sup>。“这好比一个工厂主采用了一种尚未普遍采用的新发明，他卖得比他的竞争者便宜，但仍然以高于他的商品的个别价值出售，就是说，他把他所使用的劳动的特别高的生产力作为剩余劳动来实现，因此，他实现了一个超额利润。”<sup>③</sup>

有人认为，只要是按国际价值进行的国际交换，就不能说有剥削；只有在存在着垄断价格的地方，国际交换才存在剥削。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大家知道，资本是一种无限自我增值的价值。它除了千方百计加强对劳动的榨取外，还竭力通过首先采用新技术来获得超额利润。然而，在自由竞争的情况下，资本家的这种超额利润会因竞争对手采用更新的技术而消失。这就迫使资本家不断扩大投资，实现对生产的垄断，以便通过规定垄断价格来获取超额垄断利润。但在国际范围内，资本的流动毕竟会受到民族国家的一定限制，特别是在生产资本的国际化尚未充分发展的时候，情况更是如此。因此，为了获得超额利润，少数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便通过殖民统治手段，强制造成有利于自己的国际分工（如占据在经济发展中处于主导地位的部门或易于进行技术革新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部门；而把那些从属性的和不易进行技术改造的部门转让给落后国家），从而造成一种与对生产的垄断不同的另一种类型的垄断，即对生产的有利条件的垄断。在不合理的国际分工体系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按国际价值进行的国际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册，第112页。

② 《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63页。

③ 同上。



贸易中所取得的超额利润，虽然不是直接从交换过程中产生的，但它却是这种对生产有利条件的垄断权在流通领域中的实现，就像优等土地的所有者利用对土地自然丰度的垄断而获得级差地租一样。正因为按国际价值进行的国际交换中，超额利润的取得是有条件的，所以马克思指出：“价值规律在国际上的应用，还会由于下述情况而发生更大的变化：只要生产效率较高的国家没有因竞争而被迫把它们的商品的出售价格降低到和商品的价值相等的程度，生产效率较高的国民劳动在世界市场上也被算作强度较大的劳动。”<sup>①</sup> 而不合理的国际分工，恰恰是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国际竞争，从而保证“生产效率较高的国家”获得超额利润的因素。所以，如果说在一个国家内价值规律的实现是以自由竞争为条件的，那么，在世界市场上，国际价值的存在及其在国际交换中的实现，则以发达国家对生产优越条件的某种垄断及由此而引起的劳动生产率的差异为基础。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指出，在世界市场上，价值法则已“受了本质上的修正”<sup>②</sup>。

3. 世界货币。对于世界货币，马克思也把它作为与世界市场相联系的历史范畴来考察，并使之与各民族国家的货币相区别。他说：“货币一离开国内流通领域，就会解除它在那里取得的作为价格标度、铸币、辅币和价值符号的地方形式，返回到贵金属原有的条块形式。在世界商业上，商品必须用普通形式来展开它们的价值。所以它们的独立价值形式，在那里，将会当做世界货币，和它们互相对待。货币在世界市场上，才按完全的范围，当作这样一种商品来发生作用。这种商品的自然形态，同时就是抽象人类劳动的直接社会的实现形态。它的存在方式，才充

①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14页。

② 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第3卷，第270—271页。



分和它的概念相适应。”<sup>①</sup>马克思在分析世界货币作为国际支付手段、国际购买手段和充当国家或世界财富的体现物的职能时，都指出了这些职能的特殊表现形式（相对于国内货币职能而言），并在此基础上说明了世界货币在国际范围内的运动形式。

李嘉图认为，在正常的流通情况下，每个国家具有与它的财富和实业相应的货币量；货币依照它的真正价值或与它的生产费用相符的价值流通，也就是说，货币在一切国家有同一的价值；因此，不会有货币从一国到别国的输出或输入，各国的通货之间是平衡的。总之，在李嘉图看来，“一国的通货之正常水平就表现为通货的国际的平衡”<sup>②</sup>。在这里，他的信念是：“国别丝毫不改变一般的经济法则。”<sup>③</sup>马克思批判了李嘉图的这种错误观点。他在《资本论》第3卷中谈到贵金属在世界市场上的运动时，着重指出了如下几点：（1）世界货币的运动完全是由国际商品交换决定的，就像国内货币作为国内购买手段和支付手段由国内商品交换决定一样；（2）“国家铸币的贬值或复本位制，也会使贵金属由一国的流通领域流到别国的流通领域”<sup>④</sup>；（3）货币贮藏的形成，在它是用做对外贸易的购买手段和支付手段的准备金，并不过是暂时休止的资本形态时，就同国内用于同一目的的贮藏货币一样，“都不过是流通过程的必然的沉淀物”。<sup>⑤</sup>马克思的这些论述说明：相对于国内货币来说，世界货币有它的特殊职能和运动形式；它作为世界市场上的一般等价物，是国际商品交换的一个要素，因而它的运动受世界市场规律的支配。

①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25页。

②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34—135页。

③ 同上。

④ 《资本论》第3卷，第394—395页。

⑤ 同上。



由于世界货币在世界市场上获得了一般等价物的形态，成了“可以全面转移的商品”<sup>①</sup>，因此，马克思指出，“如果商品所有者各国由于其全面的工业与普遍的商业而把金作为合用的货币，那么，工业与商业在它们看来，只是从世界市场抽出金银形式的货币的手段。因而，金银当做世界货币，既是一般商品流通的产物，又是流通范围进一步扩张的手段。正如当炼金家想炼出黄金时，在背后产生了化学，同样，当商品所有者追求那具有令人着迷的姿态的商品时，在背后迸发了世界工业与世界贸易的源泉。因为金银在自己的货币概念里就预料着世界的存在，它们帮助了世界的形成。它们的这种魔力，决不限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幼稚年代，……19世纪中叶新金矿的发现对于世界贸易所发生的非常影响，证明了这一点。”<sup>②</sup>这就是说，世界货币的出现不仅促进了世界的形成；而且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后，还进一步加速了资本主义生产在国际范围内的商品化，加速了资本的国际化。

综上所述，马克思所提出的诸如国际分工、国际价值和世界货币等范畴，都是世界市场形成后国际经济现象的理论抽象。它们都在某一侧面反映了国际生产关系，因而都是我们建立世界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所必须运用的基本范畴。

### 三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际化与 世界经济的形成和发展

资本主义是伴随着殖民制度的盛行而产生、发展和壮大的。

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11—114页。

② 同上。





极少数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直接在欧洲以外各地用劫掠、奴役和谋财害命方法劫取到的财宝，源源流回母国，在那里转化为资本。”<sup>①</sup>但除了这种超经济的掠夺外，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后，资本作为一种自身不断增值的价值，也具有无限扩大其活动范围的趋向，从而使它逐渐形成一个世界范围的经济关系体系，即超越国界的剥削体系。这主要表现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其无限扩大剩余价值的内在要求的驱使下，总是要在世界各地寻找有利的商品销售市场和原料产地，总是力求把全世界的生产和消费都纳入资本主义体系。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之本质的特征，是生产物发展为商品的事情；这种发展，和市场的扩大，世界市场的创造，外国贸易，是结合着的”<sup>②</sup>。在创造和开拓国外市场的过程中，世界货币的出现起了推动的作用。它一经出现即采取世界资本的形态，其目的就是为了增值交换价值，即从国外取得超额利润。

世界资本的发展过程大体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1）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世界资本一般采取商业资本和借贷资本的形式。（2）在垄断资本主义时期，产业资本发展为金融资本，资本输出成为这一时期的重要特征。从19世纪初期起，先进资本主义国家逐步在殖民地和附属国兴建铁路和港口，发展采掘工业。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迅速发展，资本输出的规模越来越扩大，其中以生产资本形式输出的资本的比重也不断增大。特别是作为国际垄断资本新形式的跨国公司的产生和发展，更大大加强了生产和资本的国际化。总之，资本输出和世界资本是金融资本向世界范围扩张的现实形态，是帝国主义

①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831页。

② 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第2卷，第137—139页。



国家统治殖民地、附属国的物质基础。正是在资本，从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一步国际化的情况下，垄断资本主义成了极少数“先进”国家对世界大多数居民施行民族压迫和经济剥削的世界体系。这时，统一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即近代的世界经济最终形成了。

马克思把资本主义作为一种世界性的剥削体系来考察，他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特别注意这种生产方式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国际关系”方面的因素。他把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和灭亡，同殖民地的存在、世界市场的形成和发展以及世界性的工业危机紧密联系在一起，从而阐明了世界经济的形成及与此有关的许多重大的世界经济理论问题，并从根本上揭示了未来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向，即向统一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世界经济发展的方向。

正因为马克思是把资本主义作为一种世界性的生产方式来考察的，是在世界范围内展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和内在矛盾的，因此，他对利润率的下降规律、资本主义再生产及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论述，都以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为背景。他指出“资产阶级生产的一切矛盾，在全般的世界市场恐慌中，会集中地表现出来”<sup>①</sup>；世界经济危机，“必须视为是资产阶级经济上一切矛盾之现实的综合和强制的解决”<sup>②</sup>。

首先，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包括李嘉图在内）用农业歉收、纸币贬值、信用膨胀、资本过剩等等来解释危机不同，马克思一向认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是生产过剩危机，即生产超过市场的需求而导致的危机。而市场早已突破国界而发展为世界市

① 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第2卷，第648页。

② 同上书，第615—616页。



场，因此，当整个世界市场出现商品过剩的时候，就会造成世界性的经济危机。所以，马克思指出：“这种危机由于如下一点就愈加频繁地发生并且愈加剧烈起来，即是随着产品数量的增加，亦即随着对扩大市场的需要的增长，世界市场的容量是愈益减少了，因为每一次先行的危机都是要把一些新辟的市场或先前只被微微榨取过的市场卷入世界贸易范围的。”<sup>①</sup>在《资本论》第1卷论及“机器与大工业”时，马克思也把工业危机与世界市场联系起来，指出“工厂制度的异常的飞跃的扩张能力，和它对世界市场的依赖性，必然会引起热病似的生产，以致市场过于充足，然后由市场的收缩，引起生产的瘫痪状态”<sup>②</sup>。

其次，在经济周期理论方面，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明确指出了工业生产“不断在中常的活跃、繁荣、生产过剩、危机和停滞这几个时期的顺序中变动”<sup>③</sup>。而在该书的第3卷中，则根据世界情况的变化（如交通工具的惊人发展和世界市场的现实形成等），提出了周期变形的问题，指出“周期过程的急性形式和向来十年一次的周期，似乎让位给一种比较慢性的、拖延的交替了。这种交替，正按不同的期间发生在不同的工业国家内。交替的一方是比较短期的稍微的营业恢复，另一方是比较延长的漫无定期的消沉”<sup>④</sup>。马克思这一指示，对于我们今天研究世界资本主义再生产周期变形，预测世界经济发展趋向，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反危机措施的局限性和弊

---

① 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1卷，第83页。

②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86页。

③ 同上。

④ 《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567页（恩格斯的注）。



端，也早有深刻的认识，并提出了极其精辟的见解。例如，马克思曾指出：过度输出（即过度生产）和过度输入（即过度贸易）已经在一切国家发生；“生产过剩已经由信用，由那种与信用相陪伴的一般的价格膨胀而被推进了”；一切国家都有同样的崩溃在发生；贵金属的流出将会依次在一切国家发生。而如果为制止贵金属的流出，英国银行在危机时期提高利息率，那么，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也会采取同样的措施。<sup>①</sup> 恩格斯也明确指出，各国为保护本国工业的市场而采取的加强国内市场的垄断和实行保护关税政策的措施，“也不外是最后的、全面的、决定世界市场霸权的工业战争的准备。所以，每一个对旧式危机的重演有抵消作用的要素，都包含着一个更激烈得多的未来危机的幼芽”。<sup>②</sup>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些精辟论述，在后来资本主义的发展中，特别是以凯恩斯主义的推行、国际垄断的加强以及当前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滞胀”长期不能摆脱的事实中，都得到了有力的证实。

马克思还对整个资本主义制度与殖民制度的关系作了充分的论述。他强调了殖民地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极端重要性，后者依存于前者，宗主国一刻也不能离开殖民地。马克思的这种分析，全面展示了世界范围内的资本主义矛盾。正是在这一基础上，他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向作了科学的预测。他明确地指出了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研究对象的政治经济学的规律，必然会在世界范围内起作用，并决定着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他说：“资本的集中是资本作为独立力量而存在所十分必需的。这种集中对于世界市场的破坏性影响，不过是在大范围内显示目前在每一个文明城市起着作用的政治经济学本身的内在规律罢了。历史

① 《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632—635页。

② 同上书，第568页。



中的资产阶级时期负有为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的使命：一方面要造成以全人类互相依赖为基础的世界交往，以及进行这种交往的工具；另一方面要发展人的生产力，把物质生产变成在科学的帮助下对自然力的统治。资产阶级的工业和商业正为新世界创造这些物质条件，正像地质变革为地球创造了表层一样。只有在伟大的社会革命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并且使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督的时候，人类的进步才会不再像可怕的异教神像那样，只有用人头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sup>①</sup> 马克思对世界经济的内在矛盾及其发展趋势的分析，为我们展示了未来世界经济的一幅壮丽的图景。

#### 四 马克思的世界经济理论对建立世界经济学的意义

马克思的世界经济理论的意义，不仅在于它已阐明了当时世界经济领域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从而为后人的世界经济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理论依据；而且还在于它已为马克思主义世界经济学确定了明确的研究对象，从而为它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创立奠定了基础。

诚然，马克思在世时并没有提到世界经济学的问题。他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也主要局限于一国的范围。正如他在《资本论》第1卷第1版序言中所指出的，“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到现在为止，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因此，我在理论阐述上主要用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75页。



英国作为例证。”<sup>①</sup>同时，他还指出，在研究方法上，“为了在纯粹的状态下对我们的研究对象进行考察，避免次要情况的干扰，我们在这里必须把整个贸易市场看作是一个国家，并且假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到处确立并占据了一切产业部门。”<sup>②</sup>这就是说，在这里，马克思主要是从一国的范围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为一种纯粹的形态来进行研究的。

但是，马克思之所以这样做，仅仅是为了在必要的场合进行理论抽象的需要，是研究中必须采取的一种方法，并不意味着他把资本主义视为一种民族封闭型的生产方式。相反，正如我们在上面所指出的，马克思始终是把资本主义作为世界性的剥削体系来看待的。正因为如此，他的研究涉及到如我们在上面所列举的许多世界经济方面的问题。而且，如果按照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和导言中所拟订的写作计划做，无疑将会在更大的范围内对世界经济问题作出专门的论述。他在该书的序言中指出：“我考察资产阶级经济制度是按照以下的次序：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sup>③</sup>而在该书的导言中，他计划把全书分为五大篇，其中第四篇就是“生产的国际关系，国际分工，国际交换，输出和输入，汇率”；第五篇是“世界市场和危机”<sup>④</sup>。当然，马克思后来并没有完全实现这一写作计划。他在当时未能就“生产的国际关系”写出完整的专门论著，这对于后人，当然是一个无可弥补的重大损失。然而，散见于他的政治经济学著作中的许多有关世界经济的论述，却已经为我们建立世界经济学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0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37页注。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1页。

④ 同上书，第111页。



任何一门学科的建立，最重要的是确定它的研究对象。在这方面，马克思的理论已给了我们以重要的启示。

首先，马克思为政治经济学所确定的研究对象，从根本上说也已为我们规定了世界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正如上面所指出的，马克思一生最重要的著作《资本论》的研究对象，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世界经济学的作为政治经济学的一门分支学科，固然有其特定的研究领域，但在以生产方式（主要是生产关系）为其研究对象这一点上，是与政治经济学一致的。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世界经济学的对象应是，研究从世界经济形成以来世界范围内的生产方式（包括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总体，兼及有关的上层建筑，而重点则是研究国际生产关系。

其次，马克思在论述政治经济学和世界经济问题的过程中，说明了一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国际生产关系的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关系，进一步为世界经济学划出了特定的研究领域和明确了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具体研究对象。当一个民族国家的生产关系扩展为国际生产关系的时候，后者就具有自己的某些独特的内容，并有其特殊的运动规律，而不仅仅是一国范围的生产关系在国际范围的简单延伸。正是在这一点上，才产生了建立世界经济学的必要性。

第三，马克思在论述世界市场的形成和资本的国际扩张的过程中，提出了一系列世界经济范畴。这些范畴作为国际生产关系的理论表现，具有不同于政治经济学范畴的特殊内容（如国际分工不同于社会分工、国际价值不同于价值、世界货币不同于国内货币，等等），正确地反映了国际生产关系的本质。而这些范畴，都是我们形成世界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所必不可少的。

可见，马克思对广泛的世界经济问题的论述，已在许多方面



为世界经济学的创立作了理论准备。特别是他提出了“生产的国际关系”（即国际生产关系）这一概念，对确定世界经济学的特殊研究领域和特定的研究对象，更具有直接的决定性的意义。

长期以来，人们在马克思的理论的指导下，为创建世界经济学做了不少工作，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特别是进入帝国主义时期后，列宁根据资本主义的新发展，总结出帝国主义的基本特征，进一步揭露了资本帝国主义作为世界剥削体系的本质，从而在更加广阔的范围内论述了广泛的世界经济问题。然而，应该指出的是，在探索世界经济学的过程中，有两种比较流行的有关世界经济学研究对象的错误观点，长期阻碍着这门学科的建立和发展。

早在本世纪初，西方已普遍流行着一种把“国际经济”混同于“世界经济”，从而把国际经济学混同于世界经济学的观点。这种观点抹煞了蕴藏在国际关系背后的国际生产关系。大家知道，所谓国际经济，指的是各国国民经济之间发生的诸经济联系，即国际经济诸关系。因此，西方资产阶级的以国际经济为特定研究领域的国际经济学，是把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的。而世界经济则是一种全球规模的经济体系。作为世界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对象的国际生产关系，虽然往往通过国际关系表现出来，但它决不等于国与国之间的一般往来和联系，而是指反映在这种国际关系中的生产关系。例如，国与国之间的一般商品交换，在国家产生后就已存在。但当时的国际交换，与存在着适合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际分工体系和统一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时的国际交换，就具有不同的性质；后一种国际交换已具有资本主义时期的特殊内容（即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表现为一种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延伸出来的国际生产关系。所以，如果我们把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生产方式下的国际交换的不同内容抽





象掉，而还原为一般的国际经济联系，那就会抹煞国际关系所反映的那种国际生产关系的本质。世界经济学的任务就在于揭露那种掩盖在诸种国际经济联系背后的国际生产关系。如果它放弃这一任务，那它就会使自己混同于资产阶级国际经济学。

在世界经济学研究对象方面的另一种错误观点，是把国际生产关系仅仅看做是一国生产关系的简单的延伸。这种观点以布哈林为代表。布哈林曾经认为，世界经济是“包括世界整体的生产关系以及与这种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交换关系的体系”<sup>①</sup>，并且指出“现代资本主义是世界资本主义”<sup>②</sup>，“我们应当把资本主义体系不仅当作一种抽象形式，而且当做世界资本主义来具体地加以考察，而世界资本主义，应该作为一个整体，即作为经济整体来考察。”<sup>③</sup>布哈林的这些意见，基本上是正确的。他的错误在于：第一，他机械地把资本主义的国内矛盾转移到世界范围以后，认为资本主义的国民经济已“从不合理的体系成为合理的组织”<sup>④</sup>，竞争和无政府状态只在世界范围内表现出来，市场问题、价格问题、竞争问题和危机问题，都只是世界经济的问题<sup>⑤</sup>，从而抹煞了资本主义的国内矛盾，走上阶级调和的机会主义道路。第二，他把资本主义的国内生产关系机械地等同于国际生产关系，抹煞了国际生产关系所具有的特殊内容和特性，从而也必然会最终走向取消世界经济学。

马克思指出：“最一般的抽象总只是产生在最丰富的具体的

① 布哈林：《世界经济与帝国主义》。

② 布哈林：《过渡时期的经济》第1章。

③ 布哈林：《在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行动纲领的报告》。

④ 布哈林：《过渡时期的经济》第1章。

⑤ 布哈林：《“有组织的经营不善”的理论》，[苏]《真理报》1929年6月30日。



发展的地方”，而“最抽象的范畴，虽然正是由于它们的抽象而适用于一切时代，但是就这个抽象的规定性本身来说，同样是历史关系的产物，而且只有对于这些关系并在这些关系之内才具有充分的意义。”<sup>①</sup>一百多年前，马克思在世界市场业已形成，资本的国际化已有一定发展的情况下，对大量的世界经济现象作了理论上的抽象，提出了丰富的世界经济理论。这些理论，正因为它们是从丰富的具体中抽象出来的，因而对于指导后人的世界经济研究和建立世界经济学，都具有重大的意义。当前，由于生产和资本的国际化空前发展，特别是由于一批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崛起，世界经济的发展已经进入了这样的历史时期，即从统一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向统一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世界经济过渡的时期。在这一伟大的转折时期中，马克思的世界经济理论原则，由于世界经济的无限丰富的新发展，不但丝毫没有丧失它的光辉，相反，它具有更加重要的指导意义了。我们坚信：在马克思的理论的指导下，一门崭新的学科——马克思主义世界经济学，一定会在不久的将来建立并逐步发展起来。

（《世界经济》1983年，第3期）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7—108页。



## 作者主要著作目录

- 《中国农村经济现阶段性质之研究》、《中国地租的本质》  
(载冯和法编的《中国农村经济论》,黎明书局,1934年)
- 《中国货币制度往哪里去》(与章乃器、骆耕漠、狄超白合著)  
新知书店,1935年
- 《中国国防经济建设》 上海黑白丛书社,1938年1月
- 《中国经济问题讲话》(与许雪寒、王渔、姜君辰、骆耕漠合著)  
新知书店,1938年8月
- 《论战争》 新知书店,1940年3月
- 《世界经济概论》 人民出版社,1983年
- 《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纵横谈》  
世界知识出版社,1983年
- 《世界经济与世界经济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
- 《世界经济与中国经济》 人民出版社,1984年
- 《当代世界经济发展规律探索》  
经济科学出版社,1984年
- 《论改革》 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



## 作者年表

**1908年** 9月28日，生于江苏省无锡县东乡洪声里镇。

**1915年** 入私塾，后在洪声小学和江苏省第三师范附属小学读书。1922年高小毕业。后升入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

**1925年** 在校刊上发表评论法国著名唯心主义哲学家柏格森所著《形而上学导言》的文章。

**1926年** 参加中国国民党。

**1927年** 被开除出国民党。师范学校毕业，在无锡县立初中附小任教。

**1928年** 考入无锡民众教育学院。1929年到黄巷实验区（黄巷是丽新布厂的工人居住点）从事工人教育工作。经王寅生介绍，参加了陈翰笙所领导的农村经济调查，并转入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

究所工作。

**1930年** 对河北保定的18个农村进行了调查。

**1931年** 参加编写《现今中国的土地问题》、《亩的差异》和《无锡农村经济调查资料》等专著。

**1932年** 发表关于农村经济问题的处女作《1931年大火灾中中国农村经济的破产》，刊于1932年5月《新创造》第1卷第2期。

**1933年** 被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除名，后到塔斯社上海分社工作。参加“苏联之友”社和社会科学研究会。开始从事革命活动。

**1934年** 参加以陈翰笙、吴觉农等为主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出任“左翼文化总同盟”宣传委员。



9月，与金仲华、张仲实创办《世界知识》杂志，曾任该刊主编。

1935年9月，经周扬和胡乔木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中央文委委员。

1936年撰写《怎样研究中国经济》一书。创办《永生》周刊和《现世界》杂志，并曾任两刊主编。

9月，与陶行知，陆瑾等参加在布鲁塞尔召开的世界和平代表大会。后又代表宋庆龄参加了在巴黎召开的国际反法西斯委员会扩大会议。

1937年任全国救国联合会党团书记。创办《战地知识》和“战时书报供应所”，并与孙冶方、姜君辰等编辑《救亡手册》。

1939年到重庆，撰写《汪精卫卖国的理论与实践》一书。

1940年7月，随叶挺军长从重庆到新四军军部。

1941年皖南事变后，转到苏北根据地，任华中局文委书记、苏北文化协会理事长和《江淮日报》社长。后被任命为新四军政治部宣教部长。

1946年3月，赴北平参加军事调停处执行部工作。并任新华社北平分社社长兼总编辑，创办

《解放》三日刊。

4月3日，与报社40多名同志被国民党非法逮捕，后被释放。

5月，赴延安任党中央秘书。

9月，调到《解放日报》和新华社，任该报社论委员会主任。

1947年3月，随刘少奇、朱德经山西赴河北参加华北地区的土地改革运动，并任中共建屏县委书记。其后，出任华北大学教务长。

1949年1月，任北平军管会文化接管委员会主任。

2月，以中国代表团秘书长的身份，出席在巴黎和布拉格召开的世界和平代表大会。随后，奉党中央之命任中共代表团副团长，出席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19次代表大会。

9月，任教育部党组书记、副部长。

1952年12月，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秘书长。

1954年10月，任文化部党组书记、副部长，兼国务院文教办公室副主任。

1956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之后还曾当选为第一、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历任第一、



二、三、四、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四、五、六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

**1966年** 十年动乱期间，遭到残酷迫害。

**1978年** 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

参与制定了《1978年至1985年全国世界经济学科发展规划草案》。

倡建了“中国世界经济学会”，

并任该会会长。

**1980年** 任国家计划委员会顾问、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对外经济贸易研究中心主任、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顾问、大百科编辑委员会委员。

**1983年** 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

**1985年** 5月25日，因操劳过度心脏病复发，在北京逝世。



SELECTED WORKS OF THE  
SCHOLARS IN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VOLUME OF QIAN JUNRUI